

世界真相丛书 03
World Fact Readings

ECONOMIC GANGSTERS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s

经济黑帮

腐败、暴力的黑帮经济学

[美] 雷蒙德·菲斯曼 爱德华·米格尔 ◎ 著
冯斌 ◎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我对菲斯曼和米格尔这两位最优秀的新生代发展经济学家早有耳闻
现在我知道他们还是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侦探”。他们找到了深入探
究腐败和暴力问题的巧妙方法，这一方法超越了过去经济学家们曾进行的
繁冗分析。这是一段任何关心世界贫困和暴力问题的人都不容错过的生动
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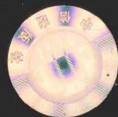
—— 威廉姆·伊斯特利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经济黑帮》揭示了贫困、犯罪和腐败间的重要联系，有助于我们认清
我们生活的这个如此微小且紧密联系的世界。

—— 丹·艾瑞里 《怪诞行为学》作者

ECONOMIC GANGSTERS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s



上架建议 © 经济读物

ISBN 978-7-5086-2142-5



9 787508 621425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 38.00元

ECONOMIC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s

GANGSTERS

经济黑帮

腐败、暴力的黑帮经济学

[美] 雷蒙德·菲斯曼 爱德华·米格尔 ◎ 著
冯斌 ◎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黑帮 / (美) 菲斯曼, (美) 米格尔著; 冯斌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8

书名原文: Economic Gangsters: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s

ISBN 978-7-5086-2142-5

I. 经… II. ①菲… ②米… ③冯… III. 经济—问题—研究—世界 IV. F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5443 号

Economic Gangsters: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s by Raymond Fisman and Edward Miguel

Copyright © 200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arranged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经济黑帮

JINGJI HEIBANG

著 者: [美] 雷蒙德·菲斯曼 爱德华·米格尔

译 者: 冯 斌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3067

书 号: ISBN 978-7-5086-2142-5 / F · 201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外国援助资金如何落入贪婪的腐败官员和黑道中人之手？

黑市商人如何将国际体系玩弄于股掌之间？

与印度尼西亚独裁者有着“暧昧”关系的公司其股价如何
暴涨暴跌？

降雨和坦桑尼亚发生的“猎巫行动”有何联系？

.....

这就是这些无法无天、暴戾成性的经济黑帮所在的神秘、
混乱和残暴的世界。你将与这两位侦探般的经济学家一道，追
随他们的诡秘行踪.....

第一章 我们的财富被谁掠夺了？ /1

经济黑帮所处的时代 /7

新生代的希望 /10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16

计算无形的“鸡和蛋” /19

调查真相 /22

第二章 腐败的通行证：苏哈托的商业王朝 /25

腐败的程度：让市场发言 /29

腐败之道 /32

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 /35

苏哈托中风之后 /41

所有的腐败都一样？ /46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51

华盛顿也是一摊浑水 /53

第三章 赖昌星：走上不归之路 /57

凡事都有个价码 /60

走私就是桩生意 /61

关税和走私诱因 /64

经济学家眼中的走私内幕 /66

贿赂：是经济车轮上的油还是沙？ /71

赖昌星是如何逃脱的？ /72

还原真相：通过经济刺激来遏制走私 /75

美国的关税体系：不可思议的矛盾 /78

第四章 腐败的文化 /81

“世界凶杀之都”市长的奇遇 /83

笨蛋，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86

外交豁免 /89

外交官眼中的停车 /92

外交官违章停车的真相 /95

美国式的腐败 /101

给“山姆大叔”贴条 /104

腐败的底线 /109

附录 /112

第五章 暴力冲突与贫困：谁来拯救他们？ /119

曾经神奇的乍得湖 /121

武装冲突之祸 /124

仇恨还是贫困？ /127

贫困是冲突的根源? /131

非洲的暴力传统 /133

在气候变暖之后 /138

气候变化的赢家与输家 /139

气候变化下的矛盾冲突 /141

第六章 谁断了他们的活路? /147

可怕的法则 /149

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 /152

行动起来 /161

援助行动开始吧 /165

超越暴力 /168

第七章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 /173

战争之王 /180

北纬 17 度 /183

越南本可能是……/186

比炸弹更响 /187

非洲的失败和成功 /189

重建巴格达 /192

第八章 向经济黑帮开战! /199

应对病痛 /205

经济学家的对策 /207

腐败大乐透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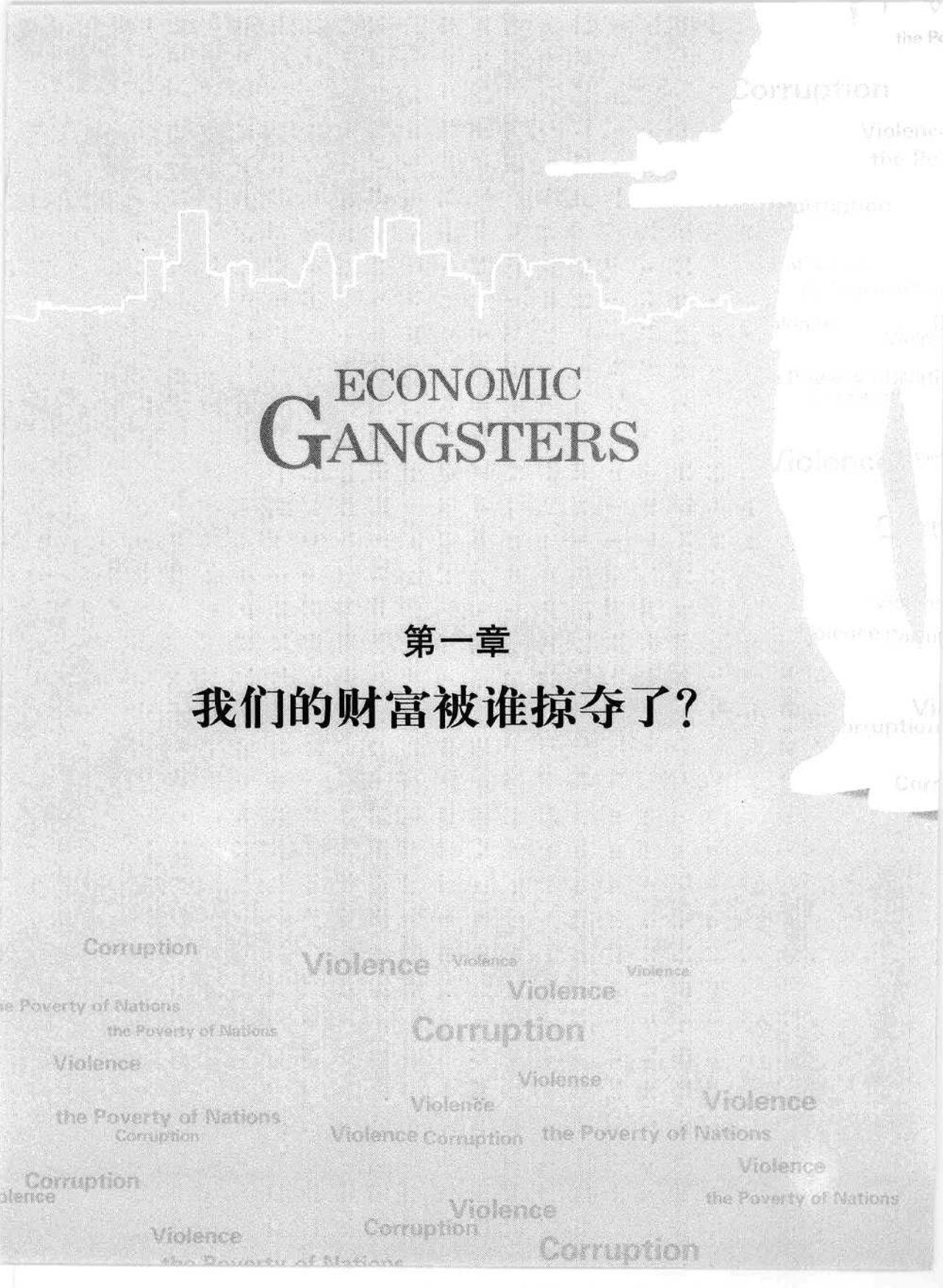
流氓与会计师 /212

拯救非洲 /214

走投无路? /216

结语 前途未卜? /221

致谢 /227



ECONOMIC GANGSTERS

第一章

我们的财富被谁掠夺了？

流亡 22 年之后，肯尼亚著名小说家恩古吉·瓦·西安戈（Ngugi Wa Thiongo）于 2004 年夏天回到他的祖国。刚一回到首都内罗毕，他就开始了新小说《乌鸦奇才》（*Wizard of the Crow*）的创作，这是他 10 年来的第一部新著。恩古吉的早期著作，包括十几部小说和故事集，早已享誉国内外，实际上，1963 年肯尼亚刚刚独立时他就开始发表这些作品了。透过他精心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和反映家乡人民苦难经历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恩古吉揭示了欧洲殖民主义给肯尼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

恩古吉亲历了这种种社会矛盾，并从自己和众多肯尼亚同胞的亲身经历中汲取了创作灵感。成长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恩古吉被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茅茅起义”所震动。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兄弟和成千上万的肯尼亚同胞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惨遭杀害。而后，他和他的同胞也亲身体会到英国殖民者于 1963 年被迫撤退后祖国赢得独立的喜悦。除此之外，他还受到了独立后的肯尼亚政府的迫

害——尽管祖国恢复了自治且正奔向光明的未来，恩古吉却被迫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远走他乡，在那些年里，他因对独立后肯尼亚政权进行尖锐批评而饱受迫害并遭到羁押。

恩古吉的作品中不乏《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 这样的名作。这部小说发表于 1967 年，即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 就任 4 年后。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殖民统治垮台后留给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挫折，以及与新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肯尼亚人民对经济繁荣的追求。《一粒麦种》是一部有关获得自由后的肯尼亚在早期混乱年代的小说，它刻画了当时人们对光明未来的热切期盼，以及混杂在其中的对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腐败和暴力的恐惧。“独立真的能将土地还给非洲人？这一切将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恩古吉借小说主人公吉科尼奥(Gikonyo) 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同样的疑问也在新独立的国家（如塞拉利昂、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民众的脑海中回荡。未来在哪里？自由能带来工作、和平和财富吗？恩古吉的小说中对引发这种情绪的源头表达了极大的关注，使其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并被奉为非洲文学的圭臬。对于恩古吉本人来说，在流放中度过的战后岁月给他带来了学术声誉，并使他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他曾在纽约大学任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学院(Erich Maria Remarque) 的语言学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主管写作和翻译中心的工作。2004 年，他带着对未来的乐观向往

（而非过去遭遇的苦涩回忆）回到肯尼亚。“我终于回来了！我已如释重负，心境坦然，不惧任何挑战，敢于拥之入怀。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们，再一次踏上了汲取知识的土壤。”他向到内罗毕机场来欢迎他回国的人们如此说道。

但就在恩古吉沉浸在人们喜迎他归来的热情、希望和欢乐之中时，他在内罗毕租住的公寓遭到了野蛮袭击，他遭到毒打，脸被烟头灼伤，他的妻子恩杰瑞（Njeeri）惨遭奸污。恩古吉回国之时，正值对他进行长期迫害的肯尼亚大独裁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下台后不久，独裁者的下台为民选政府的成立铺平了道路。许多人认为，恩古吉的遭遇源于他早年对肯尼亚政客和政治的尖锐批评，这一暴力事件从另一侧面也表明肯尼亚人民仍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成立民选政府的愿望落空了。2008年初肯尼亚发生的大范围政治暴乱，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

事情本不该如此。

过去40年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经济奇迹。1963年，韩国和肯尼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几百美元。大多数人靠务农补贴家用。当时，你还不能断定哪个国家在20世纪末会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在经历着非殖民化的阵痛期，在这一过程中，激烈的武装冲突不断。20世纪60年代早期，韩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相比之下，肯尼亚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包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适宜种植咖啡、棉花和茶叶的土壤。

韩国在经历了最初几十年的纺织业及后来的炼钢业的发展阶段后，

最终进入高端消费品和先进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时期，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如今的韩国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已堪比他们之前的殖民宗主国日本的国民的生活水平了，也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如今肯尼亚人民并未感到当前的生活水平比 1963 年的好多少。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回顾过去 40 年的历史，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开始在经济上缩小与欧洲及北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而孟加拉、巴基斯坦、中美洲各国以及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深陷于极度贫困的泥潭中，我们从中能得出何种结论？

正是这个疑问，让我和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夜不能寐，苦苦追问，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终极目标所在。本书并不是为了就贫困国家为什么贫困这一问题给出某种固定解释。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种有关贫困（或任何其他现象）的“标准”的宏大理论，那么你可能会对此表示怀疑。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非某种单一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

但我们也并不赞成另一种观点，即没有人能在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上取得突破。自 1963 年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深刻的教训。独立后的肯尼亚人民的切身经历——辛勤劳动的成果被腐败分子窃取或者被暴力摧毁——预示着腐败和暴力这两大弊病已经成为肯尼亚现代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将会发现，肯尼亚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印度尼西亚“后殖民时期”的骚乱到中美洲和非洲的血腥内战，腐败和暴力的破坏性力量都显而易见。

经济黑帮所处的时代

在人们的印象中，阿尔·卡彭是个黑社会老大，是个残暴的“冷血杀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卡彭还曾经是巴尔的摩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师，当然这是在他加入芝加哥黑社会并最终成为老大之前的事。通常我们不会把这种相对卑微且可能有些乏味的记账工作与卡彭这样的黑社会老大联系起来。在其出演的电影《疤面煞星》(Scarface) 或《教父》(Godfather) 中，并没有出现阿尔·帕西诺 (Al Pacino) 算账或关注财务报表的镜头。但卡彭作为会计师所受到的专业训练，无疑为他组织如此罪恶巨大的商业帝国助力颇多。重点是“生意”！卡彭做的生意恰恰是娼妓、赌博、诈骗和在国家实施“禁酒令”期间倒卖私酒，在做这些生意时，他是靠机枪而非律师来解决纷争的。

在传记作家罗伯特·舍恩伯格 (Robert Schoenberg) 看来，卡彭是“一个能够对其所作所为给出清晰且具理性的解释的违法商人”。他组建的商业帝国绝对称得上是“经济黑帮”，他这个集暴力成性和目无法纪于一身的罪犯，将 20 世纪 20 年代的芝加哥搞得乌烟瘴气，但他同样精于理性的算计。确实，他是个“冷血杀手”，但暴力仅仅是他用来攫取财富的工具。

像卡彭这样的家伙，其病态的残暴令人憎恶。这些人精于算计，从不过于冲动。然而，正是在金钱和暴力驱使下的狭隘私利，使得经济学家很容易就能够看清他们的本性。这不是说我们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情绪在控制人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也

是人)。但经济学家们希望研究的人类行为是根植于人的“经济人”属性之中的，即对一个理性、追求私利的人而言，他的行为和选择基于逻辑判断而非一时的冲动。如果“卡彭们”的犯罪思维模式果真与我们假设中追求私利的“经济人”模型非常接近，那么经济分析就能成为遏制腐败及其他违法行为的有效的研究工具。

从盘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的暴君们到活跃在中国南海的走私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书提到的这些人物确实遵循了经济学的逻辑规律。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有助于你弄明白你为什么不敢在缴纳税款时搞点小花招儿或者还没有埋单就想从餐馆溜之大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对被抓住可能面临法律后果的恐惧。但对偷逃税款的处罚很少见，而且通常也是无关痛痒的，当然，你也可以不给侍者小费就离开餐厅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尽管你就餐的那家餐厅也许再也不会欢迎你回来）。然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的举止还是得体的。也许除了罚款或牢狱之灾，防止我们犯罪的仅仅是我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我们都受到良心的约束。

但像卡彭这样的反社会分子几乎不受良心的约束，因此，如果所有人都以自身最狭隘的私利指挥自己的行为——逃税或者赖账，甚至干掉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以赚取更多金钱，那他们将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犯罪分子，成为经济黑帮。而且，我们也将发现，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都隐约可见经济黑帮的影子。当身处绝境时，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求生，这时候良心就成了被人们束之高阁的“奢侈品”。

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我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弄明白世界

上经济黑帮的腐败和暴力行为造成的巨大破坏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为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设想卡彭作为芝加哥市长或者成为卡彭总统将会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无须想象就能明白被残暴的黑帮老大统治着意味着什么。）

尽管我们确实还没找到问题的全部答案，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彻底搞清楚腐败和暴力问题，我们还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和令人惊喜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美国学术机构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员和教师（雷和特德分别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我们开展的研究迫使我们走出象牙塔，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现实世界。在经济调研工作中，我们的足迹已经从肯尼亚边远的村庄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证券交易大厅，以便找到看待有关全球贫困源头的新视角。在那些最不可能有所发现之处，如对曼哈顿的外交官违章停车进行罚款，甚至还包括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我们意外地找到了解决有关腐败和暴力问题的答案。

我们把经济分析与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和新落成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里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深层见解融合在一起，将总结出的各种经验和教训都集于本书之中。我们希望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肯尼亚人民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终实现他们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确立的经济振兴计划。

如何最有效地应对全球贫困？认为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具有划时

代的重要意义并不为过。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正面临着威胁。世界银行曾发表过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世界上有 10 亿人口的日均收入低于 1 美元，而全球一半人口（30 亿人）的日均收入低于 2 美元。

人们靠这点钱如何生存？答案非常简单：不能生存。成千上万的人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而医疗保健更是稀缺或者压根儿不存在。在战乱频仍的乍得、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成年人接受过教育的不到 30%，而很多儿童在 1 岁前就夭折了，更别提能高中毕业了。

甚至对于美国人（包括西方世界其他享有锦衣玉食的国民）来说，全球贫困问题同样事关重大。美国人通常很少关注自己国家之外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在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贫困会滋生绝望和不满。每天早上，我们看到的头条新闻经常是恐怖袭击、环境恶化和各种全球性灾难，而我们总是能在中东的贫民窟和刚果河流域被砍伐一空的热带雨林中找到上述种种罪恶的源头。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无论富国还是贫困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

新生代的希望

每隔几年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就会回到国际经济发展问题上来。曾经在安吉丽娜·朱莉和 U2 乐队主唱波诺这样的明星的号召下，公众对非洲困境的关注情绪被再次唤起。使他们重新对非洲大陆予以关注的，还有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以及苏丹达尔富尔

地区种族屠杀的血腥场面。我们听到了非洲人民发出的债务减免和希望美国与欧洲给予更多国际援助的请求。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企业家，正将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投入非洲防治疟疾、抵御艾滋病和教育非洲民众的慈善事业中去，以期最终“使贫困成为历史”。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在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令人恐惧的1984年大饥荒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带着“现场援助”的赈灾义演和专门为非洲饥民而作的《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专辑来到这里。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的号召力（又是波诺）与一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孩子的照片结合在一起。数十年来，私立慈善团体和各国对外援助机构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救援资金以期消除贫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连续的债务减免行动。但尽管如此，肯尼亚普通人的生活仍没有比1963年好多少。这次的行动真的能使情况有所改变吗？

消息灵通的人们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你也许会认为，经济学家们将时间主要花在了对金融政策细节或下月通货膨胀率是多少的复杂数据的讨论上（这确实描绘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工作状况）。这些温和而古板的经济学家们几乎理清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似乎遭遇如此巨大失败的原因。

这个问题可最终归结为一点，即发达国家是否已经为帮助肯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而提供了足够的资金，这些资金是不是还远远不够。顶尖的学术专家们对此莫衷一是。答案将主要根据人们对腐败和暴力在导致国家贫困中所起的作用的判断而定。也许在很大程

度上，腐败和暴力仅仅是贫困的某种征兆。如果确实如此，只要发达国家的捐赠者最终将足够的资金捐赠给肯尼亚以推动其经济发展，那么该国民众就不会在为生存而互相残杀了。反之，如果大部分对外援助落到了肯尼亚腐败官员的黑手中或在肯尼亚的国内冲突中毁于一旦，那么又如何指望援助的资金能帮助肯尼亚这样的国家脱离贫困呢？更多的援助可能只会养肥已经腐败的“精英阶层”，甚至还会使腐败和暴力这两个“孪生兄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这些只因人们竞相争抢这些追加的资金援助。

弄明白当前有关对外援助的争论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对此热情高涨的原因，研究腐败和暴力的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它们也是本书后面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新发现之前，我们先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隐藏于这些新发现背后的更广泛的争论。数百位学者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但基本上分属于两大阵营，他们的观点受到两位顶尖发展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

一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一位国际发展援助方面不知疲倦的公共活动家。萨克斯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我们正在那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们有幸感受到他的学术智慧和个人魅力。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者，每次与他交谈后都会感觉到，他那精辟的评论似乎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这个不善社交的教授圈子里，萨克斯教授的超凡魅力极具传奇色彩。实际上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德

就去非洲开展发展方面的研究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了萨克斯教授有关在道德层面抗击全球贫困的精彩演讲的启发。

萨克斯是经济增长中“贫困陷阱”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贫困陷阱”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很简单。一位贫穷的肯尼亚农民无法凭一己之力轻松脱贫。他没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养活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而且只要接下来的一个坏年景或一场大病，他在收成好的年头攒起来的积蓄就会很快被用光。这位农民的赤贫状况几乎决定了他和他的孩子仍将继续贫困下去，并且年复一年始终如此。

在萨克斯看来，对外援助就像“强心剂”一样，能帮助一位农民或者一个村庄或者整个经济体摆脱“因贫致贫”的恶性循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整个国家或大陆修建医疗站、改善学校教育以及增加公路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的代价高昂，据萨克斯估算，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至少需要增加5倍，这样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如萨克斯出版的畅销书《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里所言，肯尼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们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帮助其脱贫，但如果资金和其他资源充足，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将贫困从地球上铲除。萨克斯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使得2025年前全球消除贫困成为可能”。

萨克斯有关消除贫困的观点，在理论上能解释得通。但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却持相反的观点，即我们已经为对外援助付出太多了，或者说，至少我们的投入完全用错了方式和投错了地点。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因公开抨击世界银行的对外援

助政策而被世界银行解雇后，伊斯特利作为教授任教于纽约大学，他已经成为“援助失败”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在他看来，总体而言，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对外援助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声称数万亿美元已经被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浪费掉了，而且萨克斯将对外援助扩大5倍的计划将造成更大的浪费。伊斯特利认为，这些数额巨大的援助资金通常被用于中央规划的富丽堂皇的大型项目上，如水电大坝、四车道高速路、海水淡化工厂，而在建这些工程的各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监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伊斯特利将大多数对外援助捐赠者采取的方法，与苏维埃经济规划者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后者曾梦想确立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使英明的莫斯科官员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并满足所有工农群众的各种需求。但他又问道，从华盛顿特区赶来的对外援助的核心规划者，如何能确切地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远隔千里的经济体实现发展呢？他们怎么知道肯尼亚需要的是水电大坝而非新式大学呢？为何要建造更多的高速路而不是灌溉水渠（或者相反）呢？而且，即使是对那些旨在建造满足迫切需要的学校或医疗机构的项目而言，援助者又如何能确信肯尼亚的领导人确实将对外援助的捐赠资金用在了刀刃上而没有据为己有或任意挥霍了呢？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展示出过去国际社会开展对外援助的种种努力所应结出的累累硕果，除了一大堆纪念善意的锈迹斑斑的纪念碑之外，几乎再无他物。上万亿美元被浪费在根本无法通车的公路上或者从未给任何家庭带来光明的发电站上。更

有数十亿美元遭窃取。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两国经济不发达的水平还堪比非洲，它们几乎完全摒弃了大型对外援助机构进一步对其开展援助行动的要求。如果这两大经济体仍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创纪录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而不依靠其他机构的援助，那么为何对外援助的巨大推动力就一定是肯尼亚等国的济困良方呢？这些国家为何不跟随中国和印度的脚步呢？

伊斯特利和他的“制度主义”同伴们主张，在我们将对外援助预算增加 5 倍之前，我们需要确信受援国能真正用到这笔追加投入。接受援助资金的各国必须治理良好且必须有人负责监督以确保这笔资金用在了为普通民众而非总统的利益的服务上。受援国应具备运转协调的政府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如媒体和社区联盟等，这些组织将敦促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防止经济黑帮篡权。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远没有做到这些。伊斯特利认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上述各种机构之前，我们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就是资助各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的企业家，这些人能发现应对当地发展问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伊斯特利在其著作《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将这些人称为“检察官”。捐赠者以及处于中央政府腐败旋涡中的社会团体都能对这种小规模干预进行监督，并督促“检察官”们真正负起责任。如果取得成功，完全可以将这种干预升级，使之造福于更多的人。由于各种社会团体找到了应对腐败和混乱的方法，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将感到生活更有希望，而且经济应该紧随其后发展起来。但

到那时，我们不应再把资金投入一堆烂摊子上。

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萨克斯并不主张捐赠者直接将数十亿美元存在腐败的独裁者的瑞士银行账户上，或者将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钞票，以期出现最佳结果。而且伊斯特利也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可以置各贫困国的悲惨处境于不顾，一味地袖手旁观，任其完全凭借自身能力求得发展而不给予任何资金援助。

然而，二者仍存在显著区别。萨克斯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再考虑改善其他方面，诸如运转良好的政府机构、活跃的媒体及市民团体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但第一步，是确保穷人们不再担忧他们的下一顿饭。

伊斯特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反驳道，这意味着在盖好房子前先把车配好。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为实践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推动”理论付出了数万亿美元的代价，但非洲大陆的贫困程度仍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援助国进行规模更大的投入，也只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被滥用（并使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大失所望）。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这两剂“药方”貌似都颇有道理。但为了评估它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腐败、暴力以及这些应当为过去诸多经济发展败笔负责的经济黑帮的动机。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在步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把一生的精力都耗

费在研究人类的堕落方面。起初，我们只是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何贫困国如此贫困以及我们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然而暴力、腐败和持续的贫困并存，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无法将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剥离开来。因此，近 10 年来，我们每位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和研究，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腐败、暴力和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穷尽一生要完成的工作，以求彻底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腐败、暴力和贫困这三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判断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何处，无疑属于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争密切相关。如果各国首先解决腐败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说，是否援助者应当在贫困国希望解决暴力和腐败问题前先把它们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来？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从目前来看，它们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用确凿的事实而非悦耳的说辞，弄明白“腐败—暴力—贫困”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之后进行的讨论，基于我们发表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某些部分基于其他合著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了在论辩中引入新证据，我们将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数年里辛苦建成的数据库中。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希望是：在理性分析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

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述 6 个故事——3 个与腐败有关，另外 3 个与暴力有关，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开始破除障碍，理清发展中国家暴力和腐败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带我们进入那些经济黑帮所在的不为人知且经常混乱无序的世界。从越南的大屠杀到中国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从非洲边远村落的种族杀戮到曼哈顿市中心的街道，答案通常分布广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极不寻常的地方。

无论好坏，我们人类似乎对腐败、暴力和其他罪孽有着天生的兴趣。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发现的“密道”，这些本身就具有无穷魅力，而我们将向您展示经济学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最新的工具和“独门秘籍”。在我们讲述的“黑手党传奇”和“战争故事”之外，各位读者还将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学追踪时用的手法，与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神探如出一辙，远胜过美国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司 C-SPAN 公司那一套。

如我们将要了解的，贫困和暴力二者之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答案，通俗地说，可以从下文的“雨从天降”中找到。要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我们会设立一个大型的“彩池”，投资者从中对政治关系的价值下注。腐败事关良心、文化，还是对惩罚的恐惧？这可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附近超时停车的违章罚单上找到答案。

本书中，我们总结了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并吸取了一些教训，揭示出了它们的现实意义，从而为对外援助和如何更好地消除全球贫困提供了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人民实现经济愿望的新思路。在本书

结尾，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经济研究在彻底消除贫困中发挥的潜在的建设性作用。

计算无形的“鸡和蛋”

如果有这么多人如此关心全球贫困问题，而且暴力和腐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面，那么，大家也许会惊讶于为何我们仍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为什么我们还未弄明白腐败的政府和暴力犯罪是否破坏了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不是贫因为国内冲突和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

问题在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很难解决，这是我们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缠于此，只需挥挥手继续前行，但我们无法同样轻松地挥别全球贫困问题。在本书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乍得——这个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的悲剧性历史。近几十年来，乍得先后经历了政治动乱、血腥内战、政府腐败和经济衰退。但起因是什么呢？战争抑或经济崩溃？实际上它们同时出现，所以很难作出判断。或许这种互相残杀完全是由某些其他因素造成的也说不定，如乍得基督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政治对抗。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种族冲突。然而眼下就出现了如此多的新情况，如政治斗争、日益紧张的族群关系、环境恶化、国家石油财富的流失、日益严重的贫困，这使得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像追着自己尾巴的小狗那样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外，最有趣的是，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在将要开始的论辩中进行

辩解。在试图弄明白是不是暴力和腐败引发了贫困或者是不是贫困导致了暴力和腐败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暴力和腐败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腐败”界定为“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实际上，如按照其定义理解，其所涉及的则是发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事。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在暗中进行交易，并未留下明显的书面证据，那么贿赂就不会出现在公司的纳税申报单上，也不会在年报或现金流量表中向各位股东通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正在试图解决一个我们压根儿无法看到“鸡”或“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亲眼见到整个贿赂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询问当事人。我们可以质问公司官员操纵了哪些幕后交易，或者质问政府受贿官员到底吃进了多少黑钱。然而，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你在去年的贿赂过程中支出多少”这一问题的回复，多半是掺杂了相当大的水分的。

总的看来，经济学家对于人们就任何话题发表的意见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将人们所说的称为“廉价的空谈”，因为话语无须得到金钱或行动的支撑。而且我们特别怀疑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敏感话题有关的“空谈”。就那些非法交易的直接参与者（行贿者和受贿者）而言，“空谈”的说法无疑非常准确，但我们也不会把更多的筹码压在那些评估他人贿赂行为的、据说是铁面无私的专家身上。

例如，假设我们正设法查清孟加拉国前总理之子拉赫曼 2005 年从外资公司中收受贿赂的总额（第二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与此密

切相关的问题，即作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儿子，到底意味着有多少油水可捞）。如果你就此问题在消息灵通的孟加拉人中展开调查，你得到的数据要么远高于总理之子实际攫取的钱财数量，要么远低于此，这取决于你向谁提问。显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们未阐明的实际想法和偏见。当展开相应调查时，孟加拉前政府的支持者自然会对第一家庭的腐败程度轻描淡写，而反对派则可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相似，在回应贪污调查时，商人的主要目标是免遭牢狱之灾，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瞒报自己的行贿数额。

因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人类常常以为所希望的就是真实的存在，而无法做到实话实说。让我们歇一歇，想一想：你喜欢何种咖啡？如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所言，现在你多半可能想要一杯用心烘焙的黑咖啡。然而，当大多数人一大早在星巴克订早餐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卡布奇诺。而实际上黑咖啡正切合我们很多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饮者（做事风格同样如此）。问题在于，烘焙咖啡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因此，我们可能会说，个人喜好是一回事，而要付诸行动时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人们的观点或观念并未恰如其分地反映其亲身经历。在访问所谓“腐败国家”孟加拉时，雷从未发现警察拦住行人罚款。他亲眼见到的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警察本应该指挥交通时却心不在焉地叼着烟四处乱转。与之相似，机场海关官员也没有在雷离境时伸手向他索要小费。因此如果你问雷或其他受到特别礼遇的外国客人的感受时，他们会说孟加拉似乎毫无腐败的迹象。如果我们仅从雷的个人经历推

断，所有腐败问题似乎都没了踪影。

我们不能仅听人们说什么，我们需要看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如果雀巢公司想要知道你对咖啡的真实喜好，他们最好进行“味觉盲测”，而不是只让你填张调查问卷了事。同样，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孟加拉有多少人在收受贿赂，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方法来解决“空谈”问题，并以实际收受贿赂的金额为据作出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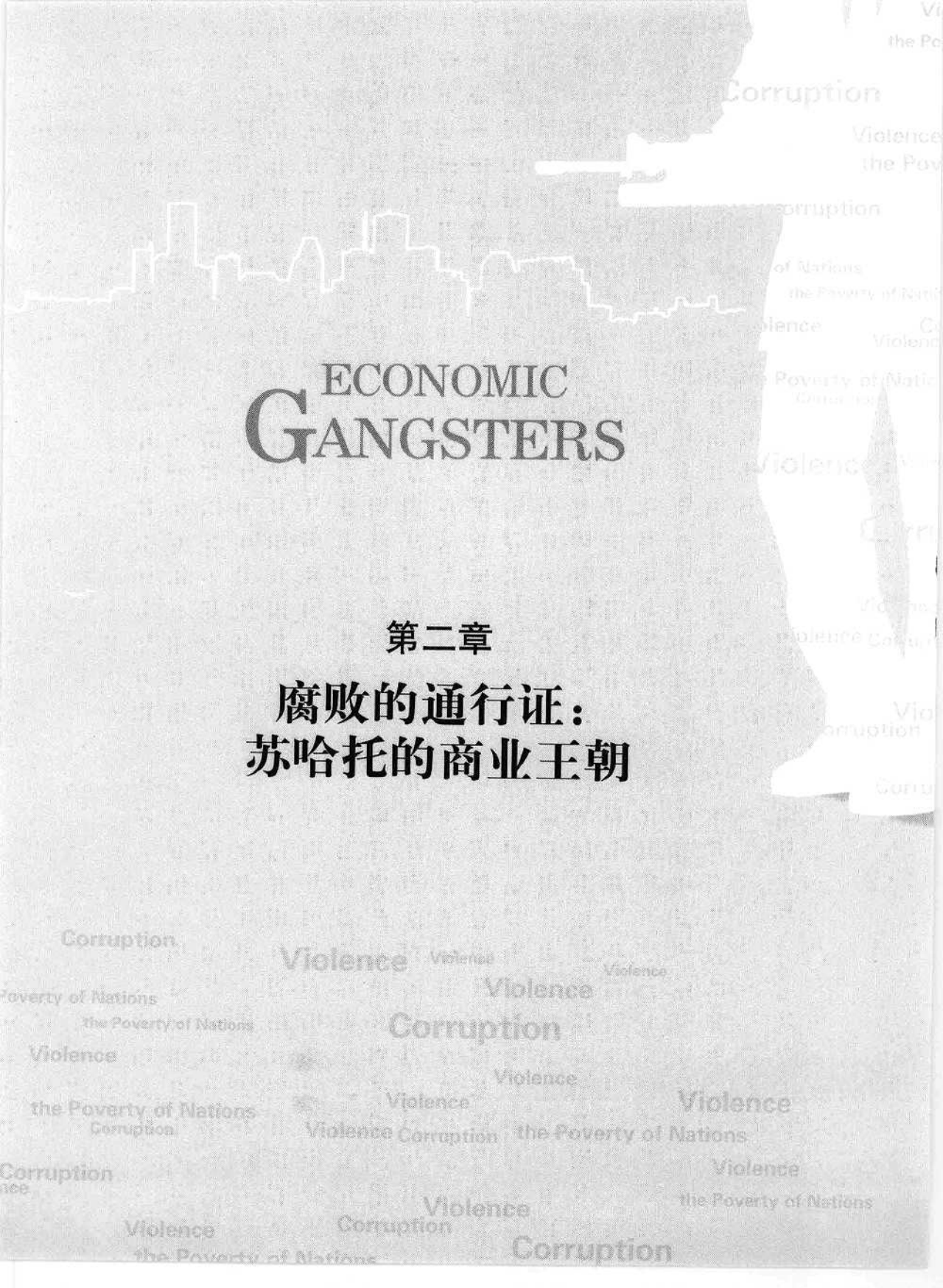
调查真相

了解腐败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方法就是随身携带一个针孔摄像机，装作秘密军火商，看看是否能拍到政客们的罪证。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采取这种措施了，它创建了一个名为“阿卜杜勒公司”（Abdul Enterprises）的冒牌公司，与一位虚构的中东石油大亨进行交易，包括为其洗钱提供便利。以此为掩护，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向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行贿，所有这一切均有录音为证。这一所谓的“诱惑侦查行动”（Abscam Operation）最终获取了5位众议员、1位参议员和众多地方官员的受贿证据，并引发了公众对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的一片哗然。

在政府不倾向于进行自我调查的国家，媒体完全可以代替联邦调查局开展真相调查。印度杂志《喧嚣》（*Tehelka*）于2001年推出了与“诱惑侦查行动”类似的曝光栏目。在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中，两位记者装扮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家伦敦公司“西端公司”（West End）的代

表，希望向印度军方出售夜视照相机。记者们秘密录下了政府高官和军方领导人收受贿赂及讨论如何支付贿赂金的细节。通过互联网，这些情况被曝光，引发了印度很长时间的震动。丑闻被曝光后，也许是出于报复，《喧嚣》杂志社的办公室屡次遭袭击和搜查，并有数名记者被捕入狱。

尽管这些耸人听闻的方法如此诱人，本书中我们进行的调查研究并没有使用上述方法，也放弃了通过类似方法获得知情人对印度监狱的看法的机会，而是运用经济调查分析工具来揭示腐败。毫无疑问，这确属挑战，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要讨论的，再聪明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而这正给了我们这些猎人机会。



ECONOMIC GANGSTERS

第二章 腐败的通行证： 苏哈托的商业王朝

作为总统之子，有多少油水可捞？问问普通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会告诉你“所值甚多”。基于他们在前任总统苏哈托治下的所见所闻，就可以想见苏哈托之子曼达拉·普特拉·苏哈托（Mandala Putra Suharto）足以承担遍布全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度假房租金、数量众多的豪华车及花花公子所拥有的其他奢侈品。对托米（苏哈托小儿子的昵称）的追踪和大肆报道，众所周知，已经成了当地小报的“招牌菜”，为印度尼西亚的百姓提供了茶余饭后关于第一家庭特权生活的谈资。托米在雅加达开着劳斯莱斯闲游，托米参加一个名流云集的酒会，托米和他最近结交的超模女友在一起……这就是总统之子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托米从哪儿搞到钱为他的豪华车埋单？与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一样，托米是个商人，他的商业帝国的触角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各个层面，涉及烟草、广播电视、汽车制造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商业领域。托米事事都能赚大钱的“迈达斯”（Midas）般的触角意味着他的公司获

得了巨额利润，而他也并不羞于从中分红。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据估算，他的个人净资产高达 8 亿美元。尽管托米的兄长班邦（Bambang）和姐姐杜杜（Tutut）在开支方面并不如他这般引人注目，仍然同样聚敛了大量财富。

托米和其他第一家庭的子女获得的商业成功和巨额财富，是否归功于他们与该国总统——也恰恰是他们的父亲——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呢？普通老百姓肯定都会这么说。苏哈托家族成员都以索贿著称，他们总是想法设法对那些想要与政府做生意的公司狠宰一刀。这就是苏哈托家族的子女插手这么多公司进行经营的手段。从电力工程，到公路建设，再到木材生意，总统家族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苏哈托家族公司在确保获得政府合同方面同样表现“出色”：托米受命领衔政府资助的“印度尼西亚制造”国产轿车研发项目，而杜杜旗下一家公司则中标修建贯穿首都雅加达的收费公路。

不足为奇的是，苏哈托对其子女的成功抱有与世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托米和他的兄弟姐妹在事业起步阶段可能得到了父母的指导，但他们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则完全依靠其精明的商业头脑、辛勤的工作和严谨细致的管理。毕竟，在苏哈托执政的 30 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年均增长 6% 的骄人成绩。在一个重关系而轻能力的腐败体系中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托米的亿万家财中有多少是他作为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能力所创造的，而又有多少来自他那骄纵父亲的宠幸呢？作为总统之子，究竟有多少油水可捞？在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情况下，

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且如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了解到的，“空谈”往往与潜在事实不符。在揭穿谜底的过程中，我们将设法越过所有“空谈”，让冷冰冰的、实实在在的钞票说话。

我们在着手寻找腐败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前，首先认真想一想是否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腐败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答案无疑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今日之美国与 100 年前的美国相比，瑞典与印度尼西亚相比）。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我们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占用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精力）来解决腐败问题，也决定了是否继续向贫困国家提供对外援助资金，因为这些资金有可能最终落入无耻政客的腰包。

腐败的程度：让市场发言

如果说“空谈”是廉价的，特别是当谈论的话题为腐败时，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揭示人们的真实想法。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拿自己的钱下注，赌某个公司是否正在与政客进行暗中交易以获取赚钱的政府合同。那些因得到内部消息可以确信公司已经与政客建立合作关系的人将下一大笔赌注；那些没有内部消息的人下注会相对较少些，或者根本不下注，因为实际上他们仅仅是凭猜测来作决定的。在这个“政治赌池”中，原始的经济私利驱使赌客们显露出他们对腐败的真实看法。但是显然这并非拉斯韦加斯的庄家们或其他人下的注。然而，这个赌池却与股市如此相似，投资者们在这儿

打赌公司利润是高还是低。

一只股票，或“一股”实际上代表了股民掌握着公司很小的一部分控股权。例如，著名的亚马逊网上书店拥有约 4.14 亿只流通股，因此，如果你拥有其中一股就意味着你控制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的 4.14 亿分之一，主要收益是你对于亚马逊网上书店 4.14 亿分之一的利润的所有权。假设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为 1 美元，而且你预期公司将有 4.14 亿美元的利润进账，或者随着网店销售取代地面店销售，至少在未来 10 年里，每年每股将获利 1 美元。那么，仅仅 1 美元，就能让你在未来 10 年里至少从这 1 美元中获得年收益——可见这是一笔多么划算的买卖。

如果你确实这么想，那么你和其他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持相同观点的买家应当通过电话与你们的经纪人保持联系，从那些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预期较为悲观的股东手中购入更多该股。另一方面，尽管互联网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有时由于书刊配送成本过高，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收益几乎为零，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如果这是你的想法，那么你的投资并没有为你带来多少利润，因此，如果有买家想要以每股 1 美元的价格收购你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你（及任何一个与你有类似想法的股东）应当卖出所有你（们）当前持有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如果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股票未来收益值相对于该股的买入价来说更高，我们会看到在现行价格水平上买家多而卖家少，这又将推动股票价格继续升高，如果大多数投资者预期的未来收益较低，他们的卖出行为就会使股票价格下跌。

事实上，有关亚马逊网上书店经营情况的信息在不断更新，这使

得投资者可以重新思考他们是否应买进或卖出该股，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例如，如果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宣布提供书籍运费价格，这无疑将分走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部分利润，那么投资者出售所持股份将使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下跌。鉴于源源不断的每日信息更新及投资者在理解新闻的意思方面的不同观点，包括亚马逊网上书店能够将 UPS 费用中的多大部分转嫁到其客户身上，我们在晨报上读到的信息有多少是流言而非现实情况，这些都会使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共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且众多消息灵通的买家和卖家的集体智慧又受到了每日股价的左右。

这与我们有关腐败的讨论何干？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西端公司”，这家由记者创立的公司通过贿赂政界人士和军队高官，向印度军队销售夜视照相机，从而将这些官员拖下水。假设没有照相机产品的“西端公司”市值为每股 1 美元，而夜视照相机的额外销售收益将使“西端公司”的利润翻一番，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拿到了政府的合同，该公司股价将变成每股 2 美元。

现在，可以把递到某位有权势的政客手中那个塞满钞票的公文包视为“西端公司”为锁定夜视照相机合同而进行的一笔“投资”。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笔投资，那么“西端公司”的股价仍将维持在每股 1 美元的水平上，直到合同被公之于众；一旦合同被公之于众，买家疯狂的买入将推动股价上涨到 2 美元，这就反映出了预期利润的增幅。

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拨回到向官员行贿之前，尽管大部分局外

人认为“西端公司”的股票每股值 1 美元，然而公司的知情人已经知道公司股价将很快涨到每股 2 美元。这些知情人可能是“西端公司”的总裁，或他们某位得到暗示的好友，或这位朋友的朋友（他同样得到了有关交易的消息），或者政客（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政客收了钱财自然已经准备与“西端公司”签订合同。这些知情人能够用每股 1 美元的价格买入那些很快就会涨到每股 2 美元的股票，那为何不现在就买入并趁机赚一笔呢？事实上，为何不持续买进直到股价达到每股 2 美元呢？最终，在熟悉内幕的投资者的推动下，“西端公司”的股价将上涨到每股 2 美元，尽管公司还尚未对外公布合同。知情者通过他们购买“西端公司”股票的行为向外界表露其对公司市值的认识，而且翻番的股票价格也向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揭示了这一点。

如果你怀疑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并询问“西端公司”的总裁的同伴（或其同伴的同伴），为何他们会以每股 1.5 美元的价格全部买下“西端公司”的股份，而那时这只股票的实际价格似乎仅有 1 美元，他多半不会告诉你他那装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他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表示自己对“西端公司”的高层管理和高级产品生产线非常有信心，相信它们能在未来创造价值和更高的利润——他会以一大堆廉价的“空谈”搪塞你，因为真相不可告人。

腐败之道

市场总是设法对可能影响公司利润的所有因素，如贿赂和政治关

系等，进行恰当评估。如果有大笔利润可赚，投资者会认真思考是买进还是卖出。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真知灼见来弄明白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国家的腐败程度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了呢？印度尼西亚有很多股价很高的公司。这归因于它们已经对政治关系进行了投资（这些关系确保它们能获得政府的合同），还是它们确实拥有聪明的主管和高质量的产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精于培养政治关系的公司主管同样善于进行产品生产和市场营销。

我们打算做的是，观察哪些公司把塞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递到了国会，并衡量他们的这种“投资”所获的收益。这将告诉我们，公司花在政治投机上的每1分钱为其带来了多少额外利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看到原本就难以观察到的“台面下”的交易，也不能估算公司因此而获得的利润。但如果狭隘地仅依据现金支付额度思索商业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能公正地评价现代金融的精巧之处以及政治关系谋划者可借用的各种工具的广泛性。

因此，不必给托米·苏哈托或他的兄弟姐妹成捆儿的钞票，你仅需向他们赠送你所在公司价值百万美元的股票就可以了。作为补偿，托米可保证你赢得宝贵的伐木特许权，获得税务主管部门核准的免税期，或者确保你从其政府关系中得到至少100万美元的公司赢利。通过家族纽带、竞选助战和私人关系，世界各地的公司均能“买到”政府的合同，这些我们都能洞察出来。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直接回答“各大公司在行贿中的支出有多少”这一问题，如我们所见，我们却能够

很好地回答“公司的政治关系的价值是什么”。

在美国，也有许多“案例”，一些公司似乎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突出的是，2000年，迪克·切尼从能源服务业的巨头哈里伯顿公司的总裁位子上离任后，加入乔治·W·布什的总统票选阵营中。在竞选大战中，人们对某些公司受政府宠幸和偏袒的关切日益明显，随着伊拉克战争中哈里伯顿公司未经投标就获得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人们的这种关切增强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一个遭战争重创的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可以说，要与哈里伯顿公司竞争，仅靠一套电动设备和一本《石油钻探傻瓜》(*Oil Drilling for Dummies*)是不够的。因此，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哈里伯顿公司是最应当拿到政府合同的公司，因为政府力图攫取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调配权，而切尼与哈里伯顿公司的特殊关系仅仅是一种巧合。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切尼这一案例，看看哈里伯顿公司的利润是否确实与切尼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或者实际上就是联合犯罪。但我们应该从迪克·切尼和托米·苏哈托的案例中明白，在搜寻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时应着眼于何处：商业大亨转型的政客（如切尼）、已经在大公司担起肥差的离开政界的人士和前政府官员，以及政客们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如托米和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但找到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的公司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才进入关键部分——弄清楚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

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

亚当·贝洛（Adam Bellow）（诺贝尔奖得主索尔·贝洛之子）在其著作《为裙带关系说句好话》（*In Praise of Nepotism*）中指出，精英往往决定了世界的商业和政治遗产。富人就应该将他们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地位传给他们的子女，如小贝洛所言，因为这些产业和政界巨头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成长为同样呼风唤雨的领袖提供了“本钱”和“给养”（就像大作家肯定会生出能说会道的儿女一样）。如果确实是“龙生龙，凤生凤”，那么我们就不应惊讶于总统后代的公司会获得如此丰厚的赢利。

但如果我们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根本就不是这么赚钱，那又说明了什么呢？为总统竞选提供资金换来的不过是在白宫的林肯卧室里待上一宿，我们是否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答案也不会是“要得到总统的宠信也许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么明确。假设你希望涉足石油钻探领域。你可以进行两种投资。你可以购买尖端技术并雇用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工程专业的高才生，以确保你成为本行业中最具效率的钻探者。或者你能不吝血本巴结权贵并聘请华盛顿游说团队，以确保你总是能最先获得政府最新颁布的各种钻探特许经营权。

通过这两种策略也许会获得同样多的利润，但它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却迥然不同。此外，它们各自应对竞争环境中突发事件的脆弱程度也存在差异。我们将以研究性思维深入阐释这种脆弱程度，从而判断

市场是如何评价政治关系的。

这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假设你选择运用高新技术开展经营，而一家具有显赫背景的公司则运用政治手段与你竞争。如果一场飓风横扫墨西哥湾，摧毁了你及你的竞争对手的钻探平台，那么你们各自的收益又会怎样呢？你公司的利润将暴跌：你花大价钱买到的那些钻探设备现在已经沉入海底，相反，你竞争对手的业务（以廉价设备和代价高昂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受到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则明显轻得多：首先他受损的设备并不是那么贵重，而且他可以利用其政治关系网通过灾难救济基金获得政府的紧急援助，而你公司的股价将大幅缩水，而你的竞争对手仍能稳坐钓鱼台。

假设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华盛顿特区。总统因丑闻被曝光而突然离任，因而你的竞争对手精心培育的关系网也被切断了。随着他的政治靠山失去价值，公司的发展前景黯淡且预期收益的减少将使其面临与投资者卖出股份而引发股价下跌类似的局面。

上述两种假设的灾难性场景中均存在一种关键性因素——意外。市场通常不为各种旧闻或渐变情况所动。所采取的策略的效果已经被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投资者整合进了股价中，如“西端公司”股价的变动，甚至在政府合同签订之前它的价格就已被大幅抬高了。

我们对各种政治关系市场价值的探寻，本质上就是对政治风暴的调查。我们将四处搜寻各种出人意料的政治剧变，并对这些变动如何影响那些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的价值进行衡量。价格上的差别将告诉我们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尽管政治剧变司空见惯，但某些政治剧变

能更有效地促使我们（而非他人）的目标得以实现。例如，在 1972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自始至终政治评论家都看好尼克松而非乔治·麦高文。因此，当 11 月 8 日金融市场开始营业时，即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的次日，投资者们并未感到惊愕。即使在结果公布之前，每个投资者都一直怀着尼克松将连任的期待在股市买进卖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2000 年的总统大选，那次选举情况一直呈胶着状态，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而期间投资者们更是彻夜难眠（甚至选举后的数星期内仍时有如此），焦急地期待究竟谁将入主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

我们将抛开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对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那些腐败现象极为普遍的国家，对政治关系的价值进行调查将极为有益。在这些国家，具有活力的民主相对稀缺，而且在不公正的选举中这种激烈的竞争确实很少。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围绕个人建立的独裁政权有时甚至比民主制度更易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意外死亡、疾病或独裁者被推翻，都会突然切断政治背景深厚的大公司获得政府庇护的道路。因此，我们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的方法，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寻找政治领袖身体健康状况发生的意外变化的“病态探寻”之路。某位政坛大腕的突然死亡就有可能让我们找到苦苦寻找的政治风暴。

“只要苏哈托先生患上感冒，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份就会跟着染上肺炎。”

我们对政治风暴的寻找将我们带回到苏哈托总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根植于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和民选政府之间展开的权力争斗。硝烟散尽之后，一位风华正茂、鲜为人知的将军——苏哈托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1966年3月，他正式出任官方职务，代行总统权力。一年之后，苏哈托当选总统，在位时间超过30年。

苏哈托的影响遍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分配补贴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全局性行业的发展，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此外，政府还掌控着一系列许可权，这些许可权决定了谁能种植柑橘、生产卷烟、砍伐林木、修建收费公路以及进口大米。苏哈托政权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触角，从根本上规定了谁能赚钱以及赚多少。在很多印度尼西亚人的眼中，正是这种巨大的权力，使得苏哈托的儿女及其他与苏哈托家族成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富甲天下。

从这一章开始带着这种思想，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探知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是：总统的儿子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更通俗地讲，与苏哈托政权保持密切关系能为你创造何种价值？活跃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们将告诉我们答案。许多人脉广的生意人持有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大量股份，包括托米·苏哈托所有的传媒业巨擘——毕曼特拉集团。但也有许多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没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情况下成功开展业务，包括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旗下的棕榈油和房

地产企业。巴克利并不是在人脉关系方面有缺失，他更多的是因其企业家头脑而非总统竞选策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让托米入伙对毕曼特拉集团而言有多大意义呢？由于托米的价值想必是来自与其总统父亲的特殊关系，任何有关苏哈托时日不多的信号都会对该公司的股价造成冲击。像毕曼特拉集团这样的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对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这一坏消息的反应就是市值下跌，而且与那些政治关系薄弱的公司（如巴克利旗下各公司市值下跌或上涨）的情况相比，我们就能估算出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

显然，对政治关系冲击最严重及冲击最彻底的情况应当是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他的子女或亲信中无人被视为可堪大任的继任者，因此，最终其他任何人接任总统职位都不太可能（或无法）尊重苏哈托培养起来的所有政治关系。但这只是分析工作的假设而已，事实上苏哈托在位期间他并未去世。到1995年他70多岁时，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健康问题。在此之前，苏哈托的死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他寿命的种种猜测却铺天盖地而来。有关他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报道开始出现在财经新闻之中。1996年出现的关于他健康状况的各种版本的报道后来被证明仅仅是谣言而已，但遍及整个印度尼西亚商界的恐慌却暗示着投资者对将要出现的政权更迭的不安。

1996年7月4日，一份政府公告令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价暴跌，这份公告就是：苏哈托前往德国进行健康检查。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谁会为了测下脉搏远赴千里呢？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

客们被各种谣言淹没了。谣传说苏哈托早先就患有中风，或者可能会赴法兰克福进行紧急心脏手术。与纽约道琼斯指数颇为相似的雅加达综合指数（印度尼西亚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晴雨表）在公告发布当日跌幅达到 2.3%。

这个对于印度尼西亚股市而言仅仅属于坏消息的公告，却对毕曼特拉集团及其老板托米·苏哈托构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究竟具有何种破坏性呢？在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图 2-1 我们能看到雅加达综合指数的走势。你能观察出在 7 月 4 日公告发布前的数星期里，雅加达综合指数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均有小幅震荡，收益和损失都不是很多。之后，随着 7 月 4 日和 5 日市场上种种流言横飞，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暴跌——毕曼特拉集团失去政治靠山的前景，使得股东们纷纷卖空他们所持有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而使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在短短两天内跌幅超过 10%。

随后的一个星期，苏哈托的德国医生为他列出了一份健康状况清单。有关苏哈托将进行紧急心脏手术的报道其实纯属造谣，而且苏哈托的全部体检结果均为良好（事实上他是于 2008 年的初冬去世的，其时我们正在为本章收尾）。现在随着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靠山更加稳固，至少当前来看确实如此，它发行的股票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抢手货，投资客们疯狂买进，毕曼特拉的股价又涨了上来。苏哈托的德国之行已经很明确地提醒投资客：苏哈托和他的政权不可能万年不倒，这使得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毕曼特拉集团具有的政治关系和能够获得的前景。

苏哈托中风之后

如果你仔细审视图 2-1，你会注意到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中的另一种奇特模式。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 1996 年 7 月 4 日政府宣布苏哈托赴德国进行健康检查时的情形。但在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天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较之前大概下跌了 500 个百分点。投资客们凭借集体智慧似乎在公告宣布前两天就已经预见到了苏哈托将赴德就医，这怎么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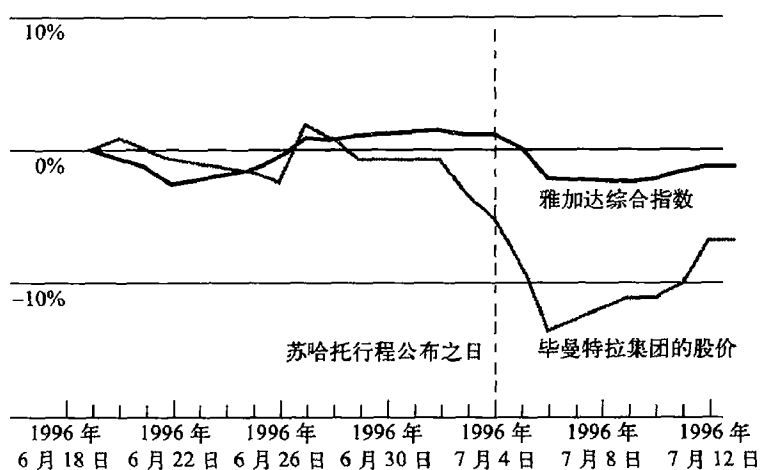


图 2-1 1996 年苏哈托赴德就医期间雅加达证券交易所股价走势

大笔资金“命”悬一线。如果你在 7 月 2 日就已经知道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将在 7 月 4 日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是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而非两天之后的低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的。显然，苏哈托的医生对苏哈托将要开始的德国之行了然于胸，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可

能正在抛售他们所持有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那些与苏哈托的医疗团队关系密切或属于“圈内人”的幸运投资客同样如此。刚听到有关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关系网可能出现变动的消息，那些人脉最广的投资客想必已经早早地开始交易手中的股票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苏哈托赴德就医的消息。“圈内人”足以凭借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变化。当然，在美国，公司主管及其亲友根据独有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的做法是非法的，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也如此，这种行为都要遭到处罚。在对安然公司的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提起的多项指控中，就包括他在明知公司股价被人为大幅抬高的情况下还出售股票赢利。通过提前抛售安然公司的股票，此人获利超过1 500万美元，而仅仅几周过后，这些股票就几乎一文不值。这就是内部消息的力量。

1997年12月雷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雅加达“耳语网络”的力量。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踏访了雅加达摩天大楼的无数间办公室，与偶然遇到的那些投资银行家或记者交谈，这些人也愿意花些时间同这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聊聊。一天早上，他约了《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里克·博苏克（Rick Borsuk）。但会见并未如期进行——在这个简短的访谈中，博苏克的手机几乎从未安静过。交易钟声一响，整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极其狂热，有关苏哈托已患中风且有可能死亡的流言在交易所处处可闻。据称，医疗设备已于前夜被秘密运往总统官邸，很显然，这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交易。交易所的钟

声敲响时美国人早已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耳闻。托米·苏哈托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再次下跌，这次跌幅高达22%，而他姐姐的公司的股票亦下跌了17个百分点。道理显而易见，可以说，股市正与苏哈托的脉搏同步跳动，且如果他的脉搏跳动加剧，股价也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苏哈托7月4日赴德就医之行，已经引发了许多对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票的出售行为。那些天，苏哈托家族及其亲属掌握的所有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了4.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告发布后，与苏哈托无甚瓜葛的巴克利的公司的股价有所上涨，赢利超过1%。苏哈托患病这一消息，对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与这一消息对其他公司造成的影响相比，其股价相差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苏哈托来往密切的公司预期到手的利润在一夜间缩水6%，而这全是一次健康检查造成的！投资客们的交易行为很能说明问题：仅仅是对政治关系的威胁，也会推动市场发生变化（有关中风的谣言，中风尽管严重但远不至于致死）。

1995~1997年间，曾出现过5次有关苏哈托健康问题的谣言，尽管所传疾病并不严重。每一次毕曼特拉集团及其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价都会受挫，而巴克利旗下那些与总统无甚瓜葛的公司却保持了平稳走势，或者略有赢利。市场以其理性的方式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关系与公司赢利大有关联。

这些关系究竟有多重要？我们从未经历过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事——让他们备受压迫的独裁者突然死亡。但我们能够在市场对苏哈托健康状况的反應的基础上，估算出各种政治关系的总体

价值。这表明，投资者们相信，如果苏哈托政权突然垮台，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大概 1/4 的价值将损失殆尽。25% 的公司价值该有多大？2006 年，当苹果公司高调宣布旗下 iPhone 业务正式投入运营时，苹果公司股价上涨 8%，而当辉瑞制药公司意外地被迫撤销 Trovan（被标榜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时，辉瑞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10%。由此看来，关系的价值远远超过某种特效新药或即将面世的高科技产品，甚至二者之和也难以与强大的政治关系相比。

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并不是那些无法按时领到薪水的警察或为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的地方巡警们搞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敲诈勒索所造成的。这里的腐败可是笔“大买卖”。在印度尼西亚，腐败始于最高层并自上而下蔓延开来。在这种环境中，反腐败运动怎么可能会取得成功？市场的运行状况已经告诉我们，在苏哈托政府的政治庇护下，印度尼西亚人脉通达的商界精英赚得盆满钵满。那些最有权势改变这一腐败体系的人恰恰对这一体系钟爱有加。

考虑到这一体系为印度尼西亚消息灵通的人士带来的种种利益，那么，政治和经济改革停摆，彻底的改革尝试只能在苏哈托统治终结时才得以实现，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 1997 年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且苏哈托仍当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苏哈托的密友和亲信进行某种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国家批准的垄断经营权应予以废止，国有银行将停止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企业注资。但苏哈托强行扼杀了这些改革尝试。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无法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寻求帮助。尽管全国大选定期举行，苏哈托的从业集团

党（Golkar party）每次都能如愿获得 70% 的预期选票。一旦向其示好的议会走过场般批准他的当选，《印度尼西亚宪法》就赋予了苏哈托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幸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极权政体，单靠有关腐败程度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并不是改革的良好动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阐明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问题还必须通过公众对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

托米·苏哈托装进自己口袋里的 4 000 万

托米·苏哈托爱车，尤爱跑车，兰博基尼为最。事实上，他爱这些豪车爱到了他自己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地步。1994 年，托米以 4 000 万美元控股这家意大利跑车制造公司。作为新的控股者，他很快就将公司规划与运营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也许是由于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行业经历和管理经验，很多高层主管在他入主公司后就辞职了，造成公司管理层人员空缺。尽管如此，1998 年《华尔街日报》披露，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后托米身处困境，他在兰博基尼公司的股份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看来，托米控股兰博基尼公司是在他老爸的钱的支持下进行的轻率投资，还是一个对跑车颇为精通的精明投资者在一番估量后做的一笔买卖？我们的研究发现，似乎印度尼西亚投资者们认为托米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关系网而非商业头脑。

所有的腐败都一样？

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让我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局外人”是否应当做些什么以应对腐败呢？尽管从表面上看，苏哈托政权从国民经济中揩油甚多，但该国在苏哈托执政的 32 年里实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6%，这堪称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比较起来，美国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 3% 强。）尽管苏哈托家族牟取私利过甚，但在其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却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公共教育、卫生和家庭规划等项目也均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大量国民财富还是落到了普通印度尼西亚百姓手里。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强调的，一般情况下，腐败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却是个特例。也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外援助方在调整计划安排之前应当慎重考虑，尽管这个腐败政权在 30 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业绩。但一个腐败体系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呢？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这样几种解释：除与政界来往密切外，有可能这些深受苏哈托袒护的公司，其自身运营状况也不错。回到之前我们举的钻探公司的例子，也许它们是华盛顿说客和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的合伙公司；也有可能苏哈托确信自己总能抢得先机。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估计 25%（而非 50% 或 100%）的公司利润源于关系网，而且，无论好坏，苏哈托政府在进行贿赂交易时因目标总是很明确而闻名，至少去除了作为大多数违法交易必然具有的不确定性因素。用一位在

雅加达商界打拼数十年的外籍主管的话说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价格，每个人也都对价格了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后能得到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这位主管，在今天“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他却哀叹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乱。”

与此同时，如若不存在腐败现象，印度尼西亚本应该发展得更快，这从韩国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据说韩国的腐败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亚，而这个“亚洲小虎”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印度尼西亚。尽管犯下了大错，但苏哈托确实为这个曾经混乱的国家带来了严明的秩序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后再猜测没有他的领导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况就很难了。苏哈托下台后的近10年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达到苏哈托腐败专制下实现的经济发展速度。

但这似乎并不应动摇我们在减少腐败问题上的立场。取得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这般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腐败的国家本就少之又少，但这也确实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无法证明根除腐败的好处。政策制定者和对外援助者总喜欢以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偏偏是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什么情况下腐败还能创造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经济奇迹？什么情况下腐败会造成经济停滞或倒退，类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的状况？作为腐败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尚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正开始研究同类问题的答案。一个有着如苏哈托般强势的独裁者的国家是否有助于腐败行为的组织化？如果官员和政客的官位无忧且可确保“货”能如约送达，那么腐败的破坏性是不是就会

减弱？既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衡量腐败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搞清楚在哪些方面腐败将造成严重破坏，并最终帮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抚平创伤。

组织化犯罪的利益

莱奥纳尔多·梅西纳，一位来自西西里岛南部的第七代黑手党成员，于1992年4月被意大利警方拘捕。很快他就开始向当局告发原来的同伙，并详细介绍了现代黑手党的组织架构。现在，人们面临的是一个集权程度越来越高的犯罪组织体系。这个体系中地方“大佬”通过收取保护费和毒品买卖来赚取利润，然后将其所得上交给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的“大老板”。可以说，地方“大佬”们在中央办公室派来的“大使”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上缴“贡金”，而且各地“大佬”不得相互干涉对方“内政”。

这一集权组织能够很好地为西西里黑手党服务。根据梅西纳的证词，这帮黑手党成员聚敛了巨额财富，以至于无法将它们全部洗白，因此他们在巴勒莫租下了一套公寓，即有名的“黄金屋”，储存成捆成捆的钞票。正如你所能想象到的，许多可怜的店主和小本生意人每月都要把辛苦挣来的百元大钞作为税上缴到钞票堆积如山的“黄金屋”里，为此他们满心憎恨，但也许他们应当一直感到庆幸。经济学理论预测，在中央集权和运转协调的黑手党体系下，敲诈勒索水平应当比各自为政、毫无秩序可言的体系下敲诈勒索的程

度低，在后一体系下，各地“大佬”仅关注自身利益。与之相似，也许向苏哈托家族企业“上贡”的公司支出的贿赂款总额要比它们打点来自多个各自为政的部门（人力部门、环境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时支出的要少得多。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何运转协调的敲诈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程度较轻”，可以看一下西西里一家小店主（让我们叫他格拉索先生）面临的情况。在集权式犯罪组织（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组织化的犯罪集团”）控制下，收取保护费的黑手党成员应当每月只会光临格拉索先生那儿一次。

那么，得到继续经营并且能够活命的“特权”后，格拉索先生应当向黑手党交多少保护费呢？如果开出的价码相对较高会为这帮敛财暴徒带来更多收益，但同时这么做也可能导致格拉索先生关门歇业——在某种程度上，敲诈额度过高将可能导致小本经营的店主关门歇业另寻生路。因此，如果巴勒莫的“大老板”够聪明，他将制定适中的保护费价格，从而不至于吓跑格拉索和西西里的其他许多小本生意人。

假设意大利警方决意拿下这个“大老板”，而且也没有人再在黑手党的敲诈勒索行动中进行协调。现在格拉索先生每月也许要准备接待黑手党地方“大佬”们的两次造访——让我们把这两位“大佬”称为维托和弗雷德——他们俩各自收取保护费，而且都认为他们应得到格拉索先前一直上交给“大老板”的份额。但他们必须要

权衡一下。当维托为了月度保护费而顺便到访时，他会在较高的勒索额度和格拉索一旦歇业将造成的收入损失间进行权衡。但他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他将敲诈金额订得过高，他也将夺走弗雷德的部分生意，后者将在稍后“拜访”格拉索以收取当月保护费（而且，事实上，维托认为他如不提高敲诈金额，就觉得自己相当于把钱丢在了桌子上等着弗雷德去拿）。由于维托没能说明提高敲诈额度的全部成本，他设定的金额将会“过高”。弗雷德同样如此——他没有考虑到自己选择保护费额度时对维托造成的影响。

结果，这两个“大佬”均设定了一个过高的价码，而且最终丧失了更多的生意，这些生意与之前“大老板时代”的有序腐败密切相关。黑手党赚的钱少了，而且那些仍在经营的店主中，支付更多贿赂金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这些店主在犯罪高度组织化时期上交的保护费远高于现在。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与此相同：在苏哈托家族企业的集权式腐败体制下，各公司总的贿赂金额低于“后苏哈托时代”各个部门索要的贿赂金额总数。这些部门纷纷尽自己所能来压榨各大公司，而不考虑这么做对其他部门再对这些公司进行敲诈勒索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苏哈托铁腕治下的政府是相当腐败的，这对生意而言不是必要的恩惠，可能也不会造成发展中国家曾遭遇的经济灾难，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权力并未实现高度集中，而且许多经济黑帮相互争抢贿赂金。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我们衡量政治关系价值的尝试始于印度尼西亚，但并未止于此。苏哈托政府被视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这个星球上最腐败的独裁者之一，其时正是我们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因此，宽泛且笼统地认为，在官僚机构腐败程度较轻或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然而，我们却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亚腐败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

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时都这么做，这些国家必须满足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具备的全部条件。首先，我们开展研究的国家必须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以便观察投资者对政治关系的价值所下的赌注。非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支撑股票市场的有序运行，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腐败程度）。而且，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样稍微富裕点的国家，股市也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真衡量公司的政治关系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某些追踪政商关系发展脉络的方法。在泰国和意大利做到这点很容易，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界人士自身也运营着该国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却不是很靠谱（尽管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泰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政商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名义上的分离，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的调查研究还需要一些预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风暴，如将改变政治关系价值的令人

惊诧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金融学教授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学者，她曾在全球范围内实践衡量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关于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她曾长期观察商界大亨们的政治发迹史（以及许多政界人士的从商经历），追踪家族政治关系世代相承的脉络，并浏览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以发现谁跟谁来往密切。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的紧密的政商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在俄罗斯，整整 87% 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是由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司持有的。也许在苏联解体后“蛮荒西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并不会令人震惊。更为惊奇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近 40% 的股票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而且由于法西奥教授认为自己的调查方法遗漏了某些政治关系，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低估了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

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如政府、商界、文艺界、体育界，都倾向于在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借助。因此，我们仍需要寻找可以衡量这些相互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专注于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构和政府任命公告——一种比我们进行的对苏哈托政权的研究更为合理的证明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假设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上，而是设想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尼西亚会直接导致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通常情况下当选总统的那位候

选人会得到 70% 的选票)。

根据法西奥教授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更多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市场价值。尽管在英国政商关系非常普遍，法西奥教授仍发现当这些关系意外增强时，受影响的公司的股价不会出现变动。例如，当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总裁约翰·穆尔（John Moore）先生在上议院就职时，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影响。然而在法西奥的祖国意大利，与好莱坞的风格颇为相似，内部关系确实很管用。意大利参议院对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任命将其公司股价提升了 3.4%，这转化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英国人已经找到了治理政治腐败的方法，而意大利人却还没有什么收获。也许相互打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小报在检举不端行为方面确实很有效果，也许是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发挥了作用，或者是英国人绅士作风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道德所致。既然经济学家已经推断出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尽量解释清楚其中存在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要完成的任务。

华盛顿也是一摊浑水

在那些关于公司利益控制国会山的媒体报道的影响下，任期内的美国领导人向英国或意大利取经了么？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自从 1953 年向国会议员行贿被视为非法行为起，美国国会中存在的腐败现

象一直是党派政治和民粹主义之间激烈论战的来源。在此之前，他们的行为受到有关礼节和辩论的一系列内部规定的限制，就成员间存在利益分歧的事件进行投票也是违法的，唾骂、诅咒及其他任何有损国会声誉和形象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顺便提一下，没有一位议员因利益冲突或收受贿赂而被迫辞职，但 1789 年有一位议员因违反“不准唾骂”的规定而几乎遭到驱逐。）

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时期，赤裸裸的现金贿赂几乎不存在。如果这种老套的“现金交易”被某种体系取代之后又会出现何种情况呢？在这一体系中，政客们能够以政治影响力换取选举资金、商务包机“差旅”待遇以及退居二线后的高薪职位。

与此同时，美国人有很多追踪报道竞选募捐和相关事务的民间组织，像政治响应中心组织（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和司法观察组织（Judicial Watch）。美国还拥有一支精于调查的记者队伍，他们定期报道商界人士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美国的两党选举体制产生了政治竞争和应承担的责任。所有这一切将政商关系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保证政治家们的诚实和防止他们以权谋私。

国会应当将各大公司和说客们寻求政治影响力置于何等优先的位置？值得以牺牲其他重要议题（如深化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代价，花费大量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吗？答案显然取决于在国会山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值多少钱，这不是一个人们怎么看的问题，而是事实。

要获知真相，我们就要再回顾一下投资者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华

盛顿堪称“设法衡量政治关系价值的经济学研究者们的乐土”。美国企业（包括富人阶层）慷慨的政治捐助和大肆游说都会留下公共记录，而且总会有一批生意人通过政府部门步入政界，也有一批政客从政府部门出来步入商界。此外，近年来，我们已经亲历了一些非常出人意料的政治事件——2000年扣人心弦的总统大选、2001年佛蒙特州参议员吉姆·杰福兹（Jim Jeffords）突然宣布脱离共和党的惊人决定、迪克·切尼那颗并不健康的心脏，这些都是我们可用来估算各种政治关系价值的令人感到震惊的事。最终，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成了地球上投资客们最大的乐园，这里可供研究的公司股价多达数千种。

苦苦研究政治关系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发现，媒体曝光并不足以净化华盛顿政治。在美国，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在与政府的交往中通常获利颇丰，无论以个人关系还是以政治捐赠来衡量都如此。例如，当吉姆·杰福兹脱离共和党并将国会控制权转手送给民主党时，民主党捐赠者从中获益，而共和党捐赠者则遭受了损失。而当最高法院裁定乔治·W·布什赢得2000年总统大选时，有前共和党立法者在董事会任职的公司的市值增长了，相反，有民主党立法者任职的公司的市值则下跌了。

一个特例是众人皆知的迪克·切尼与哈里伯顿公司的关系。如果副总统确实如某些人所说的在确保哈里伯顿公司获得利润丰厚的联邦政府合同方面发挥了作用，那么每次切尼进行心脏检查时，公司的投资者们应当也会感到心跳加速，而且切尼心脏病发作（2000年11月和2001年3月）和血栓（2005年9月和2007年3月）应当都会使他们

感到焦虑不安。然而，每一次切尼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时，哈里伯顿公司的股价几乎都没有出现任何波动，而且与切尼有私人关系的其他公司中，没有一家对其个人状况作出强烈反应。

华盛顿的金钱政治似乎存在某种限制——低层次的政客们有时能从给朋友提供好处中换来自己免受惩罚，而退居二线的政治家们却往往能够从为公司提供政治方面的协助中获得诸多好处。然而，作为副总统，切尼的每一个决定都被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的监察机构和媒体电台严密监视着，而且它们经常发出有关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的警告，这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向外界揭示切尼具备公关能力的作用，反而限制了他的作用的发挥。有可能哈里伯顿公司人脉非常广，它不用只依靠某一位政客，无论这位政客有多强势；也有可能迪克·切尼自身就非常廉洁。

美国并不像印度尼西亚一样腐败。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一手遮天，掌控着一个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关系就代表一切（或者至少占了所有事务的 1/4）。但美国似乎在预防腐败方面与英国等国相差甚远。因此，尽管冒着从其他重要公共政策问题中分神的风险，美国还是应当持续关注在华盛顿已被视若平常的政商勾结，而且应当继续付诸努力以确保美国的立法者能洁身自好。

ECONOMIC GANGSTERS

第三章

賴昌星：走上不归之路

“索尼，你要明白这纯属生意，而非个人恩怨。”

——迈克尔·考利昂，《教父》

在当代中国的富人阶层中，赖昌星堪称白手起家、成功暴富的典型。与无数的同辈人一样，赖昌星，这个一贫如洗且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儿子，开始了自己在福建省厦门市的淘金之旅。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厦门发展，其时中国政府刚刚开始放松对私营企业的严格管制。赖昌星初到异地，既身无分文，又毫无关系可依仗，而且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到了1990年，他已身价百万，到1999年他已然是亿万富翁。从足球队到宾馆，再到航运业，他曾染指于福建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厦门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当地人戏言要把这座城市改名为“远华”（他的控股公司名为“远华”）。

如今，“霍雷肖·阿尔杰”版赖昌星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他曾因修建“红楼”摆下盛宴款待生意伙伴而名噪一时，如今却被“软禁”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家中。他继续为免遭引渡回国而犹如困兽一般挣扎着，一旦被引渡回国他将面临巨额走私的指控。检方指控他从中国内地向香港走私价值超过 60 亿美元的商品和货物，这有可能使他成为现代史上走私规模最大的走私犯。赖昌星曾经是个精明且成功的商人，但他却偏偏把自己的经营天赋用在了走私而非正当生意上。研究赖昌星开展国际贸易的策略和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黑帮的动机和手段，还能使我们弄清楚如何对付这些人。

凡事都有个价码

生活中的决定包括在成本和收益间进行权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应价格”的经济学意义。价格仅仅是成本和收益分类账户上的成本方面。如果说我在超市用 1 美元买了一个苹果，那么我就无法再用这 1 美元买橘子了。其他更费心机的决定同样蕴含着成本与收益间的权衡取舍。假设我抢银行，我会事先衡量下把整麻袋的钱据为己有的“收益”与遭到警察追捕甚至有可能锒铛入狱的“成本”。

如果超市的苹果涨价两倍，一些顾客就会转而选择购买橘子（或梨）。与之相似，如果我们通过增加在联邦调查局反持械抢劫部门工作的探员的数量，来提高犯罪分子进行银行抢劫案的作案“成本”，那么由于潜在的抢劫银行案的犯罪分子会转而选择偷车或入室行窃（或者也许他们会彻底改邪归正），银行抢劫案的案发数量会如我们预期呈下降趋势。

这至少在理论上讲得通。而实践中，我们需要理解哪些成本影响了人们的决定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决定。也许雇用更多的探员并不能真正改变小恶棍们抢劫银行的“成本”，因为你所面对的那些小恶棍们远不如黑帮教父阿尔·卡彭或赖昌星般“理性”（或者说“精明”），这帮鼠目寸光之徒会继续抢劫银行，尽管作案成本会有所增加。弄明白何种成本重要，不是仅靠经济学家们纸上谈兵就能做到的。我们不能沉溺于抽象的推理之中，我们需要指出如何衡量违法犯罪行为的程度；在走私犯和经济黑帮实际生活中这种犯罪行为是如何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经济利益作出反应的；走私犯和经济黑帮把经济利益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

走私就是桩生意

几十年前，产自亚洲的电子产品和廉价玩具都在底部贴有“香港制造”的标签。如今标签已变成了“中国制造”。今天香港 700 万市民的生活已经非常富裕，他们已不必在薪水低的制造业中打拼，而与其紧密相连的中国内地为其提供了十几亿的人力资源储备。如今，香港重振航运业这一老本行，它以作为中国向世界各地出口商品的贸易中转站而闻名，同时也是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日渐增多的进口货物的流入地。

中国的香港与中国南方的广东和福建有着非常愉快的合作依存关系，广东和福建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出口引擎，香港为这两地的制造业公司提供了全球效率最高港口之一的深水港。同样，香港

也在与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的互动中实现了商业的稳步发展。每年价值近 7 000 亿美元的货物流经这一国际大港。

香港贸易的巨大规模及中国南方爆发的经济发展的活力，是集装箱运输革命的直接结果，而集装箱运输已经引起了全球贸易的变革。货物的装卸不再单纯依靠身强力壮的码头工人，不再通过工人们的肩扛手抬来装卸那些笨重的麻袋、圆桶或棱角很多的家具。如今这项工作已经交给 200 英尺高的巨型起重机，这些“大力士”把标准的 40 英尺见方的集装箱直接从船上卸到卡车或火车车厢里，或从卡车和火车车厢里装到船上。这些节省成本的新发明为中国南方的合法进出口商（如大量的玩具、服装和宠物口粮制造商）带来了福音。

然而，也很容易想象得到中国的“阿尔·卡彭”——武器、毒品和其他违禁品走私犯——如何从中受益。检验技术并没有跟上航运业革新的发展速度。大部分检查仍借助目测集装箱中货物的老式方法完成。而仅 2006 年一年就有近 2 400 万个 40 英尺见方的集装箱流经香港——每小时超过 2 700 个，在发货之前海关稽查人员只能检查一小部分装载货物。没有人真正知晓在这数百万穿梭于香港的形状一致、不具名称的集装箱里究竟装了些什么。

也许，没有人像赖昌星那般，能够得心应手地从高速货运和低技术含量检查之间存在的技术缺陷上获利更多。尽管他的“生意”是走私，但经他之手贩运的货物本身并非是典型的违禁品。20 世纪 90 年代，赖昌星的进出口生意就将烟草、汽油、豪华轿车、电视以及其他许多高关税奢侈品带进了中国内地。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进口这些商品

并未按规定缴纳关税。他的“生意经”比贩运海洛因或武器级钚更显平常，但用走私的方法赚回大把钞票正是他的经商之道。据1998年中国政府的调查显示，这位走私大亨从中国香港走私到中国内地的货物总值折合美元60亿，给中国政府造成了数十亿元的关税损失。

在通过海关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数百万吨货物中，很容易就弄清楚他如何逃税的。在那些集装箱里有高关税烟草吗？没有！只有一些老木浆。一些船载货物压根儿就没有报关。那么他又是如何在这么多年来进行这种非法买卖而又逃脱处罚的呢？腐败！几乎半数的中国海关官员都登上了赖昌星的“贿款单”。

赖昌星算得上是中国走私犯的老大，还是其他守法进口商中特立独行的一个？多亏了1998年那次中国政府试图将赖昌星绳之以法的执法行动，如今我们对这个赖昌星一手打造的走私帝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但要揭开另外许多尚未缉拿归案的走私犯的非法活动的内幕仍是难上加难。除赖昌星之外，究竟还有多少惊天走私案？这些走私犯们又是用何种手段将他们的货物秘密运入中国内地的呢？

事实表明，上述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公众触手可及的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之间的贸易统计数据其实已经把一切和盘托出了，当然，前提是你知道去哪儿找到这些数据并明白其中的含意。尽管中国政府在搜查和追捕走私犯方面确实比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强很多，但仅靠这些贸易统计数据，外加一些经济学常识，我们就能提供中国走私犯在走私活动范围和作案手法方面的概况。理解走私的性质是弄清楚中国政府如何打击赖昌星犯罪集团的第一步。

关税和走私诱因

要明白走私的经济学意义不必当犯罪集团的老大。回忆一下你上次出国度假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回国的美国游客允许带回价值达 800 美元的免税商品。倘若超出这一限定，“山姆大叔”可就要对你买的东西征税了。假如你在意大利花 2 000 美元买了一个古奇牌手包且希望避税 10%（相当于 200 美元），如果你对所购商品进行申报，就必须支付这部分关税。当你忐忑不安地在海关红色通道（申报通道）和绿色通道（无须申报通道）间来回移动时，你有几个选择。你可以把标签撕下来，假称这个包的售价仅为 799 美元；你可以说自己是在早些时候去意大利买的；你可以把它压在箱子最底下并祈祷自己不会因随机箱包检查而被拉到一旁。

一些明显的因素影响这一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的决定。试图偷偷将这个手包带过海关的主要收益在于漏报关税省下的 200 美元。随着税率的提高，走过绿色通道看起来越来越诱人。就成本方面而言，被揪出来的概率和受罚程度都很重要。你会冒着遭小额罚款或被拘留的风险漏报关税吗？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会抽查 1/10 的旅客吗（相当冒险的做法），或者抽检率仅为 1‰？（还有，这些随机检查的随意性有多高？你最近赴巴基斯坦的旅游签证将你置于国土安全部的监视名单里了吗？）你规避手包关税的方法也可能取决于你试图偷运入境的是什么。这个手包是否看起来已经过时了，因此更容易以用了两年的旧包“身份”通过检查？它足够小从而可以被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箱底

部？在决定向官方申报那些商品时，将走私视为生意的进口商每天都要进行此种经过缜密估算的赌博。

我们如何发现官方无法发现的走私？我们不会抽出铁棍开始搜查香港、纽约或新泽西港内的全部船载货物，以期发现有多少古奇包为非法舶来品。相反，我们将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数据的某些特点，对走私行为进行更接近客观的衡量。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出口商报告的从 A 国向 B 国出口的货物总量与 B 国从 A 国进口的货物总量。这两个数字的差别，即报告的出口货物量与报告显示的进口货物量的差别，就是我们对走私数量的衡量结果。

这一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你可以无限量出口你需要的商品，而且无须缴纳关税。除了某些涉密军事技术外，美国政府希望有人购买本国产品且为本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当你在罗马机场被问及随身带了哪些物品登机时，如实相告带了古奇手包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当你在纽约入关时，可以说自己只买了一个便宜的手包或者根本没买什么手包从而免交高额进口税。这种做法将在意大利对美国的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留下有趣的矛盾记录——众多高档皮货从意大利登机离境赴美但鲜见入境记录。乘坐国际航班偷运未申报古奇手包的旅客越多，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的“走私黑洞”就越大。

赖昌星就在中国的香港地区与内地的贸易统计数据中留下了这样的“大窟窿”。许多满载香烟和汽车的集装箱从中国香港发往中国内地，但从未入关，至少官方进口统计数据的显示是这样的。在香港之外运

作的其他许多笔生意也与此相同。我们将利用非法交易造成的“走私黑洞”来估算香港的出口商向中国政府瞒报漏报了多少应当缴付的关税。在走私尚未成风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弄清楚那些已上报的从中国香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商品与上报的中国内地从中国香港进口的商品完全一致。但我们发现很多中国内地进口的商品，如赖氏企业的众多进口货物，在实际运作中“消失”了。

经济学家眼中的走私内幕

英国根据与中国的清政府签署的 99 年租借条约割据中国香港一直到 1997 年。尽管如今香港已回归中国十几年，作为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港，它仍享有高度的经济自主权。香港产的商品进入中国内地时需要交税。需要交多少关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进口商品的种类，且各项关税也是变化不定的。中国经济在数十年的“五年计划”的指导和调控下，其关税也在不断变化。

例如，1996 年中国规定的香水税率为 55%，而当时的香烟税率更是高达 70%。关税也被用来保护和培育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和技术行业。进口的外国车至少需缴纳 100% 的关税，视频监控器的关税税率同样也高达 50%。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进口产品，如铁矿石和铝矿石则可免关税。中国决策者们用一种非常缜密的手段调整那些看起来类似产品的税率。你若问“镗床或者铣床”的税率，这就取决于它属于“数控镗床或者铣床”（10%）还是“其他类型的镗床或

者铣床”(20%)，这种区别对待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别呢？也许“五年计划”的制定者们认识到了数控镗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许数控镗床游说团体在中国的组织相当完善，也有可能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理由。这种看起来非常随意的关税差别在中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相当普遍。

这就在香水进口商和铁矿石进口商之间、数控镗床及其他类型镗床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一系列不同的刺激因素。结果，香水制造商的走私额度就会变得非常高，而铁矿石厂商根本无须走私。总体来说，关税税率越高，为了避税而发生的走私案也就越多。而这也反映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间的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日益扩大的“走私黑洞”上。

与合著者魏尚进(Shang-Jin Wei)一起，我们确实在这—统计数据中发现了这一“黑洞”：依据1996~1998年间的贸易统计数据，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间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高关税商品的“走私黑洞”确实比其他商品的“走私黑洞”大得多。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这种关系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有多强大。关税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走私黑洞”就会扩大3个百分点。因此其他镗床(20%的关税税率)的走私率将比数控镗床(10%的税率)的走私率高30%。

这将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中国进口商一直以来面临的高额关税。实际上，走私的猖獗暗示了中国关税高得令人难以理解。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将其他种类的镗床的关税从20%提高到40%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每次有镗床产品入关时海关收益都会翻番。然而，经估算，我们认为走私案将大致增加60%(即关税每上涨1个百分点

对应的走私率会上涨 3 个百分点)。因此,如今上报的各种进口镗床数量尚不足实际进口镗床的半数。关税增加的实际效应(每台进口镗床的关税收益翻番,而上报的进口镗床不足实际进口数量的一半)将是负面的。换句话说,由于走私各种货物的出口商数目增加,在大幅抬高关税税率的情况下,政府实际赚到的钱要少很多。

考虑到走私造成的损失,30% 的税率出现多大幅度的提高都会造成关税收益减少。那么,如果说政府设定如此高的税率仅仅是自欺欺人的话,为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近半数进口商品的税率都高于这一水平?

我们想到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高关税是无害的”。中国政府也许一直以来都为本国新兴的汽车和计算机(或镗床)行业提供法律保护,设置高关税壁垒而不顾短期收益损失。最终,这些行业的发展将创造更多的企业收益和国民财富,至少从理论上讲确实如此。与之相似,政府也可能一直采取家长式的做法对某些产品设置高关税,从而使本国民众免受香奈儿香水和绝对牌伏特加的诱惑。再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目标并非获得关税收入。相反,决策者们希望保护本国文化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

另一种算不上体面的解释则是,关税一直居高不下是某些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这恰恰是为了迫使进口商们自寻出路。一方面,走私犯们只是试图向港口官员瞒报其集装箱内的货物且希望能交到好运。但为何要冒着被捉甚至坐牢的风险走私呢?在中国的审判体系中,大规模走私,轻则可判 10 年劳动教育,重则可判死刑。相对来说,较为安全的方式就是,通过让有助于自己的政府官员分取走私红利这种方

式来收买他们。世界各国的海关官员都发现，对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收取相应“好处费”）反而能使自己过上好日子，因此会尽其所能将关税税率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从而也让走私犯更为关注海关官员的“工作”。

尽管有这么多尽职尽责的海关官员，或者由于存在同样多的腐败官员，我们仍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有多少起走私案。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对走私活动的严厉打击显示，我们已经记录在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非法交易是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庇护下完成的。臭名远扬的赖昌星就曾把许多福建省高官的名字列入他的“贿款单”。地方港口的官员提前准确告知赖昌星手下的船长哪些集装箱将被抽检。这些集装箱就会装进合法商品（且已缴纳关税），而同一批次的另外成百个集装箱则装满了高关税走私货。在某些情况下，赖老板还会花些本钱买通那些他看来爱管闲事的港口稽查员。他的关系网延伸到政府最高层，包括厦门市副市长、海关关长以及远在北京的公安部副部长。

艺术品的走私与走私的艺术

意大利的小村庄蒙特莱昂内蒂斯伯莱托（Monteleone di Spoleto）很希望原本属于自己的伊特鲁里亚战车回归。这辆古老的战车在很久之前就被当地的一位农夫从地里挖了出来，据报道他在1902年将其卖给了两个法国人，换来了两头母牛。这辆战车最终流落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方面短期内没有将其运送回意大利。

利的计划。据当地村民介绍，这辆战车是在暗地里或者很有可能是在非法情况下被劫掠走的。博物馆方面拒不承认曾作出有违道德之事，并排除了自己违犯美国法律的可能性。也许双方都没有错。

大多数国家禁止或严格限制古玩和其他文化艺术品的出口，这当然包括价值连城的著名文物，如伊特鲁里亚战车和古希腊雕像，也包括仅值几百美元的小物件，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陶器瓷片和曾在19世纪使用的钱币。只有在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出口此类器物，但这些东西几乎不可能得到政府许可。相反，与其饱受向官僚机构提交出口申请却迟迟无法得到答复之苦，还不如瞅准时机买通边境地区的海关稽查员。

不管怎样，走私犯都可以将古币、陶器、雕像和战车带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其编制的艺术品进口商手册中解释道，违犯别国法律并不必然意味着同样违犯了美国法律。尽管艺术品进口商可以将违法出口品运送到美国境内，但必须如实向美国主管部门汇报。否则，艺术品进口商将被判定为伪证罪，其商品也将被查封。

出口时谎报，进口时则如实汇报。考虑到艺术品交易商面临的经济刺激，每年进口到美国的古董数量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古董数量也就不足为奇了。至少官方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的确实如此。瑞士和德国艺术品进口市场的情况也类似。

在那些很容易通过行贿绕开出口限制规定的国家，如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叙利亚等，这种古董“走私黑洞”尤其明显。在国际

透明组织的全球评级中，这些国家每年都被评为高度腐败的国家。因此，借助古董走私犯们在其货物运入美国时的如实（或较为真实的）汇报，经济侦探们很容易在相关贸易统计数据中发现走私犯们走私活动的蛛丝马迹。

最终，我们可以用相似的方法挖出军火商、毒贩和其他躲在国际贸易最黑暗角落里各种非法交易的参与者。做到这些所需的，就是，找出各国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的差别，找出那伙精于算计的走私犯们中间哪些人对这些差别的反应与教科书中研究走私问题的经济学家的描述相似。

贿赂：是经济车轮上的油还是沙？

这让我们又回到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出的问题——在何时及何种程度下腐败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破坏？中国的制造商需要廉价石油，以使工厂开工运营及使各种车辆正常行使。赖昌星曾一度被誉为厦门的城市英雄，他因将物价维持在城市贫民可负担得起的水平上和为经济迅速发展提供助力而享誉厦门，尽管这是以牺牲政府税收为代价的。在1998年中国政府开展的打击走私犯罪的行动中，走私活动减少了，同时，广东省的官方进口商品数上涨了12%。但由于省内工厂忙于应对高价进口物资，如石油和原材料（这些物资无法再以免税方式进口），该省出口商品量直线下降12%。

“走私有益于中国经济。”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给轮子上油”的论调，该论调认为，腐败是在一个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冗长的官样文章所累的系统顺利完成各项工作的一种方法。举一个较极端的例子，在中非国家乍得，需要花两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办妥一份开办企业的法律文书（在美国只需6天），而获得建仓库的许可则要花将近半年的时间（在美国仅需一个多月）。如果说你在乍得有个很好的商业机会，那么也许正是因为乍得也是个非常腐败的国家，你才有了这样的商业机会。至少借助行贿，你没准儿就能买通拿到法律文书并尽早开工的路子。

腐败推动商业发展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向官员行贿以期减少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这种做法未免过于片面。假设各公司情愿支付贿赂金从而求得方便，那么，作为受贿方的政府官员会认识到，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提高关税或者给公司设置更多监管方面的障碍来大捞一笔。在许多国家，规则执行者即规则制定者，因此他们仅仅为了获取更多的贿赂金就可以随意设置各种繁重的新法律。公司心甘情愿支付贿赂金的做法，实际上把各种繁文缛节推到了政府办事程序的重要位置。

赖昌星是如何逃脱的？

在中国，偷逃关税的办法不止一种。例如，赖昌星想要进口10元一只的冻鸡1000只，而且想找个法子偷逃20%的冻鸡进口税。首先，

赖昌星可以谎报他打算进口的这批冻鸡的价格，谎称他那些 10 元一只的冻鸡价格仅为 5 元一只。但倘若他碰到一位对家禽市场行情略知一二的海关稽查员，那他和他这 1 000 只冻鸡可能就要掉进沸水里了。此外，他也可称自己的集装箱里只装了 500 只冻鸡而非 1 000 只，但如果有位海关稽查员偏偏要打开集装箱清点数目，这么做也颇为冒险。即使海关稽查员并未窥探赖老板船上所装冻鸡的实情，他们可能也晓得一只普通冻鸡的重量，因而会发现装运的这“500 只”鸡有超重嫌疑（为安全起见，集装箱须经例行称重）。

最后，赖昌星还可以谎称自己装运的根本就不是鸡，而是另外一种关税税率较低的家禽，从而达到少交关税的目的。例如，假设进口火鸡的关税税率为 10%，那么赖昌星谎称他进口的这批家禽实际上是火鸡。比起将这批装运的家禽说成“四门轿车”来，这种说法在海关那儿更容易蒙混过关——冻鸡和火鸡重量相差无几，对运输条件的要求也颇为相似。即便有那么一位老实的海关稽查员恰好往集装箱里瞄了一眼，他也很可能把冻鸡错认成火鸡，而不太可能把冻鸡和比它个头大很多的小汽车弄混。

正如我们所见，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在各自的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上报的出货产值确实存在巨大的“走私黑洞”：从中国内地入境的高关税冻鸡的出货产值低于从香港离港的冻鸡的出货产值。为了弄清楚这是否是由部分冻鸡在运输过程中丢失或肉鸡定价过低所致，我们也可以检查进口产品的数量中存在的“走私黑洞”，进口数量也是进口商必须向海关申报的一项统计数据。如果高关税货物的“走私黑洞”较

大，那么进口商必定在他们上报他们进口产品的数量时做了手脚（上报 500 而非 1 000 只冻鸡）；如果高关税商品与低关税商品间的装运数量没什么差别，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出货产值存在的差别是由于进口商谎报了每件商品的价格所致，因此，像冻鸡这样的商品运抵中国时出货产值变少的原因，并非冻鸡实际到货数量减少，而是由于进口商上报冻鸡的价格为 5 元每只，而非 10 元每只。那么，就会出现将冻鸡与火鸡混淆的第三种可能性，我们将对其做简要介绍。

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进口商在鸡肉及其他商品数量的上报方面还算老实，但他们在汇报每件商品的价格时却说了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也许很难验证特定家禽各部分（是肉质肥美，还是“骨瘦如柴”？吃的是有机饲料，还是散养？）的最终市场价格，但很容易将 40 英尺的集装箱过秤并依次估算每一批货物的价值。

弄清楚高关税冻鸡是否被掉包成了低关税火鸡，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让我们思考一下税率为 10% 的火鸡的进口贸易中存在的“走私黑洞”就会明白，其与 20% 税率的冻鸡贸易中的“走私黑洞”看起来非常相似。如果进口商将这些高关税冻鸡错标为火鸡，那么通过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国香港进口到中国内地（包含在中国内地海关统计数据内的）的火鸡数量，比从中国香港出关发往中国内地（包含在中国香港海关统计数据内）的火鸡数量更多。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留心观察火鸡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大规模“走私黑洞”。而且，如果对冻鸡征收的关税提高到 30%（或对火鸡免征关税），那么可以预见，进

口到中国内地的火鸡数量将远远超过冻鸡数量。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预见，如果与火鸡相似的商品（其他种类的家禽——鸡、鸭、鹌鹑）税率提高，上报的火鸡进口数量将有所上升，如此一来火鸡“走私黑洞”将变得越来越大。但从未被误认为是家禽的四门轿车及其他种类产品的“走私黑洞”将不会受家禽类关税调整的影响。

贸易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种“冻鸡变火鸡”的花招儿正是造成冻鸡进口数量减少的原因，而且，事实上，这种诡计也能对总体上的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走私黑洞”作出解释。如果你完全从中国香港的出口数字和中国内地的进口数字所体现的表面价值来判断，你会相信，在从中国香港进入中国内地时，冻鸡和火鸡间发生了某种奇妙的转化。与之相似，其他种类的镗床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变成了数控镗床。事实上，这仅是走私犯们通过错标装载货物应对高税率而留下的“书面记录”。

还原真相：通过经济刺激来遏制走私

对香港出口货物流失的调查，除了能让我们这些经济学家领受高薪，也能帮助中国政府重新调整进口商激励机制，从而有效地制止走私行为。

我们无须猜测中国政府迫使香港走私犯无利可图的首选方法是什么。在1998年那场反腐败行动中，赖昌星出于性命之忧而流亡海外，他的一千同伙以及作为保护伞的那些政府高官纷纷被捉并受到法律严惩。

除了法律严惩，更为严格的海关执法措施，确保了抓获走私犯的概率大大提高。北京派往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外部调查员，对地方的海关机构进行了整顿，而且加大了对到港货运集装箱的開箱检查力度。

政府实行的新的执法举措，重在提高走私活动的风险，而非减低走私收益。但这种反腐败行动的成本也非常高。我们提到过，1998年大规模反腐行动后，产业投入的成本急剧升高，因为中国企业不得不为额外的关税成本埋单。对政府公共财政和本土制造业企业而言，这些执法措施本身也是一种负担——远洋运输遭延误成了家常便饭，因为海关稽查员的检查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和资源，以便对大量装载货物及其标记进行细查。

一些走私犯肯定无法继续从事之前所做的生意，但他们并不会随着日渐升级的执法行动而金盆洗手。他们又想出了新招儿来对付政府出台的新举措，尽管成本收益较之前大为减少。2006年，笔者发现了一个经由下水道将香港与深圳连接起来的地下隧道，高关税电脑芯片和移动电话正是由此被秘密走私到中国内地的。其他走私犯则借着夜色，用高速游艇将少量电视机和电脑私运到中国内地。其他货船则停泊在港内仅装载极少量违禁品，以确保如被官方查获能免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但仅凭秘密管道、深夜走私和小批量出货做买卖，香港走私犯们在集装箱运输方面会损失惨重，而正是集装箱运输让国际贸易变得有利可图的。

中国政府付出的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努力最终是否获得了应有的

成效？这恐怕很难说了。显然，政府在惩罚某些腐败官员方面做得颇为成功，但至少从短期看，随着进口投入成本的增加，这同样导致了当地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现在我们考虑另一种方法，该方法更注重削减走私利润而非走私成本，这会有相同的效果，但付出的成本却相对低得多。我们发现的大多数走私贸易并未包含少报价格或数量的情况。相反，是用“火鸡置换冻鸡”这样的诡计制造了大多数“走私黑洞”——走私犯们仅谎报了他们准备运载入境的产品类型。因此，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将火鸡关税与冻鸡关税税率持平，而且总体上确保那些极为相似以至于很容易被错标的商品税率相同。税率不必降为零，因为政府确实需要以某种方式增加税收，而且通过征收关税这一税收方式还是比较重要的。而实际上，冻鸡的关税可以与小汽车的关税存在差别，只要它的税率与很容易被冒充为冻鸡的火鸡税率差别不是特别明显就可以了。底线就是，相似产品的税率应当相似，以免出现“火鸡置换冻鸡”这类问题。

去除关税差别仅仅是走私犯与执法者之间“猫捉老鼠”游戏的第一步。对于每一项政府行动，走私犯们都会作出相应的回应。在1998年之前的海关制度下，错标货物是成本最低的避税方法，但我们已经看到，赖昌星等走私犯在寻找其他方法钻海关法律的空子方面确实称得上“足智多谋”。这种反应可能包括转换到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其他渠道——少报货物数量或价值、在偏远地点停靠及卸货从而完全绕开港口。他们甚至可以编造出其他一些我们和中国政府都未曾想到的方法来蒙混过关。但通过堵住偷逃关税的最常用途径，中国政府将迫

使走私犯们感到走私生意不再像以往那样有利可图，从而开始铲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走私毒瘤。

美国的关税体系：不可思议的矛盾

与中国相似，在政府官僚制度、传统势力与产业游说的强大势力的交互作用下，美国关税体系的层次也堪称“大杂烩”。钢铁行业的关税可被视为这种关税体系混乱状况的典型。2001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钢铁行业中存在的“发展平稳、有利可图的走私生意”。美国进口商当时正充分利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钢材产品中存在的巨大的关税差别——每吨钢材的税率从几美分到数百美元不等，将进口的低等级线材（10%关税）上报为高等级线材（零关税），将钢筋上报成轧钢等，不一而足。2002年，小布什总统试图将钢铁税率提高8%（至30%），以拯救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大选中非常重要的“摇摆州”）发展停滞的钢铁行业。美国的欧洲和亚洲贸易伙伴齐声反对这么做并威胁会进行报复（包括提高橘汁税率，旨在拉拢另一个政治“摇摆州”——佛罗里达州），而最终小布什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到2003年12月，大多数钢材产品的税率降为零，于是，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显示的钢材产品进口量在短时间内就出现大幅攀升，这主要是合法货运量上升所致，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本土进口商不必再像走私犯那样锱铢必较了。

有关钢材关税的争论，最终以一种能遏制走私和违法活动的方式

解决了。但美国的关税制度仍存在着各种不可思议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中隐约可见“烟雾缭绕的密室贸易谈判的痕迹”（《纽约时报》语）。毛衣的关税是多少？信不信由你，这取决于毛衣是男式还是女式——男士毛衣的关税为18%，比女士毛衣的关税税率高出1倍还多。这并非表明政府对男士用品有偏见。如果你在商场里挑泳衣，女士泳衣的税率为27.8%，是男士泳衣的1.5倍。尽管我们并未像研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那样深入细致地研究美国服装进出口的统计数据，但我们能猜测到这些产品进口到美国时，其中许多毛衣、泳衣及其他服装很有可能把性别标签变了一下。终结这种特殊做法的最佳方式就是，确保男士与女士服装的关税税率一致。

在抛开赖昌星等走私犯转而进入下一章讨论联合国外交官们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和美国通常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制定法律的。存在高关税及男士和女士服装间的关税差异，是因为某些人能从这种安排中获益。也许有一个格外强悍的游说国会议员的人为国内女士泳衣生产商助阵，并且已说服国会议员为比基尼设立保护壁垒。也可能深圳的海关官员对那些错标的进口冻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赚到一笔数额不低的外快。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简单的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经济意义仍让那些大企业、腐败的海关稽查员及其他执法官员难以接受，因为这妨碍了他们的买卖和生计。

这就是改革常常受阻的症结所在。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政府部门或普通民众普遍支持打击走私的行动或反腐败的计划呢？尽管经济学家自诩为社会学者，但他们很少提及和讨论人们的行为在社会层面上

的意义。人们如何形成自己的意识、态度、品位及信仰？为何行贿和违法活动在某些国家被视为可耻行径而在其他国家却成为常态？改革者们如何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从而为改革提供动力？尽管这向来属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范畴，但这对治理腐败至关重要，在下一章中您将听到经济学家们的声音。

ECONOMIC GANGSTERS

第四章 腐败的文化

“世界凶杀之都”市长的奇遇

1994年10月，哲学和数学教授安塔纳斯·莫库斯（Antanas Mockus）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哥伦比亚波哥大市市长。当时，波哥大仍笼罩在大毒梟帕布洛·艾斯科巴（Pablo Escobar）残余势力及此前10年禁毒战争的阴影下。这座城市犯罪活动如此猖獗，不无成为“世界凶杀之都”之虞，单1993年一年，该市就发生了4200起杀人案，而且市政府的腐败已经臭名远扬。波哥大市民对这种状况已经厌恶透顶，而莫库斯，这位自诩为“反政治人士”的人，此前从未涉足政坛，却被任命执行一项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消除混乱，重整秩序。

甫一上任，莫库斯市长就迅速采取行动，在市区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安排模仿秀表演。是的，模仿秀。他治理哥伦比亚为非作歹的大毒梟的创想，就包括聘请一群戏剧专业的学生扮成白脸儿、穿着紧身衣协助执行交通法规。这些模仿秀表演者既不带枪，也不卖门票。他们

将传统执法方式放在一边，采用模仿秀演员的专长——模仿与嘲弄的方式来执法，但这种表演方式通常与维持治安没有太大关系，或者说至少与良好的治安秩序联系不大。

模仿秀表演者们紧跟在那些乱穿马路的人身后，在他们身后大步走，模仿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对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司机们，模仿秀表演者们使用的方法也一样。模仿秀表演者随身带着一沓卡片，这些卡片上都印有一个拇指向下的标志，当司机们堵塞交通或闯红灯时，他们就会模仿足球裁判的姿势向违章司机亮“红牌”。随着表演者们不断向希望能助他们一臂之力的普通市民分发这些“红牌”，这很快就发展成了众人皆来参与的街头闹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据称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的比重就从 26% 跃升到了 75%。确实，实践证明，这些基于模仿的调节方式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方面是大受欢迎且高效的，以致莫库斯又聘请了 400 位模仿秀表演者将这场声势浩大的模仿秀延伸到波哥大市的其他地方。

起初，莫库斯的改革计划范围有限，但很快就超出了交通秩序这一领域，他制定了一整套措施解决包括暴力犯罪和贫困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引进了一项“枪支回购项目”，由政府提供现金补偿和法律赦免，以便收回民间存在的大量非法武器；他砍掉了交通警察部，该部的 2 000 位成员无一不是声名狼藉的受贿者；他倡议开展了大范围的公共服务活动，为城市贫困阶层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包括加大对公共交通设施的投入。但莫库斯感到，对他实施的所有改革措施而言，改变人们态度的努力最为重要，而且他感到改善公民文化素质是解决这

个城市各种痼疾的关键。

实际上，莫库斯的努力已经改变了波哥大这座城市。在1997年辞掉波哥大市市长职务竞选哥伦比亚州州长之后，2001年莫库斯重回波哥大开始了非常成功的第二个任期。到2004年他卸任时，波哥大的谋杀案案发率已经下降了70%（尽管按照美国的标准，其案发率仍很高），绑架案案发率下降幅度更大。如今在拉丁美洲各主要城市，波哥大是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波哥大的市政预算实现盈余而未出现赤字，而且波哥大市政府仍投资兴建了更多的学校、图书馆、道路和公园，还有各种公共文化艺术设施。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波哥大市民的变化，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复兴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

如果你而言这些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改革稍显陌生，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在我们看来又是多么稀奇古怪，我们这俩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接受“动机决定论”的谆谆教诲，这种观点在解释中国南方贸易中存在的走私现象方面很成功。显而易见，莫库斯的各项政策主张与经济学对动机作用的强调不谋而合——把你的枪交出来，作为回报我将付给你13万比索（考虑到1300比索对1美元这样的汇率，13万比索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引人注目，但这也是实实在在的钞票）。但针对波哥大司机的、以模仿秀为表现形式的执法活动，其动机或激励因素又是什么呢？莫非不良行为的唯一后果就是遭曝光而受公众耻笑？

只有那种目光狭隘的经济学家才会认为，人们的行为仅受物质奖励或惩罚的驱动。人们确实会对直接的经济刺激作出反应，但他们也会对来自社会约束或自身道德感的潜在激励作出反应。现在就回想一

下上一次你把一张口香糖包装纸丢在人行道上时有何感受，或者其他某些行为尽管算不上违法但却招来路人的怒目相视时你有何感受。模仿秀表演者不可能对违章司机处以罚款，也无法将那些违法者关进监狱，但对遭人耻笑的恐惧也很可能帮助波哥大那些横冲直撞的司机和行人转变为更遵守秩序的市民。

对于社会改革家们而言，安塔纳斯·莫库斯的市长任职经历，听起来似乎就像哄孩子们入睡的童话故事。莫库斯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将心理学、人际关系处理技巧与传统的激励方法巧妙地融合在自己推行的诸项改革举措中。例如，当波哥大面临市政供水不足的问题时，这位新市长就在电视镜头前沐浴（而且是半裸着身子），当他打肥皂时，就把水龙头关掉了，而且鼓励其他人也效仿自己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他的政府班子反复强调减少用水量可为家庭节省开支。因此，很难说莫库斯在重塑社会规范方面的创造性尝试是否在城市复兴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或者是否凭此就能断定他仅仅是一位诚实、高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他懂得如何往传统“药方”中加点糖，从而更容易下咽。

笨蛋，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撇开这位南美洲不同寻常的市长的离奇经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为何在某些社会中守法行为是社会生活的主流，而在另外一些社会里腐败却成了常态。是什么让纽约人或旧金山人不会在因超速行驶而被警察叫停时偷偷把 20 美元塞给警察，而在尼日利

亚的拉各斯和孟加拉的达卡以及西西里岛的巴勒莫，这些地方混乱不堪的公路上总会出现这样的交易？

你并不想对纽约街头的巡警进行贿赂，因为你晓得这么做很有可能把自己送进远近闻名的赖克斯岛监狱（Rikers Island）去体验那里的牢狱生活。相反，你完全可以设想在拉各斯通过贿赂警察而逃脱处罚，而且这也是警察们期待你做的事。警察当差的薪水也许不过 20 美元多一点，而且他们需要赚外快以养活家人。确实，如果你在尼日利亚洁身自好，不行贿，你更有可能遭到警方的刁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公共服务提供商打交道时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在美国，我们无须支付贿赂金就可以得到饮用水、电话或电力服务，而在世界很多地方情况却恰恰相反。

在这些地方，交通警察或掌管自来水供应的官员们在应对试探性贿赂时的反应不仅仅在心理预期方面存在差异，更有甚者，在某些地方，日常所需都可将普通老百姓逼成为非作歹的经济黑帮。有些地方，执法力度薄弱为贿赂和腐败体系奠定了基础，而有些地方行贿却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习惯——很快，每个人都会明白行贿就是办成事情的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美国人是在一套与此完全不同的文化规范的约束下成长起来的，在这种环境中，年轻的父母、老师以及其他权威人物无不在宣扬和灌输这样一种观念——贿赂是错的。

腐败仅仅是执法力度薄弱造成的？或者说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也影响着人们是否作出行贿的决定？我们如何铲除腐败事关重大——是推行强调经济刺激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抑或因循莫库斯专注于

文化教化的做法？但实践中，如莫库斯所见，很难将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事实上，我们可能确实并未想明白主要是模仿秀还是罚款改变了波哥大市民的行为方式。

而且，铲除腐败问题很难通过对比各国间的腐败程来决定选用哪种方法。各国间在文化素养及执法力度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假设我们希望通过对比尼日利亚和挪威的情况，来分析应对腐败过程中的文化素养与政府的执法力度。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尼日利亚（在国际透明组织 2005 年腐败认知指数排名中，尼日利亚几近垫底）在民众的文化素养和政府的执法力度方面都较差。而挪威，这个全世界久负盛名的廉洁国家，在国民的文化素养和政府的执法力度方面均表现出众。

因此，将尼日利亚人和挪威人进行对比，就像将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一样。在对比这两个国家的腐败状况时，我们必须弄清楚二者在政府的执法力度和国民的文化素养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素养的作用，在某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将挪威人置于执法不严的环境中，以发现北欧社会的道德规范（而非挪威的法律制度）是如何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

不过，挪威人也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他们反对为满足我们的的好奇心而对本国法律制度作出改变，以满足我们探究在遏制腐败的过程中国民文化素养与各种刺激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好奇心。此外，即使为了进行试验，我们能将奥斯陆的居民迁往拉各斯，我们仍将面临如何评判违法犯罪活动的程度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组织一项活动，将政府官员们从世界各地

带到一个“避风港”，在这儿他们的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然后我们从中找到一些衡量官员们腐败行为的方式。实际上，这并不像最初听起来那么不靠谱。毫无疑问，这是（或者说曾是）被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官们占据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停放座驾而从来都不会在意曼哈顿那些有着鹰一般锐利的眼睛的女停车管理员愤怒的目光。

外交豁免

在好莱坞大片《致命武器 2》(*Lethal Weapon II*) 中，一位“种族隔离时期”名为艾金·拉德的南非外交官公开从该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向外走私毒品，每当他因走私毒品而遇到麻烦时，他总能通过亮出身份和陈述“外交豁免”辞令而免于联邦法院的起诉。尽管从理论上讲，国家间存在对外交保护的限制，这也能够有效防止经济黑帮走私毒品、抢劫银行，或者闯下其他大祸，但拉德领事教训梅尔·吉布森饰演的角色——一位稍显疯狂的洛杉矶警察局的刑警——时说的话几乎完全正确，他说：“尊敬的长官，你甚至不能对我开一张违章停车罚单！”

从外交这个重要层面上讲，这部影片中对于外交官停车权的描述稍显不当——事实上，可以对驻纽约与任何其他城市的外交官的违章停车行为开出罚单。但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不同的是，外交官从来不必支付罚款或者就此道歉，更不必担心警方会拖走他/她的车。那么，究竟何种原因或力量能迫使一位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为他/她的停车

罚款而埋单，或者就此而言，他/她会不吝时间在曼哈顿找一个法定停车位？尽管在这个寸土寸金之地，在路边找个（合法）空地儿与找一间能负担得起房租的公寓同样费劲。当然，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这是每个人应当做的事，因为它关乎良心和教养。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各国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们与我们假定试验中的研究对象极其相似，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试验，区分执法力度和文化素养在遏制腐败方面的作用。这上千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拥有高等学历的中高级外交官齐聚纽约，这里并没有针对他们违章停车行为的正式的法律规定。现在我们再次回忆一下第一章中提到的腐败定义，即“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当他在高峰时将自己的座驾并排停在一条拥堵的街道上时，如何更好地描述这样一位隐藏于外交豁免权后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呢？

由于他们每个人都要到位于纽约市中心的联合国总部上班，这些外交官们无不为日常停车而苦恼。而且，大多数（78%）国家驻联合国使团的办公室位于距联合国大厦半英里的街区。因此，即使在那些只是去办公室把座位坐热了或者嚼嚼鱼子酱面包的日子里，在这个地段，这些官员也几乎要面对同样令人郁闷的停车问题。花时间找个合法的停车位，为私人停车埋单，或者干脆坐地铁，作出这些决定是出于道德考量而非迫于法律制裁。无论在哪个国家内部，违法的“收益”都大致相同，而一个外交官对待违法的态度不同，其所产生的违法心理或违法行为也不同。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种过错（或相关素养的缺失）视为外交官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某些受良心约束的外交官

会遵守相关规定，还是会有一些外交领域的经济黑帮利用他们的停车特权任意并排停放车辆。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观察现金贿赂与收受的过程，在之前谈到的案例中我们无法观察到这个过程。在此，由于外交官们在停车方面拥有外交豁免权，我们有幸得以近距离审视他们。尽管不存在针对外交官的诉讼，但他们的违章行为仍在这个城市的道路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借助于纽约市政厅提供的详细记录，我们能够将1997年11月到2005年11月间每一起未交罚金的违章行为与违章者姓名、国籍相匹配，甚至包括违章行为发生的确切时间、类型和地点。我们可以追踪每个外交官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停车经历。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数据库，从中可以发现哪些国家的外交使团无视纽约的停车规定及其违反规定的频率。

要最终揭开谜底，现在还稍欠火候。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掌握支付或收受的实际贿赂的相关信息，因此也就无法衡量外交官的祖国的腐败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借助同样基于调查的腐败情况的衡量方法，在第一章中我们曾因“空谈”问题而提出过质疑和批评。我们使用了世界银行研究员们提出的一个指数，它将许多不同腐败指数得出的结果平均化。每一个指数均展示了国外游客、当地企业所有者与其他国家对当地腐败情况颇为了解的专家们的反应。例如，在一项调查中，投资者会被问到，“你所在的行业中，各公司对与纳税有关的额外支出款项或贿赂金不记录的现象的普遍程度如何？”他们也被问及对于为了作出有利于企业的司法判决、为企业提供公共事业服务以及

授予其公共事业合同会向政府官员行贿的预期是多少。由此得出的指数值越高，专家就会认为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就越高。

借助手中的这些指标，我们可能会把一国腐败情况与该国外交官的违章停车情况联系起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回答本章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法律威慑力不足的情况下，来自腐败国家的外交官是不是更有可能违反规定？

外交官眼中的停车

在对跨国违章行为进行比较之前，我们先审视下一位被我们授予“纽约违章停车终身成就奖”的科威特外交官，其“充满波折”的违章史，对每个人来说，既不无裨益又非常有趣。这位“X大使”的违章停车记录可见图4-1。

“X大使”于1999年4月到任，一年半之后他的违章记录就进入了我们的数据库。他就职后，抓紧时间迅速地投入到工作中，以至于在那一年剩余的日子里共违章249次，不包括8月他在度假的大部分地区（这段时间没有违章记录）。他保持着自己的违章记录提升速度，2000年累计达到526次——每星期超过10次，或者说每个工作日两次！而在2001年到8月时违章次数更是高达351次，在进入违章程度稍有减轻的秋天之前，他也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周两次。我们也可以追踪“X大使”在曼哈顿闲游时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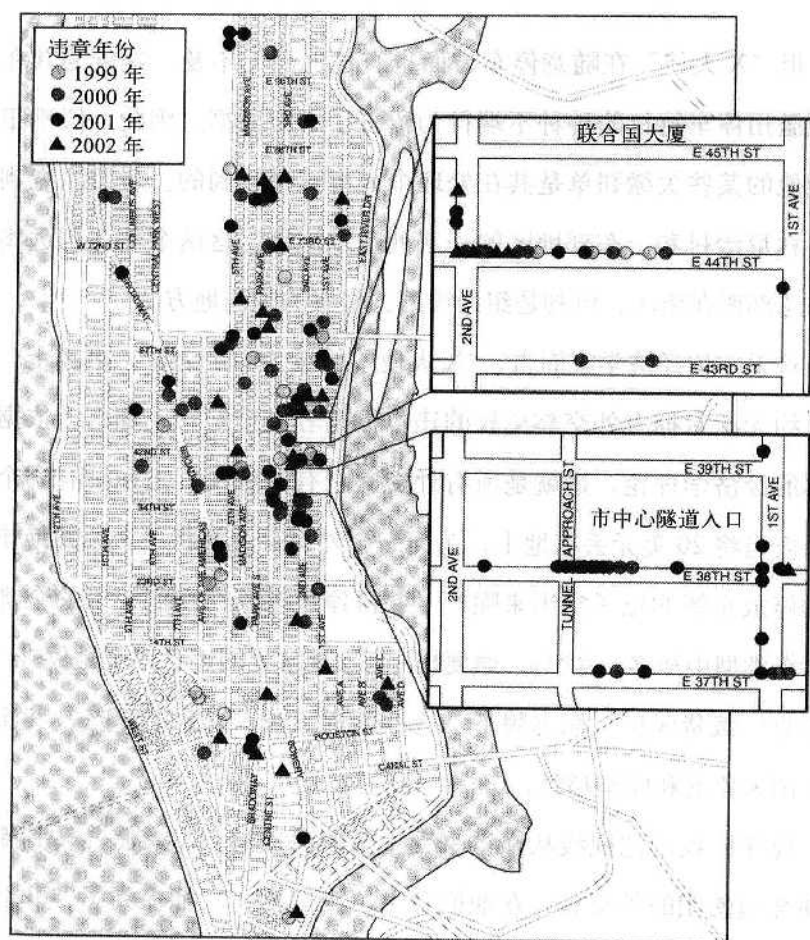


图 4-1 “X 大使” 违章停车记录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X 大使”在联合国总部附近转悠的时间相当长。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这是“X 大使”每天工作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你想对“X 大使”的停车记录作出一种较为宽容的解释，你可能会说他的大多数违章行为与其所任公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堪称为国家利益而牺牲自我的楷模。

但“X大使”在随意停车方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为其在曼哈顿滥用停车特权的种种不端行为留下了书面证据。因此，似乎很有可能他的某些欠缴罚单是其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收到的。我们注意到他在格林尼治村和上东部地区的一系列违章记录：这两个地方均远离联合国总部所在街区，但却是纽约喝酒、聚餐的绝佳地方。

对于一位经济学家而言，“X大使”的行为不足为奇。事实上，既然纽约无法对拥有外交豁免权的违章停车者进行处罚，那么，依据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这就是所有外交官应有的表现。正如没有哪个理性人应当将20美元丢在地上，为何一个外交官就要将一个位置绝佳的并排停放车辆的位子空出来呢？（并排停放车辆在我们记录的全部违章停车类型中居多，占5%。顺便提一下，最常见的违章停车是停在“不得停靠！载货区！”标志牌下，这种违章记录占总数的43%，其次是停在消火栓前和停车超时。）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懂得享受生活的科威特“X大使”转到挪威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在他们身上，我们第一次捕捉到了“非经济人”的影子。尽管纽约无力惩罚那些常常违章的外交官，但在我们抽样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在纽约没有一位挪威外交官发生过一起拒不缴纳违章停车罚款的事件，他们的北欧近邻瑞典人也一样。

挪威人和瑞典人倾向于遵守法律法规这一事实表明了，腐败与文化二者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不足以作为证据。“X大使”并非出自一个因打击腐败而广受好评的国家。科威特也并未被视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确实，科威特在世界银行提出的腐败指数表上排位居

中。真正的考验在于，在世界上的诸多国家中，其外交官在纽约的违章停车行为，与其国内对腐败行为的文化容忍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

外交官违章停车的真相

为了得到一个各国外交官在纽约违章停车记录的可比较的衡量指标，我们把各国外交官的所有违章记录加在一起，然后除以该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人数，从而得出“每位外交官”的违章指标。如此一来，也能有效地保证大国（如拥有 86 位外交官的俄罗斯使团），和仅有寥寥几个大使的小国（如只有两位外交官的乍得使团），适用于这些国家的衡量指标相同。

在图 4-2 中，我们可以看到，纽约外交官违章停车记录（即我们的“腐败文化”衡量指标）与以柱状图表示的国内腐败程度。我们将世界各国分成 3 组：高度腐败（据世界银行提出的腐败指数排名前 1/4 的国家）、低度腐败（后 1/4）和中度腐败（排位居中）。图 4-2 中柱形图显示了每一组中平均每位外交官每年累计的未交罚款的违章停车次数。最左侧的柱形图，即来自低度腐败国家的外交官平均每年违章停车次数稍高于 10 次。而右侧柱形图所示高度腐败国家的外交官年均累计违章停车次数接近于前者的 3 倍，即每年有近 30 次未交罚款的违章停车记录。而中度腐败国家的外交官平均每年违章次数则居中。如此看来，来自高度腐败国家（右侧柱形图所示）的外交官有无视纽约停

车规章之嫌，而那些来自低度腐败国家的外交官基本上都非常遵纪守法，尽管他们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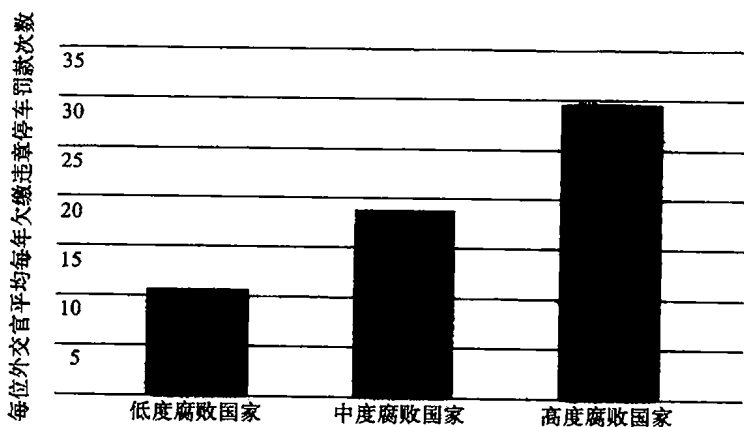


图 4-2 1997 年 11 月~2002 年 11 月间，纽约，国家腐败程度与每位外交官欠缴违章停车罚款次数

作为理解这一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我们在表 4-1 和 4-2 中列出了每位外交官违章停车次数最多和最少的国家连同世界银行测算出来的它们的腐败指数排名。表 4-1 展示了在腐败指数排名中同样得分较高的许多国家。例如，埃及、乍得和保加利亚均为图 4-2 中右侧柱形图所示的高度腐败国家。表 4-2 中所示遵守停车规章（如果他们遵守的并非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准则）的外交官，大部分来自左侧柱形图所代表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非常低且其驻联合国外交官几乎没有违章停车记录。

表 4-1 违章停车记录：1997 年 11 月~2002 年 11 月间，
每位外交官平均每年欠缴违章停车罚款次数最多的 20 个国家

排序	国家	每位外交官违章次数	腐败程度评分
1	科威特	249.4	-1.07
2	埃及	141.4	0.25
3	乍得	125.9	0.84
4	苏丹	120.6	0.75
5	保加利亚	119.0	0.50
6	莫桑比克	112.1	0.77
7	阿尔巴尼亚	85.5	0.92
8	安哥拉	82.7	1.05
9	塞内加尔	80.2	0.45
10	巴基斯坦	70.3	0.76
11	科特迪瓦	68.0	0.35
12	赞比亚	61.2	0.56
13	摩洛哥	60.8	0.10
14	埃塞俄比亚	60.4	0.25
15	尼日利亚	59.4	1.01
16	叙利亚	53.3	0.58
17	贝宁	50.4	0.76
18	津巴布韦	46.2	0.13
19	喀麦隆	44.1	1.11
20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38.5	0.97

表 4-2 中的大部分国家的表现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例如，在各国腐败程度调查中，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始终位列最廉洁国家之列。1997~2005 年间，在来自芬兰、挪威、丹麦和瑞典的 66 位外交官中，总共出现了 12 起未支付罚金的违章停车事件，而且这 12 起违章

表 4-2 表现良好的外交官：1997 年 11 月~2002 年 11 月间，
每位外交官平均每年欠缴违章停车罚款次数为零的国家
(在人口超过 50 万且有 5 名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的国家中选取)

国家	每位外交官违章次数	腐败程度评分
澳大利亚	0.0	-2.21
加拿大	0.0	-2.51
哥伦比亚	0.0	0.61
丹麦	0.0	-2.57
厄瓜多尔	0.0	0.74
希腊	0.0	-0.85
爱尔兰	0.0	-2.15
以色列	0.0	-1.41
牙买加	0.0	0.26
日本	0.0	-1.16
荷兰	0.0	-2.48
挪威	0.0	-2.35
巴拿马	0.0	0.28
瑞典	0.0	-2.55
土耳其	0.0	0.01
英国	0.0	-2.33

停车事件中的好几次都是由一位行为不端的芬兰外交官所为的。但是，在外交官将国家荣誉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国家中也有一些令人惊讶之处。例如，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都有着非常好的停车记录，然而，在专家们看来二者均为高度腐败国家。但是，任何事情都很少是绝对完美的。除本国腐败状况外，各种随机事件大概都会影响到任何一位外交官在某一特定时间在载货区停车的决定，而且由于这一“干扰”事

件的存在，腐败与违章停车间的统计关系（与其他任何统计关系类似）就变得不再完美了。

一些特别诚实（或不诚实）的外交官的例子除外，还有一些腐败之外的因素全面地预示了每位外交官的违章停车次数。显而易见，纽约的法定停车场过于昂贵——参加会议停车半小时的费用约为 15 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每月的停车费就有 450 美元。对于办公经费充裕的荷兰或日本外交官而言，这点钱仅是执行公务中很小的一部分开支，但在曼哈顿中心区停车一个月的费用却是乍得或苏丹普通人一年薪水的两倍。因此，也许只有那些来自富裕国家的外交官（这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可能更为有效）才有资本遵守这“昂贵”的规则，而来自乍得这种贫困国家的外交官只能在非法停车和回国述职时向上司解释为何被贴罚单之中作出选择。

对违章停车行为所持的这种“宽容”观点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毕竟，缺少足够停车费预算开支的外交官完全可以像成百上千的中产阶级的纽约人一样乘地铁上下班。通过图 4-2 展示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判断出，外交官的违章停车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腐败直接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国民收入状况决定的，借此我们就能检验腐败或收入状况是否能更好地解释外交官的违章停车行为。而且，当我们用一种叫做“多元回归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对这两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时发现，在解释违章停车的原因时，腐败比国民收入更有说服力。

此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更为简单的、无须借助统计分析的方

式)弄清楚我们的结论是否源自一种可能性,即只有来自富裕国家的外交官能承担得起停车费用。我们可能会承认,乍得外交官为了完成工作被迫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在联合国总部附近并排停放车辆。然而,很难用贫困这个理由来解释为何他们在深夜去格林尼治村的酒吧消遣时仍会把车停在酒吧外的载货区(效仿“X大使”的做法),或在上下班高峰时在拥挤路段并排停放车辆,进而使糟糕的交通状况雪上加霜。即使我们限定在这些社会后果恶劣且明显的自私自利的违章情境中时,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行为模式。

你无法拒绝的一个停车位

贫困国家在世界银行提出的腐败指数及我们制定的违章停车衡量指标的排行中居末位,而当我们往排行列表顶端看时,很快就会发现许多富裕国家在列。电影《教父》的忠实拥趸,或者说意大利人自己,并不会因发现意大利是西欧外交官中人均违章停车次数最多的国家而惊讶。作为西西里黑手党的发源地,意大利的政治腐败并非仅仅体现在警匪片和美国 HBO 有线电视的收视神话中。

除了让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颇为头疼的腐败丑闻,意大利的腐败文化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意大利国家足球队入围 2006 年世界杯决赛圈并最终夺冠,但其时整个意大利足球队正笼罩在国内联赛“假球”和“黑哨”的阴云之下。遭指控的球场不端行为牵涉到国际足坛知名的四家职业

足球俱乐部官员。尽管有遭重罚的危险（包括降到意大利足球低级别联赛以及对涉嫌打“假球”的球员禁赛），但公诉人最终决定对涉案俱乐部和个人从轻处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至少对于职业足球运动员来说，意大利仍然是一个深受腐败文化困扰的国家，在这里那些打“假球”而被捉现行的人并不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观察家们也许会惊讶于发现俄罗斯外交使团似乎倾向于遵守纽约的停车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的条条大街上都能听到“冷战”的回声。其时，俄罗斯是头号违章停车国，而俄罗斯外交官与纽约市政府间的紧张关系也不断升级，最终因一位喝醉了的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与一位开罚单的管理员发生摩擦而使紧张关系达到高潮。这就是一个因不理智的停车决定而有可能升级为一场国家间外交冲突的实例，之后，俄罗斯上台的亲西方政府则非常明智地严格要求其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端正自身行为。

美国式的腐败

考虑到时常见诸报纸头条的美国国会腐败丑闻和公司非法侵占案，读者朋友们肯定在纳闷，如何解释美国外交官们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是相符的。但由于外交特权仅适用于在外工作的官员，因此我们的分析并不包括美国在内。

然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许多种方式研究外交官的停车习惯，从而对美国外交官违章停车的情况有所了解。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观察一个我们看来在文化传统方面与美国文化非常相近的国家，且假定美国外交官们有可能与这个国家的外交官的行为方式很相似。尽管我们的研究队伍中的加拿大人（包括雷）也许会对此感到恼火，但在文化传统方面加拿大确实与美国极为相似。当然，加拿大在很多重要方面仍与美国有所不同，包括其有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更少的枪支犯罪案件以及经常闹出点动静的魁北克省。（此外，加拿大人人均消费多纳圈数量是美国人的3倍，但我们并不能肯定这就说明他们的外交官行为有多么完好。）然而，在很多方面这两个国家是相似的。要是比较的话，加拿大在地理位置、收入水平、民主政治传统、英殖民背景、讲英语、流行文化等诸多方面很难与美国相媲美，尽管加拿大在多纳圈消费方面略胜一筹。如果我们相信美国外交官们真的会像美国的北方近邻“杜德利骑警”那样遵纪守法，那么美国也可以被添加到“遵章停车”的国家之列：研究期间，我们都没有在加拿大驻联合国使团中发现任何一个藐视纽约法律的外交官。该国使团的某些人确实收到了几张罚款单，但他们都当场缴纳了罚金。

考虑到2006年对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腐败案质询的裁决，读者肯定会犯嘀咕，为何所有的高谈阔论都在描述一种遵纪守法的加拿大人形象。我们认为这一部分只是为了强调我们的主要论点：藏在暗处的权钱交易不仅很容易被曝光（这表明加拿大有着高效的民主制度，能够及时曝光此类丑事），而

且会激起众怒，从而使民主党政府倒台。腐败的加拿大官员通常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意大利人则不必。

人们也许会就此对美国国会中曝出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行贿丑闻”或安然的“会计造假案”提出相似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在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由于选举人将政府部门中存在的腐败和受贿行为列入他们的首要关切之中，公众与政府间已经显露出较明显的罅隙。滥用公权力的行为遭曝光，正义得到伸张，这些事实无不表明，美国有着一整套健全的国家道德体系和法律制度。

由于外交官特权仅在国外适用，另一个搜集美国外交官行为表现证据的方法就是观察一下美国外交官在国外的表现。但是，有一个例子却不是特别令人安心。自2003年以来，伦敦已经对那些驶入中央商务区的车辆征收了适度的“交通拥堵费”。政府的初衷是疏导交通并提高公共交通工具的利用率。根据对外交豁免权作出规定的《日内瓦公约》（这一豁免权也让我们见识了美国外交官的违章停车罚单记录），外交官无须支付这一费用，但尽管如此，驻伦敦的大部分外交官都缴纳了相应的费用。美国代表团则显得尤为特殊，这个代表团有着一个并不是很光彩的荣誉——因未支付“交通拥堵费”而需缴纳的累计罚金数额最高，自2003年至今累计已超过100万美元。

那么在逃避“交通拥堵费”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又有哪些国家与美国为伍呢？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苏丹——无不是位列纽约收到违章停车罚单最多的15国名单之中的高度腐败国家。美国外交官在伦敦的所作所为甚至不及科威特人。也许加拿大确实并非合适的比较对象……

给“山姆大叔”贴条

来自这么多国家的外交官，特别是那些来自低度腐败国家的外交官，在纽约收到的违章停车罚单如此少，这有违标准经济学的假设。显然，情感、规范和心理状态确实主宰了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我们讨论社会规范和腐败文化时，我们已经涉足心理学领域了。但这也使我们面临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话题——什么决定着违法的“情感成本”？显而易见，我们的讨论表明，对于那些违章行为如家常便饭的社会人士而言，这种“情感成本”并不高。但又是什么使人们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却能在晚上睡个好觉呢？

好人时常也会做些坏事、自私自利的事，但为了减轻道德负担，他们会给自己编个漂亮的故事，解释他们的行为其实并非如此差劲。也许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们（与芸芸众生一样）会想到用合理化的解释来判断他们的不端行为。

可以举个例子解释我们此时的所思所想。想一想，一个体重仅有95磅、在学校备受欺负的小受气包。让我们姑且称这个胆小懦弱者为“雷”，把那个恃强凌弱的家伙叫“特德”。假设一天早上，雷发现校车椅子上有张20美元的钞票，而他断定经常欺负他的特德刚刚就坐在那儿。何不把它据为己有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公平的，因为这20美元可以补偿雷所遭受的痛苦，难道不是吗？一报还一报，对吧？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然而，这仍算得上偷窃，毕竟“两错相加仍是错”。但至少从雷的角度来看，很容易理所当然地把钱收入

囊中，特别是当这么做恰恰符合他自身的利益时。事实上，即使特德并没有捉弄你，但你是雷的朋友，你也可能把这笔钱拿走，以表明你通过惩罚班里的害群之马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因果报应的目标。

与我们的道德信条相似，在地缘政治方面，在某些人眼中，美国同样扮演着“恃强凌弱者”的角色。那些感到被美国捉弄（或遭美国忽视）的国家的驻联合国使团的官员，或者深受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烦扰的国家驻联合国使团的官员们，在为自己在美国滥用外交豁免权进行辩护时，内心不会有任何挣扎。这是他们对抗“大佬”而不考虑后果的一个机会。

我们的研究还借助了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提供的信息，该基金会收集了2002年超过40个国家对美国态度的信息。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调查人员调查了每个国家有代表性的人群对美国感情的强弱程度，衡量指标从4（“持非常不友好观点”）上升至1（“持非常友好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高分（接近4）反映了对美国的一种极其消极的态度，而那些低分（接近1）则反映了一种积极的态度。

考虑到伊拉克战争的负面影响，你也许期待在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调查数据中看到相当多的4和3。然而，这项调查在美军坦克进入巴格达之前就完成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从之后的更多的调查结果中获知，在当今世界诸多国家的人们眼中，美国仍广受欢迎——尽管其受欢迎程度已不如伊拉克战争之前。在表4-3中，我们对各国的反

表 4-3 2002 年最为亲美与最为反美国国家排序

排序	国家	不看好美国观点的平均得分， 从 1（看好）到 4（不看好）
最为反美的国家：		
1	埃及	3.67
2	巴基斯坦	3.51
3	约旦	3.27
4	土耳其	3.04
5	黎巴嫩	2.93
6	阿根廷	2.77
7	孟加拉	2.54
8	韩国	2.48
9	印度尼西亚	2.40
10	玻利维亚	2.40
最为亲美的国家：		
1	洪都拉斯	1.59
2	委内瑞拉	1.67
3	加纳	1.67
4	菲律宾	1.68
5	尼日利亚	1.71
6	肯尼亚	1.74
7	乌干达	1.76
8	乌兹别克斯坦	1.77
9	科特迪瓦	1.79
10	危地马拉	1.84

资料来源：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调查数据。

美情绪进行了排序，大家可以看到，在某些地区，美国深受爱戴，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则遭到斥责，反美情绪

最为强烈的当属中东地区。但这种笼统的分析还是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各地区不同的国家对美国的态度也不一样。

事实上，对美国态度最为消极的 5 个国家全在中东地区，而且为首的国家正是美国名义上的盟友——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我们注意到埃及和巴基斯坦在外交官违章停车次数表中的排名也基本在前列。更有趣的是，来自对美国抱有好感的国家的外交官，即使是来自那些腐败程度最高的国家的外交官，在曼哈顿街道上违章停车的记录也出奇的少。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划分成 5 个区域，进而比较各区域对美国态度较为积极的国家与对美国态度较为消极的国家在外交官违章停车次数方面的差别，各区域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各国外交官违章停车次数明显多于那些亲美国家外交官的违章停车次数。

再返回来观察表 4-3，很容易发现为何这一模式在欧洲范围内并不适用：在对美国态度特别鲜明（或消极或积极）的国家名单中，显然找不到欧洲各国，因此，欧洲内部对美国态度的差别相对较小。可以说，其他因素（如腐败）在解释欧洲外交官行为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我们发现那些反美国家的外交官更乐于在纽约随意停车。

我们已经发现，对美持憎恶态度的各国的外交官认为，纽约的停车规定“并不适用于他们”。当然，亲美或反美应当不会对各国外交官回国后的腐败行为产生任何直接影响。但从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理解国内腐败状况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这些发现暗示了政府官员们对本国法律的态度或观点所

起到的作用。设想有两个国家，其中一个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另一个国家，民族自豪感则被富有竞争性的种族、部落和宗教信仰淹没了。在国家认同感较弱的国家，其政府官员更容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辩解，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将本国法律视为不合理的教条而弃之不理（这种做法与驻纽约、对美国评价较低的外交官的做法如出一辙）。顺着这一逻辑思路走下去，我们发现，某个社会中爱国感情的强度会影响到政府官员业绩的好坏，也会影响到政府机构的运转是否顺利。

我们确实掌握了一些直接证据，证明民族自豪感在遏制腐败方面可能会发挥某种作用。我们是通过一种自我参照的方式发现这些证据的。当我们的联合国大厦前停车罚款单调查以学术论文形式于2006年出炉时，各国记者纷纷予以报道，其中有一位读者来自爱沙尼亚。尽管在我们的全球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违章停车排序中，爱沙尼亚的排名并不是特别糟糕，但与他们的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近邻们相比，爱沙尼亚的外交官们在违章停车方面记录最差。爱沙尼亚媒体对此深感不爽，为本国外交官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我们猜测，许多爱沙尼亚人同样会感到耻辱。

但是不像心存悔意的爱沙尼亚人，当一个国家没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或耻辱感）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许多已经降临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灾难（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此进行详细分析）的观察家们，已经点出了许多非洲国家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感情薄弱这一问题。只需想象一下中非共和国这样简单的国名，听起来像该国人民为表达他们的国家观念而选择的名称，还是被法国殖民者强

加上的一个名号？大部分有着 40 多年独立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在欧洲殖民者 19 世纪 80 年代发动的“瓜分非洲”殖民运动中被人多地合并到一起，而没有关注各自的语言、族群或历史。考虑到这些新兴的“后殖民宗主国”必然存在的爱国精神缺失，也许任何人都不会惊讶于非洲的腐败程度——贪官污吏对民脂民膏的搜刮——属当今世界之最。民族感情在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作出停车决定时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缩影。

腐败的底线

109

从外交官在纽约停车遭遇的困境中，我们得出的主要经验就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者，无论是当地官员还是世界银行的要员们，必须意识到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能削弱他们作出改变的尝试。换句话说，在普遍的腐败文化面前，仅仅变更法律制度可能远远不够。事实上，改革派很容易会碰壁，而阻力恰恰来自政府内部的执法者。

世界银行前任行长、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将消除贫困国家腐败现象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彰显个人英雄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从而希望在世界银行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但对违章停车问题开展的研究，向沃尔福威茨这样的国际援助捐赠者（他们旨在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程度）提出了警告：腐败行为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中，根除腐败并非小事一桩。仅采用经济奖惩这种传统的方法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

最后，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头的故事：一位堂吉诃德式的改革家，成功地将曾经无法可依且充斥着暴力和混乱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带入正轨。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们的行为表明，文化因素至关重要，其影响持久且稳固，但正确的选择应是：永不放弃变革的努力。完全可以对文化进行重塑，尽管这需要创意、天才和巨大的努力。与从致力于改变腐败行为的经济诱因的政策制定者那儿取得的收获相比，从一位貌似离经叛道的哥伦比亚教授型市长那儿得到的经验似乎同样弥足珍贵。

再论经济诱因：曼哈顿停车简史

说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们完全凌驾于纽约停车规章之上有点夸大其词，但自联合国初创时起，外交官“随时随地”停车这一外交特权就成了纽约市政府与联合国间摩擦的源泉。20世纪60年代，美国前国会议员约翰·林赛（John Lindsay）就任纽约市长期间，曾试图全面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特别是外交官违章停车的问题。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外交官们违章停放的车辆就阻塞了联合国总部周边的各条街道，违章停放的车辆遍布由第59大街、34大街、第五大道和东河环绕的市中心区。

尽管纽约市政府承认外交豁免权保护违章停车者免交罚款，或者其座驾免遭扣押，但林赛市长手下一位幕僚则敏锐地发现了一处有益的漏洞：可以将一辆违章停放的外交官座驾拖至合法停车场。此外，相关规定并未要求拖往地点必须位于附近——可以是曼哈顿

岛的任何一处停车场。

因此，在1967年1月底，违章停车的外交官们发现他们违章停放的座驾已经从普拉扎广场和俄罗斯茶馆门前的人行道附近消失了，而出现在曼哈顿岛鼠患成灾的码头附近——西区合法的停车场里。联合国立刻向美国国务院申诉，要求纽约市政厅对他们的车“放行”，最终市长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由此开始了纽约历任市长与拥有外交特权的外交官们之间长达40年的矛盾纷争。当我们开始研究时，曼哈顿的停车问题正是最严重的时候，仅1996年一年就发生了16万起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违章停车事件。时任纽约市长的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采取了强硬措施（与他在大多数事情上的做法一样），频频发出警告要将违章停放的汽车拖走。但他的做法同样遭到国务院阻挠而未能善终，后者担心这么做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美国国务院作为中间人促成了意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诸项协议，但驻纽约的外交官们并不理睬所有这些协议。

2001年11月，朱利亚尼将这个问题交给了继任者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后者在许多前任“摔跤”的地方以某种方式取得了成功。2002年9月，在国务院的关照下，纽约市撤销了185辆3次严重违反停车规定的领事用车的外交牌照，而且市政府获准撤销其他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的违章停车3次以上的车辆牌照。显然，并非仅仅文化因素对违章行为起作用，直截了当的

经济刺激同样重要——这一新规定生效后，一夜之间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的违章停车记录下降的幅度超过了 95%。

乍一看，这似乎验证了经济学家所持的“个体刺激至关重要”这一观点。但正如安塔纳斯·莫库斯在波哥大城市治理实践中所证明的，“文化重要”和“物质激励重要”二者并非相互排斥的，二者很有可能互相强化。要记住，许多国家并没有资本按照布隆伯格市长的方式随意加强执法力度。在大部分视法律为儿戏的地方，改革可能因遭到执法者群体中存在的腐败文化侵蚀而被削弱。

附录

表 4-4 1997 年 11 月~2002 年 11 月，
每位外交官平均每年缴纳违章停车罚款的次数

违章停 车排名	国家	在严格执法之前， 每位外交官 违章次数	1998 年驻联合 国使团的 外交官人数	1998 年各个 国家的腐败指数
1	科威特	249.4	9	-1.07
2	埃及	141.4	24	0.25
3	乍得	125.9	2	0.84
4	苏丹	120.6	7	0.75
5	保加利亚	119.0	6	0.50
6	莫桑比克	112.1	5	0.77
7	阿尔巴尼亚	85.5	3	0.92
8	安哥拉	82.7	9	1.05
9	塞内加尔	80.2	11	0.45

(续)

违章停 车排名	国家	在严格执法之前, 每位外交官 违章次数	1998 年驻联合 国使团的 外交官人数	1998 年各个 国家的腐败指数
10	巴基斯坦	70.3	13	0.76
11	科特迪瓦	68.0	10	0.35
12	赞比亚	61.2	9	0.56
13	摩洛哥	60.8	17	0.10
14	埃塞俄比亚	60.4	10	0.25
15	尼日利亚	59.4	25	1.01
16	叙利亚	53.3	12	0.58
17	贝宁	50.4	8	0.76
18	津巴布韦	46.2	14	0.13
19	喀麦隆	44.1	8	1.11
20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38.5	6	0.97
21	巴林	38.2	7	-0.41
22	布隆迪	38.2	3	0.80
23	马里	37.9	5	0.58
24	印度尼西亚	36.5	25	0.95
25	几内亚	35.2	5	0.57
2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4.9	6	0.35
27	南非	34.5	19	-0.42
28	沙特阿拉伯	34.2	12	-0.35
29	孟加拉	33.4	8	0.40
30	巴西	30.3	33	-0.10
31	塞拉利昂	25.9	4	0.72
32	阿尔及利亚	25.6	13	0.70
33	泰国	24.8	13	0.26
34	哈萨克斯坦	21.4	9	0.86

(续)

违章停 车排名	国家	在严格执法之前, 每位外交官 违章次数	1998 年驻联合 国使团的 外交官人数	1998 年各个 国家的腐败指数
35	毛里求斯	20.7	4	-0.20
36	尼日尔	20.2	3	0.88
37	捷克共和国	19.1	7	-0.35
38	莱索托	19.1	6	-0.03
39	博茨瓦纳	18.7	8	-0.53
40	不丹	18.6	5	-0.46
41	斯里兰卡	17.4	5	0.24
42	智利	16.7	14	-1.20
43	突尼斯	16.7	11	-0.11
44	尼泊尔	16.7	6	0.59
45	伊朗	15.9	20	0.63
46	斐济	15.7	3	-0.20
47	意大利	14.8	16	-1.00
48	利比里亚	13.7	6	1.44
49	马拉维	13.2	6	0.50
50	巴拉圭	13.2	6	0.97
51	卢旺达	13.1	3	0.55
52	乌克兰	13.1	14	0.89
53	西班牙	12.9	15	-1.59
54	菲律宾	11.7	20	0.26
55	加纳	11.4	10	0.44
56	毛里塔尼亚	11.3	5	0.29
57	几内亚比绍	10.9	10	0.82
58	爱沙尼亚	10.7	3	-0.49
59	蒙古	10.3	5	0.28

(续)

违章停 车排名	国家	在严格执法之前， 每位外交官 违章次数	1998 年驻联合 国使团的 外交官人数	1998 年各个 国家的腐败指数
60	亚美尼亚	10.2	4	0.71
61	哥斯达黎加	10.2	19	-0.71
62	科摩罗	10.1	3	0.80
63	柬埔寨	10.0	5	1.27
64	多哥	10.0	5	0.45
65	越南	10.0	15	0.60
66	格鲁吉亚	9.8	8	0.64
67	中国	9.6	69	0.14
68	也门	9.2	8	0.57
69	委内瑞拉	9.2	16	0.77
70	葡萄牙	8.9	16	-1.56
71	乌兹别克斯坦	8.9	5	0.98
72	马达加斯加	8.8	8	0.80
73	坦桑尼亚	8.4	8	0.95
74	利比亚	8.3	9	0.91
75	肯尼亚	7.8	17	0.92
76	刚果（布拉柴维尔）	7.8	6	0.99
77	克罗地亚	6.6	9	0.33
78	吉布提	6.5	3	0.80
79	斯洛伐克共和国	6.5	12	0.08
80	刚果民主共和国	6.4	6	1.58
81	法国	6.2	29	-1.75
82	印度	6.2	18	0.17
83	老挝	6.2	9	0.70

(续)

违章停 车排名	国家	在严格执法之前, 每位外交官 违章次数	1998 年驻联合 国使团的 外交官人数	1998 年各个 国家的腐败指数
84	土库曼斯坦	5.9	4	1.13
85	巴布亚新几内亚	5.6	3	0.70
86	洪都拉斯	5.5	6	0.75
87	斯洛文尼亚	5.3	8	-0.83
88	吉尔吉斯斯坦	5.2	5	0.69
89	尼加拉瓜	4.9	9	0.75
90	乌拉圭	4.5	11	-0.42
91	斯威士兰	4.4	7	0.19
92	塔吉克斯坦	4.4	4	1.12
93	纳米比亚	4.3	11	-0.24
94	墨西哥	4.0	19	0.39
95	阿根廷	4.0	19	0.22
96	新加坡	3.6	6	-2.50
97	罗马尼亚	3.6	10	0.38
98	乌干达	3.5	7	0.62
99	匈牙利	3.3	8	-0.69
100	马其顿	3.3	4	0.30
101	玻利维亚	3.1	9	0.41
102	秘鲁	3.1	9	0.17
103	海地	3.0	9	0.85
104	约旦	3.0	9	-0.21
105	白俄罗斯	2.7	8	0.60
106	比利时	2.7	14	-1.23
107	塞浦路斯	2.5	11	-1.38
108	圭亚那	2.3	5	0.26

(续)

违章停 车排名	国家	在严格执法之前, 每位外交官 违章次数	1998 年驻联合 国使团的 外交官人数	1998 年各个 国家的腐败指数
109	奥地利	2.2	21	-2.02
110	加蓬	2.2	8	0.90
111	俄罗斯	2.1	86	0.69
112	立陶宛	2.1	7	-0.07
113	萨尔瓦多	1.7	10	0.27
114	波兰	1.7	17	-0.49
115	冈比亚	1.5	8	0.49
116	马来西亚	1.4	13	-0.73
11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4	6	-0.13
118	黎巴嫩	1.4	3	0.32
119	德国	1.0	52	-2.21
120	厄立特里亚	0.8	3	-0.46
121	摩尔多瓦	0.7	4	0.51
122	韩国	0.4	33	-0.11
123	多米尼加共和国	0.1	22	0.53
124	芬兰	0.1	18	-2.55
125	危地马拉	0.1	9	0.63
126	瑞士	0.1	10	-2.58
127	新西兰	0.1	8	-2.55
128	英国	0.0	31	-2.33
129	荷兰	0.0	17	-2.48
13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0	3	-0.78
131	澳大利亚	0.0	12	-2.21
132	阿塞拜疆	0.0	5	1.01
133	布基纳法索	0.0	5	0.51

(续)

违章停车排名	国家	在严格执法之前, 每位外交官 违章次数	1998 年驻联合 国使团的 外交官人数	1998 年各个 国家的腐败指数
134	中非共和国	0.0	3	0.55
135	加拿大	0.0	24	-2.51
136	哥伦比亚	0.0	16	0.61
137	丹麦	0.0	17	-2.57
138	厄瓜多尔	0.0	9	0.74
139	希腊	0.0	21	-0.85
140	爱尔兰	0.0	10	-2.15
141	以色列	0.0	15	-1.41
142	牙买加	0.0	9	0.26
143	日本	0.0	47	-1.16
144	拉脱维亚	0.0	5	0.10
145	挪威	0.0	12	-2.35
146	阿曼	0.0	5	-0.89
147	巴拿马	0.0	8	0.28
148	瑞典	0.0	19	-2.55
149	土耳其	0.0	25	0.01

注：腐败指数来自考夫曼等人 2005 年统计的数据，指数越高表明腐败越严重。

第五章

暴力冲突与贫困： 谁来拯救他们？

“来吧，来吧，我亲爱的雨滴……”

——雷村黑牛斧头合唱团

曾经神奇的乍得湖

乍得湖已经消失了。这个横卧在非洲大地的神奇湖泊，有史料记载以来，它就一直哺育着生活在中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乍得人民，为居住在它周边的人民提供鲜鱼、淡水、灌溉的水源，它是当地贸易往来的一条水上通道。然而，它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消失了。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占地面积 25 000 平方公里的乍得湖堪称世界第六大淡水湖，面积与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相当。而今天，乍得湖更像一个烂泥塘而非内陆湖，其面积随着降雨量的多少而变化，似乎在有意戏弄当地居民，他们仍对它往日的辉煌念念不忘，渴望它有朝一日重新焕发青春。很久以前，湖里的鱼就基本死光了，而那些中年渔夫们也不得不彻底放弃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祖辈就世代在湖面上穿梭捕鱼以

维持生计。曾经的那些渔港废弃于荒漠之中，曾经停靠在渔港的渔船，现在就停在距离貌似湖边平地的泥潭 50 多英里远的地方。

随着灌溉越来越困难和当地气候越来越干燥，农作物产量已经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沙漠不断扩张迫使乍得从事畜牧业的人民向南部或东部气候更为湿润的地方迁移，有时这还会激起和已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部族间的冲突。一位被迫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渔民抱怨道：“这个湖在渐渐干涸，而我们将随着它慢慢死去。”

乍得湖的消失恰恰是非洲双重危机——贫困和冲突——的象征，与其引以为傲的往昔的帝国文明、精湛工艺和繁荣贸易形成鲜明对比，如今的乍得国内遍布幽灵般游荡的无以为生的渔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的农民，以及在荒漠中终日游荡以期寻得几株灌木喂养家畜的牧民。这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从其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在纽约的违章停车记录来看，乍得俨然已经成了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随着其经济衰退的加速，其政治动荡也不断加深。自从 1960 年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乍得几乎内战不断。自 1964 年以来，每年都会爆发一场冲突，而且事态日益恶化。近几年爆发的严重暴力冲突事件中，预谋叛乱的暴徒与政府互相争夺权力。

这些暴力冲突通常是在叛乱者和政府领导人唆使下的童子兵之间展开。很多情况下，新招募来的童子兵都愿意从军打仗。当湖里无鱼可捕而干旱又使庄稼损失殆尽时，年幼的乍得孩子除了加入叛军队伍以外，似乎已经无路可走，无论战争和冲突有多么的残酷和血腥！这些孩子实际上可以借助当兵掳来的“战利品”改善生活，而不是眼睁

睁看着这些好东西从眼皮底下溜走，特别是对于叛军或国民军而言，那些与任何武装集团都无瓜葛的农民是最容易下手的“猎物”。如果我们落到他们那般田地，我们或许也会以生存的“名义”做同样的事。求生的本能能使一些人群变身为经济黑帮。

种族隔离现象的长期存在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宗教因素、语言文化因素以及种族分离成为如今乍得冲突的三大因素。乍得南部主要是信仰基督教的黑人，而北方人则心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寻找精神认同和信仰归宿。在19世纪末乍得进入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之前，乍得大部分当地黑人仍遭北方穆斯林的奴役，而且奴役他们的不仅仅是拥有特权的上层，身为工人阶层、在乍得湖上以打鱼为生的穆斯林渔民也拥有黑奴。

乍得似乎陷入了一个“冲突陷阱”：贫困迫使走投无路的人参加武装暴力冲突，武装冲突导致贫困加重，而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又为相互交恶的对立武装集团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好战分子。很快人们就开始相信暴力冲突永无休止。倘若果真如此，为何还要苦苦饲养那些终究会被好战分子掠走的牛羊？为何还要耕种那些注定被好战分子夷为平地的庄稼？随着农民不再务农，牧民们将家畜尽数屠宰，乍得人被贫困和暴力铸成的越来越紧的绳套绑得喘不过气来。

不幸的是，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许多国家与乍得颇为相似，而且陷入贫困与冲突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辨别究竟哪个是根源。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内战是其遭受贫困煎熬的不祥之兆？或者恰恰相反？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我们希望做点儿什么以改变现状，那么

我们必须找到答案。但在晓得造成现状的主要原因前，我们将无力帮助乍得和其他国家找到这一恶性循环的破解之道。

我们无法对乍得或其他国家的暴力事件进行完整统计。但我们能够运用我们掌握的经济学工具集中研究某个不太可能出现的原因。排除美国中央情报局，排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紧张关系，排除人口过剩，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天气。事实表明，降雨不仅是我們进行经济分析的重点，而且也是造成非洲近年来暴力冲突的关键：当雨水匮乏时，战乱的爆发频率增大。尽管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弄明白了它是非洲国家国内冲突之根源，就可以帮助我们最终弄清楚如何终结非洲暴力和贫困酿成的“恶性循环风暴”。

武装冲突之祸

不光乍得遭遇了战乱之苦，世界范围内的武装暴行程度之严重简直令人惊愕。发达国家已经走出内战的深渊，但许多穷国国内冲突、战乱频仍的程度堪比乍得。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战争比和平更普遍。自1980年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发生过内战，且大多数集中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非洲，这个战乱和流血冲突爆发次数最高的大陆正是身陷不幸中的典型代表。在过去20年里，百万普通民众死于非命。发生在各国似乎无法穷尽的战乱，如在安哥拉、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布隆迪、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科特迪瓦、尼日尔、乌干达的战乱，引发了大屠杀、血钻、轮奸以及全副武装、吸毒成瘾的童子兵在检查站折磨过往行人的恐怖画面。

浏览一遍相关统计数据，对理解推动非洲结束战乱的紧迫性很重要，这么做无疑会让人厌烦但却非常有必要。1991~2002年间，在塞拉利昂内战中死亡的人数超过5万，另有数万人遭革命联合阵线叛军的残暴驱逐而无家可归。革命联合阵线叛军的“标志性”暴行就是砍断平民百姓的手，只因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进行中的战争更为血腥，据信有300万平民遇难。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只是在苏丹永无休止的战乱中发生的一场灾难，连年战乱已经使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将近百万人遇难，遇难人数占该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了10%。这些平民死亡人数中的每一例都比美国曾经经历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高出一个数量级。

由于一个国家的战争会向其他国家——无论远近——扩散开来，一场战争也就滋生了更多的战争。冲突超越国界，因为武装分子搜寻新的掠夺目标，各种轻武器似乎通过层层渗透也已经遍布整个地区。由于达尔富尔大屠杀，大批难民跨越边境涌入乍得东部，扰乱了原本正常的贸易模式，这一贸易模式曾为该地区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塞拉利昂内战就源于觊觎两国共同边境附近钴矿的利比里亚叛军发动的跨境袭击，这一袭击事件将塞拉利昂拖入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1994年种族大屠杀之后，成千上万绝望的卢旺达难民涌入

刚果民主共和国，从而开启了一场酝酿已久的反抗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中，刚果民主共和国臭名昭著的独裁者蒙博托于 1997 年被赶下台。但此后不久，其他反叛者群起而反对这些新的统治者，引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并且不断恶化。它的邻国——安哥拉、卢旺达和津巴布韦，也带着从该国巨大的矿产财富中分一杯羹的想法，纷纷派军队进驻刚果民主共和国。

我们并非身处这个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就可以免受国家内战余孽之苦，一个国家的内战造成的全球性震荡能够以一种极其恐怖的方式出现。失败国家能够为有组织的国际犯罪集团和恐怖组织提供一处不受法律约束的避难所，使它们从军火、毒品、稀有矿石（如钻石）贸易中牟利。阿富汗和哥伦比亚的冲突区域沦为大型国际贩毒集团的根据地。20 世纪 90 年代，基地组织成员就曾在苏丹和塞拉利昂设立据点，之后又将活动基地搬到了索马里。遭恐怖和暴力活动摧毁的国家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乍得的战乱并非仅仅关乎乍得本国。

在个别国家悲惨经历的冲击下，和令人麻木的伤亡统计数据中，这些国家的人们有些迷惘，使得我们描述的很多情况听起来很像人们在进行经济交易。当未来遥遥无期且你已经没有什么可输的了，为什么不拿起武器呢？在资源如此稀缺的情况下，从资源控制权的争斗中获得的好处，胜过慢慢陷入饥饿的风险？如果经济交易果真隐藏在这些问题的后面，也许经济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答案。

仇恨还是贫困？

由于理解战争的残酷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许多观察家便将非理性的和古老的部族仇恨视为非洲和其他地方内战的根源。深入报道这些国家国内冲突的各路记者认为，种族对立是他们观察到的任何暴力冲突的根源。而且某些内战，至少初看起来，确实与此种观点相符。这的确是我们听到的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最终的分析解释。在那场大屠杀中，仅仅3个月的时间，卢旺达胡图族激进分子就屠杀了将近100万图西族同胞及图西族政治反对派（然而没有人真正清楚被屠杀的确切人数——见后文中名为“数据：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文字框）。这便是20世纪40年代纳粹大屠杀以来第一起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

但人们总是将这一观点当做事实而非推测，这掩盖了经济因素在挑起不同种族间的暴力活动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事实上，近些年的调查显示，像卢旺达大屠杀这样赤裸裸的种族战争，更应归结为一个特例而非规律。许多国内战争实际上发生在种族较为单一的社会中。索马里，世界上在语言、宗教、种族和文化方面最缺少多样性的国家，就是一个更具典型性的案例。那里的对抗和冲突往往发生在相互对立的部落（实质上是大家族）之间，他们在长相、穿着、语言，甚至祈祷方式上都几乎一模一样。但索马里的同质性显然并未给其国民带来和平。即使在某些各种不同部族聚居的国家，如塞拉利昂，内战的“断层线”基本上都避开了种族和宗教界限。臭名

昭著的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的反叛人员来自该国不同种族，且在全国范围内对屠杀对象不做甄别。战争是极其恐怖的，但并不具有部族性质。

卢旺达大屠杀，也值得我们重新审视。除种族差别外，经济因素在触发暴力冲突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视，这源于该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联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卢旺达的经济高度依赖咖啡出口贸易，而且许多家庭（即便不是大多数）仍依靠在肥沃但有限的山丘上种植咖啡豆以维持生计。1989~1993年间，世界咖啡价格暴跌幅度超过50%，这主要是由于越南将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咖啡豆种植中，一些高档咖啡进口国出现了经济衰退，这些抑制了对咖啡豆的需求。在咖啡豆种植业崩溃前，卢旺达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随着他们的主要农作物价格下跌一半，许多人饿得两眼发直，这就制造了极端的经济条件，而胡图族控制下的政府也许正是借此机会将大批绝望的民众聚集在其种族屠杀的号召下的。

对于这一近代的暴力史，我们主要应当问责于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卢旺达大屠杀表明，二者都很重要。但我们并不会继续引述不具连续性和普遍性的单独轶事和案例，我们将转向对数据的分析。

数据：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可能会想，至少对暴力行为进行评估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我们只需关注一下晚间新闻就能晓得何处又燃起了战火。非常不幸

的是，战争总在制造大量血淋淋的人身伤亡事件。但你在报纸上看到的伤亡数字几乎全是猜测，而且并不是出自非常专业人士的评估。在战争引发的混乱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还存在运转协调的新闻机构或统计机构（更不用说记录像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出口产值等总体经济的常规统计数据了。）各人道主义机构疲于救人于炮火之中而无暇收集数据。通常情况下，唯一的伤亡统计数据都是由交战双方发布的，因此，在衡量暴力冲突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理解腐败现象时遭遇的“空谈”问题。

有关伊拉克战争中平民伤亡人数的争论便突出了这些困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偏远丛林相比，要统计伊拉克的伤亡人数应当易如反掌。伊拉克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比大多数非洲国家更富有，而且拥有一个更为庞大的官僚系统。如果不挖空心思制造些统计数据出来，这些官僚又能做些什么呢？在这个“大舞台”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部队、承包商和行政长官，引来世界各国媒体的持续关注 and 报道。然而，各方在迄今为止的平民伤亡人数的统计结果方面仍未达成一致。

美国政府的人员伤亡报告一般情况下都远低于独立评估，某些情况下甚至与独立评估存在很大差距。尽管美国政府发布的报告评估 2003~2004 年间伊拉克平民伤亡人数约为 1 万人，而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研究，则将平民伤亡总数确定为超过 10 万。与这些数据中掺杂的政治伎俩相比，衡量伊拉克战争伤亡人数

时采用的统计方式是否正确所引发的争论简直是相形见绌，这与越南战争中的平民伤亡人数估算在之前一代人中引起的广泛争论极为相似。同样，尽管媒体将其曝光，但对外界而言，达尔富尔大屠杀中的死难人数仍是个谜。

国内冲突中的伤亡人数则另当别论。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内战中，当权政府的垮台意味着，这些国家丢失了基本的国民信息和经济信息。在某些国家，甚至数十年来都没有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乍得的第一次正式国内人口普查是在 1993 年进行的，这已是该国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 30 多年后。自独立以来，该国从未进行过人口普查，考虑到国内战乱不断和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没有什么能被用做未来发展的参照物。自 1974 年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以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安哥拉在 2000 年以前从未进行过人口普查（随着安哥拉在 2002 年实现国内和平，以后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观）。由于苏丹南方发生战争，苏丹计划于 1993 年举行的国内人口普查也被迫取消。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对于这些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我们掌握的情况远比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少得多。

没有人员伤亡统计数据，我们就无法衡量冲突的规模，因此，无论我们的数据显示是否正在发生冲突，我们只能寻找战争的发端。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某些气象学家帮忙提供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得到的信息。

贫困是冲突的根源？

富裕国家发生战争的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国内战争。这是第一个暗示我们有关经济因素确实起作用的地方。如果我们观察一下 1979 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1 万美元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德国）以及收入低于 1 万美元的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和亚洲许多国家），一个极为明显的模式便浮现在眼前：在任一年，世界上贫困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的概率比富裕国家发生类似冲突的概率高出 6 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富裕国家的政治俱乐部）内部，各个国家的国内冲突基本不存在。世界上各个贫困国家的情况则大为不同：自 1980 年以来，2/3 的非洲国家和几乎相同比例的亚洲国家都曾爆发过武装冲突。

战争并不会从天而降，战争是人制造的，也许是由他们所处的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所导致的；贫困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暴乱的环境造成的，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没有人想去投资或生产任何产品。显然战争和贫困是相伴而生的。但为了弄明白经济剥削是否确实是非洲战乱的根源，我们从理论上假设某些国家变得更富有只因为它们拥有自由选择权，而另一些国家变得越来越贫困则仅仅因为它们运气太差。这样我们就能清楚是不是这些经济状况中“从天而降”的不可预知因素造成了贫困国家的暴乱和富裕国家的和平。

因为国家毕竟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且我们也无法用办公室电



况下，事实证明，我们“从天而降”的比喻根本算不上比喻。有时贫困确实“从天而降”，从表面上看，就是以雨水的形式降落人间。如今大多数非洲人民仍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灌溉系统和水资源储备系统匮乏，因此当旱季来临时，庄稼就因干旱而枯萎死亡，农民收获不到粮食也就没有办法购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然而，有时你也会遭遇“幸福的烦恼”——如果雨水过于充沛，洪灾也会将农民的生计冲毁。

当天公不作美时，非洲农民的玉米、高粱和棉花产量就会大跌，这使他们陷入绝望或者极端贫困的悲惨处境中。牧民遭受的打击与农民差不多。在2005年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大旱期间，64岁的马里牧民胡塔法·穆萨因干旱而损失了大部分牧群。而他对处境的描述更为凄凉：“雨停了，牧草不再生长……如果没有降雨，我那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牲口也将死掉……而我们自己也难逃一死。”很多与胡塔法一家遭遇类似的家庭都面临一些令人忧虑的选择：是原地不动，还是移居他乡寻找食物？是为孩子交学费，还是让学校将他们拒之门外？将所剩的唯一一杯燕麦片粥给大人还是给孩子？人们将为生存下来而不择手段。对于那些走投无路不得不加入匪帮从而在这个食物匮乏的国家抢到些粮食的饥民而言，这种做法肯定不能被视为非理性，特别当具有“超凡魅力”的经济黑帮以财富、地位和权力（更不要说食物了）诸如此类的承诺引诱他们相互争斗时，更是如此。

如果我们相信在贫困和暴力间存在某种直接联系，那么因缺少降水而导致经济衰退时，战争就会尾随而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单独考虑降雨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就能够弄清楚贫困是否会引发暴力冲突，

降雨是否与地面上人类发动的战争以及当地经济中出现的丰裕或饥馑没有任何关系。

非洲的暴力传统

我们与在纽约大学任教的同事尚卡尔·萨蒂亚纳斯（Shanker Satyanath）及埃内斯特·塞尔真蒂（Ernest Sergenti）合作，着手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干旱（从一年到下一年间降雨量的急剧下降）是否会引发国内暴力冲突？不幸的是，有关降雨的信息并不多。许多非洲国家并没有保留足够的地面降雨测量装置以精确计量降雨量，而没有降雨量数据，我们甚至无法辨别何时何地出现了旱情，更不用说弄清楚它是否引发了当地战乱。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借助气象卫星我们也能衡量当地降雨量。卫星数据依赖于地面气象站收集到的信息与有关“冷云量”（cold cloud cover）密度的卫星信息二者的结合，而后者与实际降雨量密切相关。这些估算出的降雨量数据仅仅显示了：对于我们的非洲农民朋友而言，降雨情况是多么令人绝望。在非洲各国，每10年中平均2~3年的干旱年，而且在乍得、肯尼亚和苏丹等非洲国家的整体降雨量变率比美国的降雨量变率高出数倍。

姓名有何含义？

在肯尼亚，这个特德曾经进行实地调查的国家，许多人依据他们的孩子出生时当地发生的各种事件给孩子取名。有时这意味着某个时间发生了某一重大国际或国内事件，如1964年（肯尼亚独立之年）出生的孩子通常被叫做“Uhuru”，在斯瓦西里语中是“自由”的意思。在姓名中地方性事件更为常见。普通事件产生普通姓名。这是能说明许多肯尼亚人悲惨生活的可悲的姓名符号——肯尼亚西部通用的卢西亚语中最具典型性的男孩名字是“Wanjala”，意指“出生于饥饿之时”，这个名字源于“饥饿”一词（在卢西亚语中对应词为“njaa”）。

当雨量减少时，农作物产量也会相应下降，而且在农业社会，随着收成的减少，经济也会出现衰退。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还发现在非洲干旱与内战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与正常年景相比，降雨量剧减的一年后，国内爆发武装冲突的概率更高。由于干旱不可能引发内战，我们完全可以说内战更有可能在严重经济动荡，如干旱后，引发内战，而不是内战引发干旱。

结果证明，干旱及随之出现的经济衰退对于理解非洲国内冲突至关重要。国内生产总值1%的降幅就会使国内爆发冲突的概率提高两个百分点。因此，收入下降5%——这一幅度较大，但总体来看仍属常见的经济状况恶化（特别是在降雨减少时）——将使随后一年中爆发

国内冲突的概率增加至 30% 左右，在降雨量较为正常的年份，冲突爆发的平均概率已经相对较高，约为 20%。只需设想下，你有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下一年你处在战乱区的概率为 $1/3$ ，你就不会介意自己的庄稼已经完蛋，因为你已经因找到自己的下一顿午饭而感觉收获满满了。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另一个惊人的结论：政治和社会因素似乎并没有抑制经济动荡在引发暴力冲突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独裁专政，种族单一还是部落和宗教分离，经济政策中奉行社会主义政策还是资本主义政策，非洲国家都遭遇了相同的暴力冲突风险。贫困增加了所有非洲国家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

尽管经济绝望并不是非洲大陆爆发武装冲突的唯一原因，但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据我们估算，与其他年份相比，在经济衰退的年景里，非洲国家爆发战争的风险（上文中提到的冲突概率从约 20% 上升至 30%）增加了 50%。其他因素肯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某些地区的种族隔离及另一些地区的政治压迫。而且，我们无法使降雨量增加，但是遏制非洲国家收入的大幅波动将是我们在消除非洲大陆发生战争的努力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理论上讲，农民自身便可以采取措施消除年均产量的高低起落。毕竟，这是投保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播种季节开始时，你可以额外支付一笔钱给保险公司，以确保即便出现全年干旱的情况你也能得到最低水平的收益。或者说如果庄稼减产歉收，你就能从银行贷款出来，到收成较好的年景再偿还贷款。但在非洲村落里，正规的保险政策和

银行机构几乎没有。在非洲，乡村银行非常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拿不出可供担保的财产以获得银行信贷。

在年景不好时，邻里间的互相帮助也可作为一种保险。如果你在我需要帮助时拉我一把，我也会在你落难时有所回报。尽管在非洲同住一个村落的乡亲们确实互相帮助（就像世界各地的邻里关系一样），但当大旱袭击整个地区时，当地居民间的这种互助只是杯水车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家庭都困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没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帮助。

许多非洲家庭确实先前的收获季节储存了一些粮食，其中一部分用来作为下一季庄稼的种子。他们也可以通过购买家畜或其他能够出售的财产进行“储蓄”，或者至少在困难时期仍有食物可以饱腹，就像我们会开设一个储蓄账户或廉价出售存单来以防万一一样。但类似这样的“小办法”并不足以在颗粒无收时养活全家。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克里斯·尤迪（Chris Udry）发现，20世纪80年代西非布基纳法索严重干旱时期，家庭储蓄金只够弥补在此期间所遭受的收入损失的1/4。剩余3/4的收入损失直接转化为在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药品）方面削减的开支。

对于贫困的非洲农民而言，尤其是保险的缺少更具有灾难性，因为相对其他地方的农民而言，这些缺衣少食的农民更需要帮助。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所在大陆的地形地势、山脉走向以及其他各种地理因素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遭遇干旱袭击的次数比其他热带地区多很多。对于现代的金融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因为能

够最大限度地给贫困人口提供帮助的金融工具却是最不容易得到的。

“干旱成为灾难触发因素”的最显著事例来自尼日尔这个位于极端干旱的萨赫勒地区西部的国家发生的战争。尼日尔是游牧民族图瓦雷族（Tuareg）的故乡。德国著名汽车公司大众汽车公司曾推出一款以图瓦雷命名的多功能运动型汽车，这款车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个部族却没有如此幸运。他们的牧群在20世纪70~80年代一连串越来越严重的干旱中遭遇毁灭性的损失。最初，在灾难面前，图瓦雷族选择了向北大规模迁徙，到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定居，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减轻迫在眉睫的冲突威胁。

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并未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万名图瓦雷人被遣返尼日尔，其时正赶上1989~1990年的又一轮严重干旱。图瓦雷人，饱受饥饿之苦，对政府提供的在他们看来显然不够的安置救济耿耿于怀，随后便开始与政府对抗。随着降雨的持续减少，这场冲突也只能是愈演愈烈：1990年后的7年中有5年大旱，图瓦雷人与政府间的冲突也随之加剧和扩大。1998年，冲突暂告一段落，这个深陷战争泥潭的国家也享受到了短暂的和平，这一状况持续到了2001年。也许确实要感谢降雨，正是它缓和了冲突：在1998~2001年这4年中的3年里，不断增加的降雨量足以使农民能够获得丰收。

不幸的是，后来降雨又开始变得稀少，和平仍显得遥遥无期。2004年，该国遭受大规模干旱的袭击，接下来的2005年蝗灾和饥荒接踵而至。粮价猛涨，无数人因饥饿而死。在这一点上，接下来出现

的情况你就能准确地猜出来了：尼日尔政府再次与图瓦雷族武装派别——尼日尔正义运动组织（Niger Movement for Justice）交火，该组织成功地组织了数次重大军事袭击行动，包括俘获并杀害政府军士兵以及 2007 年摧毁一个地区机场。不幸的尼日尔人民，仍然要饱受战乱之苦，只能祈求雨水快快降临。

在气候变暖之后

138

与尼日尔不同，中国经济正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1978 年以前，中国人口中的 70% 是农民，他们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合作社是中国政府“大跃进”时期的产物。1978 年以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内地逐渐展开，并引发了一场令人深感震惊的工业化变革。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追逐淘金梦，中国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规模迁徙。与 25 年前这场改革刚刚起步时相比，如今居住在中国人口足足增加了两倍。这一经济奇迹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提高了数百万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革开始前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非洲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但如今中国的工人阶层的工资收入水平已经是其非洲同行们的数倍。

但实际上，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以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作为发展动力的。中国制造业迅猛的发展速度得益于不断增长的化石燃料的消耗。2002~2004 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长幅度达到惊人的

33%，而且到 2007 年化石燃料消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污染源——而这一年份比专家预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年份提前了。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例超过了 40%。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正是全球变暖的幕后“真凶”。

每过几年，上海新建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数量就会翻番，北京的空气污染状况也不容忽视。中国还有一些仍然冒着浓烟的工厂，满足着全球市场对钢铁、水泥、鞋和玩具的需求。美国人对多功能运动型汽车和装有空调的大房子同样情有独钟。因此，短期内，世界二氧化碳污染指数不太可能下降了。

中国和美国与乍得、尼日尔分属地球的东西两个半球，相距甚远，中国制造业的繁荣与美国郊区的“门禁社区”却像在另一个星球上，但它们之间也有相同之处：非洲农民、美国白领和中国工人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所有人的生活都因我们对地球气候的共同影响而密不可分。随着我们继续大量消耗能源，地球温度将不断升高。

气候变化的赢家与输家

尽管反对声不绝于耳，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大体上都认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产生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份评估报告中，气候问题已成为共识，该评估报告的作者们被授予 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前副总统阿

尔·戈尔也获这一奖项)。执笔该报告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认为,在将来的数十年里,如我们所知,不断升高的全球气温和海平面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改变地球面貌和人类的居住环境。

许多专家普遍认同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处于不断升温中,但在它究竟将如何变化及变化程度方面仍存在分歧。联合国报告预测,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平均气温将从1.1摄氏度上升到6.4摄氏度。气温的变化会给农业生产带来重要影响,这就造成了丰产和歉收的区别。某些地方将变得更加温暖,而其他地方的气温实际上会有所下降,尽管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

那么,哪些国家将从这个更为炎热的星球上获益呢?答案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份名单包括当前需忍受长期、寒冷及令人感到压抑的严冬的国家。西伯利亚、加拿大及美国北部的温度升高也许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这也为小麦种植和人类定居新开辟了大片平原。加拿大人(像雷)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室外曲棍球场,更加不幸的是,还要承受冰雪早日融化的后果以及更长时间的海滩日光浴。

但是也存在全球变暖的“输家”。对于太平洋小岛国以及居住在地势较低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或者像新奥尔良这种城市的海边居民而言,温度升高也许就意味着灾难。但每个受灾国家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气候变化将给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美国或加拿大这样的富裕国家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以应对重大的环境变化。如果加利福尼亚(美国最大的农业州)气温升高,农业专家团队(如我们在加州大学的同事)将帮农民指出何种庄稼最适宜变化了

的气候条件。也许他们甚至会培育出特别能够适应全球气候变暖的新作物品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将帮助那些农田已不适于耕作的农户，并向那些改种新品种却未如期收获的农户提供保险。加州的气温上升几度并不会使加利福尼亚人挨饿。

对于生活在现代化、“后工业”且早已“空调化”的社会（像美国）中的我们而言，更高的气温究竟又有何影响呢？夏天每月月底稍高一些的电费（冬季稍低一些的采暖费便可填平差额）？美国个别地区也许会受到来势更为凶猛的飓风和龙卷风的袭击，但对大多数富裕国家而言，可靠的气候预测模式能预测出天气变化趋势，这对人们来说并非灾难性的。如果室外温度只是升高几度，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和伦敦、纽约及日本的投资银行仍然会保持一片熙来攘往的繁荣景象。

气候变化下的矛盾冲突

但乍得及其邻国的境况并没有那么好。以农业为主的这些国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政府无力为那些庄稼歉收的农民提供安全保障。没有农业专家指导他们进行作物改良，而且考虑到农民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培训农民掌握新的耕作技术也成为一大难题。如果全球变暖使乍得或其邻国的干旱程度加重，农民将无可适从，该地区已经相当严峻的经济形势只会变得更加糟糕。影响地区发展的贫困和暴力之间的恶性循环也将日趋严重。

尽管这种情形远非世界性的，但该领域数位顶尖的全球气候问题

方面的科学家预言，非洲中西部萨赫勒地区的情况将不断恶化。该地区覆盖了包括乍得和尼日尔在内的炎热带，以及苏丹、马里、塞内加尔及周边国家的部分区域。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一个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气候预测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得出萨赫勒地区的气候预测结果极不乐观：预测显示，未来 80 年里萨赫勒地区的平均气温将升高 3.5 摄氏度，而降雨量将锐减 24%。降到地面的少量雨水也会因气温升高而更为迅速地蒸发掉。本来就是地球上最干旱的一片土地，有可能变得更加干旱。

萨赫勒地区生活着超过 1 亿的赤贫人口。萨赫勒地区 15 国的人均年收入仅为 346 美元。如今整个地区更是深陷政治动荡和战火之中，如果其本就非常贫瘠的土地尽数演变为沙漠，情况只能变得越来越差。最为重要的是，其恶化程度将会如何。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居住在对极端天气最无能为力的地区，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输家。

没有先见之明的后果就是，这一恶化进程已经启动，而且变化一直在加速，现在这一切似乎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 100 年里，与马里的延巴克图类似的城市已经从繁荣的贸易枢纽衰落为荒漠中的破败村落。这块大陆另一端——索马里的绿洲也已经干涸，这就导致各部族间为争夺稀缺的水资源而日益频繁地发生武装冲突。如我们所知，曾经给当地人带来生机和富足的乍得湖也几乎消失了，如果当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不出 10 年，乍得湖就只能是人们记忆中的相片了。

气象专家提出的气候预测模型预测到平均降雨量将减少，而比平

均降雨量低的年份以及降雨量集中的年份都将变得更为常见。正如有办法应对降雨量的不断减少，我们也可以解决降雨量年度变化反复无常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农民建造规模庞大的灌溉系统以应对干旱年景，新奥尔良市则修筑了防洪堤坝以抵御洪水袭击。但这些造价昂贵的设施远非非洲农民所能承受的，而且某些作物，像木薯在干旱环境中产量很高，雨水充沛时反而产量下降。玉米并不“介意”雨水充足但在大旱时就会枯萎、死亡。非洲农民们到底应该种什么？随着“雨神”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他们自己正陷入在错误的年份种植错误的庄稼这一怪圈。

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又会有多少暴力冲突落在萨赫勒地区人民的头上呢？请记住，在非洲，当一个国家陷入干旱引发的经济困境时，这段时期该地区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从 20% 上升至 30% 左右。如果我们知道由于全球变暖导致萨赫勒地区发生严重旱情的年数，我们就能据此估算出随之而来的冲突风险究竟增加几成。这些估算必然含有猜测成分——我们手中的经济学“水晶球”并不能给出有关非洲冲突爆发情况的精确预测，因为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未来冲突的不确定性。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非洲人民面临的并非全是坏消息。由于对非洲整个大陆而言，各个地区的气候模型并不相同，所以我们对未来冲突风险的预测同样是不精确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存在显著差别的预测值进行平均计算，尽管存在某些引发冲突的风险，全球变暖在引发非洲冲突风险方面的整体效应还是相当平稳的。在某些预测模型中，某

些国家（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冲突风险实际上随着降雨量的改善而有所下降。

对萨赫勒地区的预测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但依据某些模型分析，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令人深感忧虑。而且考虑到气候变化可能给萨赫勒地区的 1 亿贫困人口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做好最坏的打算还是有必要的。基于普林斯顿大学气候模型的预测，即干旱年份将有所上升，尽管萨赫勒地区（当今世界最易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各国的国内冲突等级已经非常高，2080 年的冲突程度增幅还是超过了 15%。

如果中国的工厂和美国的汽车继续向空气中大肆排放二氧化碳，对于萨赫勒地区各国而言，如今的残酷内战甚至可能会变成人们记忆中的“旧日好时光”：如果碳排放量增幅更大且这种经济模式仍得到普遍认可，那么普林斯顿大学气候模型预测到的降雨量将逐渐减少，而到 21 世纪末冲突风险会直线攀升。越来越严重的污染趋势导致的天气变化将使萨赫勒草原的许多地区不再适于人居住，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将涌入邻国寻找食物和水，这也使得贫困和暴力的恶性循环加剧。

当然，这些令人窒息的预测只是假设世界仍像过去 30 年那样向前发展：中国、美国及工业世界的其他国家继续源源不断地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各非洲贫困国家仍无法实现向工业经济的成功转型；萨赫勒地区的灌溉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考虑到过去数十年里都无法改变非洲经济面貌，这一令人沮丧的情景假设就像对未来可能出现情况的严厉警告，希望它能够激励人们作出某些有益的改变。

拯救达尔富尔？

对乍得人民而言，乍得湖的消失不啻一场大灾难，它将乍得人民推向了饥饿的边缘。但会不会出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情况呢？如果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消失很久的湖，而它足以取代乍得湖呢？

也许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正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与乍得国内态势离奇相似但更为糟糕的国家，达尔富尔冲突中大概 20 万人死于非命，数百万人沦落为难民。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无辜平民，他们在苏丹政府支持的金戈威德军事组织及各色达尔富尔分裂分子的恐吓下求生存。反复出现的干旱再次成为冲突和屠杀事件的导火索，由于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张至达尔富尔加剧了当地人对土地和水资源的争夺，且迫使各族群为了生存而不断迁徙。

但如果波士顿大学地质学家法罗克·埃尔巴兹 (Farouk El-Baz) 的理论站得住脚，那么水资源缺乏问题也许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运用雷达绘图技术，埃尔巴兹及其同事声称，已经找到了一处含水量丰富的地下蓄水层——一个远古湖泊的历史遗存。该地下湖的面积是伊利湖的两倍。他们的计划是凿一孔 1 000 米深的自流井，将水抽到地面上以灌溉庄稼、哺育牲畜，当然也为达尔富尔人提供饮用水。

有关新湖的存在仍充满猜测，而且有许多专家对支撑埃尔巴

兹观点的地质学理论持怀疑态度。对于绝望的达尔富尔百万民众而言，尽管时间最终将证明水是否能够终结那里的冲突，我们还是不应低估水在扑灭非洲暴力“烈焰”方面所具备的力量。

第六章 谁断了他们的活路？

可怕的法则

谋杀、拐骗和汽车盗窃案，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张的大城市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使得富人和手握特权之人不得不躲在拥有层层保护的私家别墅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戏称为“盗窃之都”（Nairobi）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这些国家内战的规模和残酷程度令人震惊，免遭大规模冲突的国家仍要承受被暴力犯罪千刀万剐后留下的伤痕。

在这些个人悲剧中，难免会显露出明显的经济因素——饥饿和穷困自然会逼迫他们抢夺邻居的财产。贫民窟里为生存而进行的争斗催生了城市犯罪。但我们对很多犯罪案件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谋杀或强奸以及虐待儿童或者宗教恐怖主义的经济原因是什么？以老年女性为目标的置人于死地的“猎巫运动”，如我们所见，在著名的“塞勒姆巫师审判”后的几个世纪里，仍然在很多国家上演着这悲惨的一幕。

在第四章中，我们认识到，并非每一件事都能以合理的经济动因来解释，而且某些决定确实关乎文化。“暴力文化”肯定有其出现的原因，而且在“猎巫者”和“宗教卫道士”看来，它似乎是一种恰当的描述。但在本章中，我们会发现某些看似根植于文化和传统中的事物实际上可追根溯源至生存的经济法则。一旦我们认识到看似随意的暴力行为背后隐藏着经济动因，我们就能够运用我们掌握的经济方法来解决相关问题。

回顾一下具有典型意义的庄稼歉收的非洲农户：粮食匮乏，一家人的选择范围同样极其有限。在前一年收获的粮食已经全部吃光后，家畜也被卖掉，且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已借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都面临着非常痛苦的选择。仍有数月的生计要维持，而粮食已经少得可怜了，怎么办？

每位家庭成员都会自寻生路，移居是人们应对饥荒的通常做法。70年前，美国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其时美国境内著名的“大平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尘暴干旱区，迫使大批移民在大萧条时期迁移到加利福尼亚。但像肯尼亚和乍得等国家并没有“遍地是金”的地方可供饥民寻找财富和活路——还记得第五章中提到的尼日尔的图瓦雷族移民的事例吧？

无法逃到水草丰美的“大平原”，家庭中的每个人就会被要求首先削减自己的开支和消费品。尽管这一做法听起来还算公平，但它实际上使家庭处境更为艰难。人总需要最低限度的能量和营养以维持心脏跳动和大脑运转，即医生们所说的“基础代谢”。营养供给低于这一水

平，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平均分配食物使每个人获得能量补给都处于“生死线”之下，那么平均分配法则也就意味着向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宣判了死刑。

如此取舍令人倍感不安，但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将有限资源集中供给少数挑选出的个体以确保至少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尽管以危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为代价），这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有悖常理的感觉。但在饥肠辘辘的一家人中，你又如何作出谁生谁死这一无法选择的选择呢？

这一令人肝肠寸断的抉择是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可以幸免的，但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一现象却一直存在着。研究“前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家已经发现，在许多文化共同体内部，在饥荒中进行粮食分配时，的确有一个法则在起作用，这些法则通常会以牺牲年老者为代价来保护年幼者。针对老年人的“加速死亡”活动在很多国家中开展，包括不提供食物、遗弃，甚至谋杀，特别是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满足人们的需求时，这些活动会更多。

在北极圈生活的因纽特人（Amassalik Inuit）中，在食物匮乏季节，部落会为年长者举行盛大的送别仪式，年老体弱者随后被抛弃在浮冰上，而部落里的其他人则外出捕鱼。因纽特人并非个案，采取这种做法的还有冰岛人、亚马孙的布罗罗人、西伯利亚的楚克其族人、斐济人、北美霍皮人、加蓬芳族人、非洲桑部落的人以及澳大利亚提维人。所有这些部族都会在饥荒时期开展加速老年人死亡的活动。当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养老人时，古代的日本人就將年长者送到深山里，使他们

死于严寒或者成为野兽的猎物。这种做法让我们现代人觉得很野蛮，因为我们中很少有人曾经挣扎在死亡线上，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严酷的风俗习惯却几乎成为人类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

为何选择年长者？他们通常身体虚弱且无力保护自己，此外，无论耕作还是从事其他劳动，他们的创收能力比年轻人差很多。他们生产的粮食（或创造的收入）低于消耗掉的产品，这使他们成为整个家庭纯粹的经济负担。他们不但对一家人的生存作出的贡献最少，而且在自卫方面的能力也最差。

年长的妇女更容易遭遇危险，特别是当她们失去男性的庇护时，而这一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中都存在。在非洲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男性长者把持着权力组织或当地议事机构，公共生活中很少能听到女性的声音。许多女性也从家乡迁移出来，结婚时便嫁入夫家，远离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这使她们年老时显得更为孤单。在回答谁生谁死这个令人肝肠寸断的问题时，年老女性抽中了下下签。

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

密图（Meatu）地区是坦桑尼亚疯狂的“猎巫行动”的中心。是的，以巫术为名对女性进行攻击，在整个坦桑尼亚西部地区颇为常见。在密图，在所有已报告的谋杀案中有半数都是“杀害女巫案”，在坦桑尼亚全境，此类谋杀案每年都会发生上百起。

在非洲的许多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包括 17 世纪的欧洲和北

美)，女巫成为他人遭遇不幸的替罪羊。健康状况恶化——怪罪女巫；庄稼歉收——怪罪女巫；生意场上碰壁，积蓄损失殆尽——心里已经想好找谁算账了。如果某些灾难确实是由女巫引发的，那么消灭女巫似乎是终结那些隐藏在不幸背后的咒语的合理方式。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倒霉的人们疯狂地寻找各种蛛丝马迹，以判明他们中间有谁一直在散布咒语诅咒他们，即便遇到像找工作不顺、自己支持的运动队在重大比赛中失利或者在学校考试中表现不佳这样再平常不过的问题时，他们也会这么做。

非洲的“猎巫行动”是一种在亲友间发生的犯罪行为——大部分指控出现在家庭和朋友中这样值得信任的圈子里。荷兰人类学家彼得·盖斯谢（Peter Geschiere）将非洲巫术称为“血缘关系的阴暗面”，因为如此多的指控和攻击发生在家族内部。对可疑女巫的残忍攻击多以祖母和年老的姑母为目标。受害者被弯刀砍伤头部、颈部和肩部而死。那些能够侥幸逃离的女性通常会躲进灌木丛，在那儿因暴晒而亡。幸运者逃到邻近的城市，沦落为无家可归、靠路人施舍而活命的乞丐。一旦背上“女巫”的恶名，村子里就没有人能帮得了她们。通常情况下移居到别处也不是办法，因为老年妇女独自一人流落到坦桑尼亚的其他地方立刻会引起当地人的怀疑，认为她们因身为女巫而遭驱逐。在传统宗教体系中，女巫是头号公敌，具有危害或置他人于死地的魔法，因此必须要消灭她们。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中的受害者遭到攻击前在其部族中并没有被普遍认为是女巫，仅是某些家庭成员对

她们心生怀疑而已。家族内部“猎巫行动”具有的阴谋性质，意味着当地权威机构的犯罪调查得不到任何进展。坦桑尼亚前总统姆维尼（Mwinyi）1987年赴密图地区视察时，敦促当地人结束这种残忍的猎杀行动，他说：“你们正在杀害无辜的女性，她们中有些人是你们的母亲、祖母或者其他一直照顾你们的老人，她们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女巫？”但总统先生这些肺腑之言并未得到当地人的响应，“杀害女巫事件”仍不断发生。

为何密图地区有这么多女巫？这些“猎巫行动”归根到底是坦桑尼亚人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的，这种信仰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苏库玛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坦桑尼亚西部非苏库玛族人主导的地区，“猎巫行动”并不常见，这有力地证明了文化信仰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这其中也有经济因素。坦桑尼亚是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密图又是该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它位于半干旱地区且与萨赫勒地区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恶劣自然条件颇为相似。即使在光景好的时节，密图地区的人们生活也很艰难，而到了发生干旱或洪涝灾害的年份（这种令人痛苦的情况经常出现），人们颗粒无收。在1998年和1999年，在特德开始进行实地调查前，一场严重的饥荒袭击了密图，迫使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谋求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经济 and 生存的残忍法则使年老女性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我们在密图地区67个村庄进行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猎巫行动”中的受害者都是年老女性，而且大多数来自生活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这些几乎被贫困逼疯了的家庭，他们的土地、牲畜、收音机

或自行车之类的财产少之又少，只能为一年中余下的数个月的无米之炊犯愁。

这些杀戮并不是随机出现的。“杀害女巫事件”大多集中发生在天气条件较差而使粮食歉收进而导致家庭收入骤减的年份。在正常的雨季，一个村庄里平均每 13 年才会出现一起“杀害女巫事件”。而在遭遇干旱或洪涝灾害的年份，这一比率几乎翻番，上升至每 7 年发生一起“杀害女巫事件”。在遭遇大饥荒的 1998 年，发生的“杀害女巫事件”几乎是之后 2000 年的 3 倍，2000 年降雨量适中，足以给农民的庄稼以滋养。在一个仅有 400 户居民的小村庄每 7 年发生一起“杀害女巫事件”已是非常频繁的了。换句话说，每年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妇女被当做女巫杀害或袭击的概率为 2%——几乎是哥伦比亚 20 世纪 90 年代“毒品战”期间总体谋杀率的 4 倍。“猎巫行动”的此种模式使我们猜测，在世界其他地区看似属于“文化”或“宗教”范畴的社会现象背后，应当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经济因素，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分对此进行讨论。

不仅在坦桑尼亚存在“猎巫行动”。在加纳北部也有类似的袭击事件发生，在过去的 10 年里，由于争夺各种生存资源，数以千计被指控为“女巫”的当地村妇遭到攻击或驱逐。在肯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在印度农村（特别是比哈尔——印度最贫困邦）和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都曾出现过以老年妇女为目标的“猎巫行动”。在南非经济发展落后的北方省份，自 1985 年以来，已经有超过 400 位遭到指控的“女巫”被杀害。

与老年妇女类似，年幼的孩子们也是家庭资源的净消耗者。尽管当他们长达成人后终会为家庭创造收入，短期内维持生计的需要也会对整个家族构成压力，从而会迫使一些家族牺牲最年轻的家族成员。我们根据有关“猎巫行动”的经济模型预测，孩子们可能也会被指控具备某种巫术，如今在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很多孩子确实因族人作出的上述主观臆测而遭毒打或抛弃。这一次，对“猎巫行动”的超自然的信仰似乎又在经济必需品中找到了依据。人们认为这些被巫术附体的孩子掠走了其他人的生命力，这一观点也就成了身处绝境的家庭作出在其他场合下看起来不可思议之举的借口——在经济状况惨淡时抛弃自己的孩子。经济剥削又为塞勒姆地区的“女巫审判”添了油加了醋，而上述审判正发生在17世纪马萨诸塞州移民聚居地最为寒冷、经济刚刚起步的时期。如果塞勒姆年幼的女孩子都能吃饱饭，他们也许就想象不出身边有这么多女巫，而孩子们的父母也许就不会相信别人说自己的孩子是“女巫”的话了。

如果可能，对于攻击“女巫”事件，我们能做点什么呢？追捕并惩罚杀人者似乎不顶用。而且，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与坦桑尼亚各阶层民众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当地居民强烈反对拯救“女巫”的任何尝试。大多数坦桑尼亚人相信女巫的存在，而且无论是否属实，他们坚信杀死她们就能使整个部族免遭不幸。拿出我们绘制的各种图表和幻灯片，解释经济因素在“猎巫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压根儿没用——在坦桑尼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这种信念根深蒂固。

特德在其2001年在密图地区开展的实地调查中首先发现了这一

点。在收集调查数据的过程中，当讨论的话题转向当地女巫人数时，受访者的冷淡令他大感震惊。他们肯定知道特德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而在密图当地的居民看来，如果你想明白他们遇到的问题，你就需要明白他们身边的“女巫”。而且地方政府官员显然并未因杀害“女巫”者一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而感到羞愧。在一次令人心寒的采访中，某村庄的议事委员会带头人向特德指出，一个星期前在沿着公路的一座房子里，一位“女巫”被当地人砍死了。

如果地方政府官员都对“猎巫行动”熟视无睹，其他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对年老女性发动的袭击主要出于对合理的成本收益的考虑，那么就需要对杀害“女巫”者面临的需要权衡的问题改变一下。一种最具可行性的方法就是为年老女性提供定期补助金，如社会保险。如此一来，祖母和姑母们就将从家庭经济负担转变为家庭净资产，她们的远近亲戚无不渴望她们健康长寿，从而一直能从政府手中拿到钱。

这正是南非北方各省采取的政策，在这些地方，年老女性肯定感激政府按月为她们发放补助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们免遭当地猎巫者的伤害。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该国设立巨额补助金项目按月为老年人提供收入时，“猎巫行动”几乎消失了。在坦桑尼亚以及其他国家设立此类老年补助金项目能够起到保护贫困的和年老的女性的作用。这将是一种高效但代价高昂的消除坦桑尼亚“猎巫行动”这种现象的做法，而且对于比南非更为贫困落后的坦桑尼亚而言，该国未必能承受得起如此巨大的财政负担。每年坦桑尼亚的人均健康支出不

足 10 美元，因此，坦桑尼亚政府的任何老年补助金数额可能都非常小，以至于无法在解决问题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然而，即便没有补助金或政府（援助者）其他的支持，坦桑尼亚南部的乌兰咖（Ulanga）地区似乎已经解决了猎杀“女巫”的问题。在乌兰咖地区，人们对“女巫”的指控及对巫术的迷信现象与密图地区一样普遍，然而，不知何故，当地人却几乎从未听说过“猎巫行动”。乌兰咖地区人们的生活与密图地区人们的生活一样艰辛，按理说，同样的经济因素应当驱使各个家庭作出同样绝望的选择。为何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呢？

在赤脚医生的协助下，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有一种地方习俗并没有按照常规的与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行事，那就是这些赤脚医生们为遇到威胁的年长女性提供了初级安全网。在乌兰咖地区，一些懂得传统医术的著名的赤脚医生（通常她们自己就身为女性）收治被指控为“女巫”的当地人，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在 1990 年的大饥荒期间，创建庇护所规模最大的赤脚医生每天要收治多达 40 位前来就医的“病人”。作为交换，在一个仪式中，医师当众为被各种巫术“罪孽”缠身的女性“净身”，将这些“女巫”的体毛全部剃干净，并在她们的光头上涂抹“反巫术”药粉。

当对“女巫”的救赎程序全部完成后（此时也许困难的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好转），她们得到允许可以安全返回家中，以告诉公众她们身上的“巫术”已经被“根除”。当他们能负担得起时，这些“女巫”及其家人会回报这些医生当初为她们提供的服务，而医生们大抵会用这

些钱支付下一批被诬蔑为“女巫”的难民的食宿费用。一旦我们揭开上述仪式和习俗的面纱，这一安排就像某种形式的保险，或者说是一种简单的借贷契约：富裕的医师（坦桑尼亚传统医药的利润很高）在贫穷的人和年老者的困难时期给予其支持，当这些人的光景好转时再回报医师。

南非和坦桑尼亚南部地区采取的措施虽然为年老体弱者提供了安全网，却无法解决干旱、洪涝和饥荒这些将贫困家庭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要真正一劳永逸地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帮助整个家庭渡过难关，所采取的措施便是：改善可以协助贫困农业族群抵御极端天气状况的社会保险机制。如此一来，整个家族就可以获得在年景欠佳时保全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更好方法，因此也就不必再牺牲祖母、姑母或任何家庭成员了。

宗教狂热分子就是经济黑帮？

在世界上大多数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中，宗教狂热常常遭人诟病。几乎每天我们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对中东地区的汽车爆炸案和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很多不太为人熟知的暴力犯罪策划者却声称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尽管世界各国的法典都记载着对大规模暴力犯罪的禁令，但各种主要宗教都有其自称的“神圣卫道士”。在听取坦桑尼亚猎巫者经历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会问，某些情况下他们从事犯罪活动是否受到随身携带的“圣经”而非祈祷书的启发，

也就是说，某些宗教狂热分子其实就是假扮信徒的经济黑帮？

“群众帮”（Mungiki）就是这么一个由暴力狂热分子组成的团体，他们宣扬的目标是，使肯尼亚回归祖先倡导的“前殖民时期”的宗教和传统。对于“群众帮”而言，基督教是一大禁忌，就像如今在内罗毕颇为流行的啤酒和紧身牛仔裤一样。他们信奉吉库尤族的上帝恩盖（Ngai）而非耶稣或穆罕默德，并崇尚古代衣着和发型，如 20 世纪 50 年代肯尼亚的茅茅党人留的骇人的长发。“群众帮”领导人公开攻击腐败的“后殖民时期”的政府领导人是西方文化对肯尼亚本土价值进行毒害的另一帮凶。

更为不祥的是，“群众帮”推崇对未成年女孩进行“割礼”，也就是所谓的女性生殖器切除术，以控制女性的性“冲动”。而且，据说他们在必要时会动用武力实施这一“传统仪式”。“群众帮”也被认为应当对近些年在内罗毕杂乱的贫民窟中出现的恐怖斩首风潮负责。在 2007 年，内罗毕很多人被残害致死，他们中某些人的头颅、生殖器以及身体的其他器官被砍下来用在“群众帮”秘密组织的宗教仪式中。这些骇人听闻且神秘莫测的致残行为，难道就能迫使内罗毕大批基督教徒和西化了的民众重循旧俗？或者说，这就是安抚“群众帮”所信仰众神或继承其他所有传统文化的方法？

当肯尼亚调查记者探索“群众帮”的“黑箱”时（他们尽量与暴力倾向如此严重且隐蔽程度如此高的组织近距离接触），他们发现该组织的动机受精神因素的左右程度并不是很强烈。除宗教和文

化议程外，“群众帮”较少公开的活动有胁迫贫民窟小商店店主缴纳保护费和其他各种能赚到钱的犯罪活动。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是通过敲诈内罗毕当地出租面包车的司机而获得的。因此，媒体和警察指出“群众帮”看似无意义的暴力活动根本不是盲目进行的——许多受害者显然是拒绝支付保护费的面包车车主或司机。

“群众帮”的斩首仪式看起来与基地组织宗教狂热分子的所为有几分相似，但他们更多地与电影《教父》中描述的黑手党一样干着罪恶勾当，而非奉上帝旨意行事。无论肯尼亚像黑手党一样的“群众帮”、阿富汗种植鸦片的塔利班武装力量、哥伦比亚从事可卡因走私活动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还是塞拉利昂走私宝石的革命联合阵线，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和政治革命组织都从事着经济黑帮们干的营生。

行动起来

雨水减少导致了非洲大陆衍生的无数悲剧，如持续内战和“猎巫行动”。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天气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如何最有效地减轻贫困对非洲的打击。由于非洲大陆遭遇恶劣天气影响的脆弱性源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使非洲摆脱天气因素困扰的大规模工业化发展将是最佳解决方案。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如今来自国外的大部分援助资金已经转化为基础设施项目或教育等可以帮助推进

这一进程的长期投资。

尽管这种长期援助很受欢迎，但它在短期内对应对非洲内战和“猎巫行动”方面还是起不到太大作用，并且要受天气因素的影响。这是靠雨水滋润的非洲农业由雨水引发暴力冲突的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反映了农作物是丰收还是歉收。因此除了要专注于提高贫困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外，还要在旱季增加援助以及时帮助这块大陆的贫困农民度过歉收季。在今天预防极端贫困，就能在明天避免战争。

为了将这一见解转变为政策行动，我们认为更多来自外部的援助应当明确为贫困国家发挥保障的作用。我们将这一新型援助称为“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RCPS）。对于经历暂时性收入下降的各国，这项援助可以起到“对症下药”的作用，这就像最好在开始生病时去看医生而非等病情加重再处理一样。到病情发展为肺炎时，已经为时晚矣。

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在对非洲干旱和暴力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能够认识到冲突这一国家易得的“传染性疾病”正在蔓延，这无疑是个明确的警告。雨水迟迟不来时，暴力和战争就为期不远了。可将相似的逻辑和观点应用在对非洲收入构成冲击的其他因素上，如商品价格暴跌。卢旺达国民收入主要依赖咖啡出口，因此当世界咖啡价格大幅下跌时，大部分卢旺达人的收入同样大幅缩水。以此种方式，关键商品价格的突然下跌与干旱极为相似，二者都会导致收入出现预料之外的下降，使人们陷入绝望并产生暴力倾向。

由于收入意外大幅下降是冲突易于出现的征兆，捐赠者应当及时

提供外部援助以便在出现上述情况时救援能及时到位。而且这也是“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能发挥作用的时刻。当潜在经济因素回归常态，例如，当第二年雨水增多或者全球咖啡价格反弹时，随着该国国民收入的增加，援助可迅速减少。

我们终于有了数据为证。我们已经掌握了统计数据，明白了如何将“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付诸实施。援助者可通过网站公布的数据追踪降雨量和饥荒发展情况。事实上，与你要做的事密切相关的数据库已经建好了。监测商品价格甚至变得更为轻松，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咖啡价格的变化趋势，我们只需查看一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商品网站的咖啡期货价格。

定期保险项目存在某些内在的问题。例如，汽车保险催生了鲁莽的驾驶员，他们能够将轻微擦撞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保险公司。与之相似，如果援助者因某些国家存在易于爆发冲突的条件而给予其援助，这有可能造成这些国家放弃确保不再出现滋生冲突条件的种种努力。按照此种方式，设计并不完善的“冲突保险”也会催生一批无所顾忌的农民，他们缺少动力照料庄稼，因为他们知道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得到补偿。同样，国家领导人也就不会全力关注冲突对政局稳定构成的威胁，因为他们明白危机期间外国援助自然会增加。如果仅依据受援国经济情况差这一点就进行快速援助，这可能刺激某些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处心积虑地做出投机钻营之举——编造国家财政收支情况、自甘贫困，甚至人为“制造”贫困，从而为自己“榨取”更多的援助资金。尽管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这并不是政客们第一次为满足

个人私欲而“利用”人民疾苦。

与当前饥荒救济项目相比，“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的优点在于农民或政客能够对该体系做手脚之处很少。雨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天而降。甚至对于最具权势的独裁者而言，促成降雨（或未能促成降雨）都不是一项政策选择。全球商品价格可以说与之相同，它是由全球各国的供需决策所决定的，而且基本上不受任何单个国家的决策左右。这一点在最贫困的非洲经济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数额巨大的全球产值中这些经济体的产量只能算得上“沧海一粟”。因此，“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不会扭曲各国政府实施的刺激性措施，政府会通过负责任的公共政策确保经济有序发展。

我们并不认为“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可以或应当完全取代专注于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的传统援助。但考虑到目前诸多援助项目取得的成果已经被武装冲突摧毁，“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可被视为对这些以各种援助为基础所进行投资的自然补充。

一旦我们意识到造成非洲经济混乱状况的核心要素源于武装冲突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活动，我们就应当进一步将“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的目标锁定在那些愿意和有能力参与到武装暴力冲突中去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困境的经济体。一直以来，失业者和贫困的年轻人成了各种犯罪团伙（像肯尼亚的“群众帮”）和武装反抗组织（如尼日尔存在的情况）的骨干。为年轻人和不满者提供的短期公共建设的工作机会，可能使他们对国家面临危机的威胁时自己拿起武器上战场这一行为选择重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一种更加体现雄心和非常适于减轻“猎巫行动”造成的灾祸的方法是：为所有贫困农户提供“降雨保险”，当久旱不雨时提供援助资金以帮助饥民们熬过寒冬进入下一个收获季。如果这种食品援助被指定提供给年长者，这将使他们变成需要保护的珍贵资产而不是会像“女巫”般被抛弃。

援助行动开始吧

如果“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那么肯定可以用某些方法确定是否实施这种援助，以及何时实施这种援助。援助饥饿的农民的钱会不会不知何故就在半路上遭政府窃取？援助应当采取现金或食物援助的方式？进行援助时我们肯定能从中获得某些认识。然而具备“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计划构成要素的某些成功的非洲农村保险项目已经存在，而且它们的有效性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法在解决非洲农村面临的棘手问题时能派上用场。

上述项目中，人们较为熟悉的是为博茨瓦纳提供干旱援助的项目。干旱是博茨瓦纳的“常客”，大多数热带半干旱地区皆是如此。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该国政府实施具有开创性的“干旱救济项目”以帮助本国人民应对旱灾。这些年来，“干旱救济项目”由面向农村居民的直接收入支援构成，包括两种类型的援助：公共建设的工作机会以及面向大多数易受旱情影响的农民的粮食援助。

据估算，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爆发的严重干旱期间，博茨瓦纳

共有 60% 的农民得到了程度不等的“干旱救济项目”的援助。（要正确看待这一现象，例如，美国为贫困家庭提供医疗救助的最大的社会项目——公共医疗补助制度只覆盖了 13% 的人口。）在这些收成欠佳的年份里，“干旱救济项目”通过抑制农村贫困程度和农民收入不均来维持社会稳定。但博茨瓦纳政府认为，投入的这笔钱“物有所值”：自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独立以来，该国尚未发生武装冲突。在过去 40 年里，博茨瓦纳一直是非洲经济的“超级明星”，而且似乎其干旱保险措施在博茨瓦纳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实际上，博茨瓦纳前总统奎特·马西雷告诉特德，他认为“干旱救济项目”完全可以解释博茨瓦纳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取得的骄人成绩。）这些农业保险项目是该国人民与民选政府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民选政府致力于维护这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小国的和平与繁荣。

令人感到棘手之处是具体安排方面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将取决于受援国的特定需求和治理能力。当博茨瓦纳选择实施“干旱救济项目”时，它还很难称得上非洲的典型。该国政府的负责任程度和所作出的回应已经比如今大多数国家政府强多了。在与博茨瓦纳或坦桑尼亚政府类似的政权体系中，领导人基本上都较诚实和正直，通过政府引导和分配“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基金有可能是推动援助实现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收益最大化的方法。但“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能够在安排援助资金发放方式时直接克服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和解决腐败问题。在大多数援助有可能被政府部门当场窃取的情况下，为了保险起见，非政府组织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已经存在的其他类型的国外援助与“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有几分相似，但它们的根本方法不同。最为明显的是，“后冲突国家”确实已经从国际营救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和红十字会等组织处获得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与“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相似，这种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同时也发挥着保险的作用。但是，在冲突爆发后由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大堤”已决，损失已经不可避免。相反“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可以在暴力活动发生前，识别出面临武装冲突风险最大的国家并为其增加相应的援助。如果说人道主义援助属于维持濒死之人的“生命支撑”，那么“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则是“预防性药物”。

某些国际货币基金借贷业务也可作为面向贫困国家的保险项目，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这些借贷援助项目包括“补偿和应急贷款办法”和“外部冲突融资计划”。目前，这两种听起来颇具官僚色彩的援助项目均不与武装冲突风险预防措施直接相关，而且，一直以来，“补偿和应急贷款办法”很少被用到。遗憾的是，该基金严格地制定了约束性条件，规定了何种情况下提供援助资金——该项目试图排除在通货膨胀及预算赤字等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记录较差的国家，也阻止某些最容易爆发冲突的非洲国家获得援助。

援助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受援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它通常也是实现援助者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在我们试图理解实践中援助资金如何被分配时不能忽视这一点。尽管援助含有对受援国的种

种关切，但我们仍然坚持如今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帮助受援国免遭干旱威胁（随之面临武装冲突和其他形式暴力活动的风险）方面的援助少之又少。“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是一种在经济方面可行的方式，它为受援国提供了一种通往更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途径，而且有助于为实现非洲人民“投资”自己国家未来的愿景创造条件。

各种形式的暴力活动，从猎巫到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非洲经济绝望和大幅波动的产物。一旦爆发，国内冲突能够持续数载，甚至几十年。战争和冲突已经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为国际犯罪集团和恐怖分子创造了“失败国家”这一犯罪的天堂。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成为整个地区的“毒瘤”。而且在坦桑尼亚，“猎巫行动”恰恰是对“经济困难滋生暴力犯罪”的一种令人心碎的描述，而且没有消失的迹象。在从另一起人道主义灾难中收集碎片，或掩埋又一具年老“女巫”的尸体前，为何不试着运用某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阻止此类暴力事件的发生呢？

超越暴力

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似乎要浮出水面了——利用某些非洲国家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由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主导的国际财团在乍得发现的石油储藏已经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些丰富的石油储藏很轻松地就可以提供足以“湮没”乍得农民微薄农业收入的财富。如果能有效使用这些资金，该国就能够结束长达数十年的贫困和暴乱，而且为

更加光明、更加稳定的经济发展前景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如果历史可以借鉴，我们就不应当对某一点过于自信，这一点就是资金真的会得到合理运用。

非洲历史从未经历过资源丰富带来的繁荣，因为这些资源从未转变为国家的繁荣。钻石和石油并没有帮助安哥拉人，他们的国家被腐败的统治者统治并因连年内战而四分五裂。而乍得的领导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就乍得而言，在纽约抢占他人停车位的违章行为与挪用政府资金的腐败行为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相关性。该国每位外交官未缴纳违章停车费的数量高居排行榜第三名，而且在国际透明组织提出的腐败认知指数中，乍得与孟加拉国并列为世界最腐败国家。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利用乍得国家石油财富开展大力投资的可能性就变得极小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现石油之后，乍得就需要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开采石油，并将其通过 650 英里长的管道出口到国外，而私营石油公司无法募集到所有必需的资金。这一资金缺口就由国际援助者填补，包括世界银行，后者于 2000 年介入其中，以期这一新发现的财富能帮助乍得人民摆脱贫困。即使不了解乍得外交官的胡乱停车行为，各捐助组织也完全意识到了乍得政府腐败成风，因此他们通常会为援助项目设定严格的条件来加以限制。

是否提供资金援助取决于乍得是否同意将大部分——超过 80%——的最终石油收益用于世界银行提出的“收益管理计划”下的“消除贫困项目”。在与援助者签订新协议后，由伦敦一家银行开设专门账户保管上述石油开发资金，并由一个被称为“国际咨询小组”的

监督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管。国际咨询小组由国内社会组织、地方发展专家及国际发展专家组成，他们都会对资金流向进行追踪。10%的收益将被留做“未来世代基金”，这笔基金同样存放在伦敦的银行账户中，以便在石油储量枯竭时解燃眉之急。援助者明确表示，乍得政府如有违本协议则将受到严惩。至少在理论上讲，乍得政府、援助者和国际咨询小组将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通力合作。

如果存在善意捐助意愿且资源充足，乍得现在应当是我们引述的非洲的成功案例，而非经济失败的典型代表。但显然一切进展得并不顺利。一旦石油开始流动，世界银行就失去了对乍得政府及其因贪污腐败而臭名昭著的领导人伊德里斯·代比的影响，此人之前就是叛军首领。代比于2005年末终止了其与国际咨询小组及世界银行的合作，公开羞辱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并将保罗领导的公众反腐败运动视为儿戏。一旦石油管道修建完毕并投入使用，而且代比之前就已重新修改了《乍得宪法》以确保自己能够无限期地连任总统，他就基本上不再需要援助者进一步提供帮助了，也不再受制于国际组织和援助者提出的苛刻条件了。而随着石油价格超过每桶70美元，他便开始大肆敛财。在我们写作本书时，“收益管理计划”并未终结，然而，随着如今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代比开始强迫援助者接受由他直接控制更大份额的石油收益分成。

估计大部分石油财富已经被偷窃一空，尽管不可能确定被盗财富的数量。代比已经决定，用大部分收益为其麾下正在该国北部和东部与叛军进行战斗的军队提供资金支持，他指挥的军队还要预防在西部

边境与尼日利亚军队有可能爆发的边境冲突。从达尔富尔种族屠杀中逃出的难民，使代比更容易找到借口蔑视先前达成的协议（尽管有几分不情愿，但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考虑到达尔富尔附近长期存在的混乱局面和叛乱分子的威胁，总统批准的某些额外财政开支亦属合理范围之内）。同时，除首都之外，该国仍没有电力资源，且普通百姓的生活依旧异常艰辛。

然而，没有人能指出未来某一天乍得的输油管道是否会有助于减轻这个世界上最为贫困且暴力程度最深的国家的贫困。石油收益将为未来经济繁荣提供基础，且世界银行将一直在实现更为光明未来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从目前看，上述愿景仍有望实现。但自 2003 年乍得的石油最终进入市场以来，腐败和冲突仍然是实现这一进程的“拦路虎”。回到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有关国外援助的争论——仅仅依靠金钱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贫困陷阱。

ECONOMIC GANGSTERS

第七章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

位于越南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通常不会成为您旅行的目的地。那儿没有快餐店，也没有特色纪念品店。相反，在博物馆的众多展厅里陈列着大量越南军队及其在近代战争中遭遇的敌军使用过的枪支、手榴弹、炮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唯一的雕塑是一架被击落的美军战斗机金属支架。这座博物馆记录着越南骄人的军事战争史：世界上某些最为强大的军队，包括美国军队、日本军队及法国军队，都曾于 20 世纪在越南挑起战事并输掉战争，这说明越南人热切希望与外国人分享他们的战争史。

特德在 2005 年参观该博物馆时，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展览是收集起来的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战争（越南人将其称为“美国战争”）中美军曾使用过的一堆炸弹弹壳。参观者可以看到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炸弹，从与小孩玩具有几分相似的表面光滑的红色火箭弹到大块头不规则的黑色碉堡炸弹。博物馆将此处展览布置在一个安静的布满鲜花的院子里，展出环境与展品的骇人外观形成鲜明对比。在年长的越南

参观者的表情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被扭曲的展品，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些战争武器释放出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恐慌。

许多战争年代的越南人没能活到现在，也就无法看到现在河内用当年的炸弹办的现代艺术品展。现在已很难统计到准确的战争伤亡人数——战争引发的混乱使统计精确的伤亡人数变得很不现实，但据越南政府估算，超过 500 万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这一数字恰恰与科罗拉多州的人口总数相仿。大部分死难者为平民。

美国在对越南农村的轰炸中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博物馆才能收集到这么多可供展出的弹壳）。在历史上轰炸最为密集的时期，美国轰炸机对越南人民投下了人均超过 200 磅的烈性炸药，这一重量超过了越南人的平均体重。即便一小撮儿此类弹药也能把你从正坐着阅读本书的椅子上炸飞。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克劳德菲特（Michael Clodfelter）估算，美军在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投下的 760 万吨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投放的爆炸物吨数高出 3 倍，更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投放的炸弹吨数高出 15 倍。据克劳德菲特估算，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美军进行的大规模轰炸摧毁了越南北部 65% 的石油储量、59% 的电力设施以及超过半数的大桥。美国曾对某些桥梁进行了反复轰炸。每次越南人对桥梁进行重建后，美军都会对该地点展开二次轰炸，这使得要将上述地区变成未来商业和投资的“宝地”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轰炸还使数百万平民沦落为难民，如果勤劳的劳动人民不再回到此地，这有可

能造成此类地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还不包括未爆炸的各种武器弹药及遗留下来的地雷，显然，这是一些仍存在着的不受欢迎的“礼物”。

任何现代战争都会在战后留下难以估算的损失，包括有形资产的破坏（像公路和厂房）以及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损失（技术工人的死亡或重伤）。如此一来，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总会受到打击。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其战争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国家就是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越南就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轰炸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肯定有可能迫使越南陷入我们在乍得及非洲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大坑”——贫困陷阱中。然而，越南复苏了。原因何在？

当重建开始时，这些相同的恐怖情况也能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大量机会。从理论上讲，有辨别和投资此类机会的能力，有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做生意这般勇气的企业家，这个国家就有能力走向战后的经济繁荣。投资商自顾赚钱，他们的重建工程促进就业，而且国家也恢复到战前应当达到的水平。例如，重建一条连接富饶农业区和大城市的公路，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并且为城市工人和白领提供廉价食物——其价值不言而喻。在一个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已遭破坏的经济体中，需要的此类高回报投资的项目还很多。

这种快速重建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复兴的模式，美国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于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两颗原子弹的攻击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广岛，大

爆炸将半径 1 英里（1.6 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使柏油路液化，瞬间令 7 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到 1945 年底，10 万人因辐射或受伤而死去。后来，更多的人因暴露在强辐射下而极其痛苦地死去，成千上万名被灼伤和击伤的受害者无家可归。

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唐·戴维斯（Don Davis）和戴维·温斯坦（David Weinstein）研究发现，上述两座城市以及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美军轰炸而遭破坏的日本城市，自战争以来在经济生存能力的最基本维度——人口方面表现异常突出。戴维斯和温斯坦将这些遭炸弹袭击的城市与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城市进行对比，像古都东京（美军战机有意避开这座城市，因为担心首都一旦遭破坏将激起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以及不在美国轰炸机作战半径内的日本北方城市。令人惊讶的是，战后仅经过 25 年的时间，遭轰炸的城市人口就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口水平和增长趋势。

广岛和长崎历经 25 年从战争的废墟中得以重建，而且如今这两座城市均人口众多、欣欣向荣。东京同样如此。尽管火焰燃烧弹将其最富民族风情的东西从地球上永远抹去了，如大多数东京传统木结构建筑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而如今，它们已被林立的现代公寓大厦取代，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地段。

至少在理论上，正如日本的情况，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战后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经济理论遭遇战后社会现实时，情况并不是与我们所预计的情况相符。在这个世界的理想化描述中——只要进行恰当的投资，人力和机器就能合而为一从而使国家恢复往日的

辉煌，我们忽略了在决定国家重建速度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许多经济机制。腐败和经济黑帮制造的持续的政治动荡有可能阻碍战后投资，如许多非洲国家冲突中出现的情况。

政治本身也可能被武装冲突改变。当举国上下一致对敌时，战争往往能够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进步。政治上受压迫者——妇女、少数族裔、无地工人获得解放一直是许多战争的积极“副产品”，美国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获得投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黑人的民权运动，而越南战争年代的混乱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生力量并推动了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这些政治变化能间接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产品”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如之前遭边缘化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而此类投资有益于社会整体。

战争本身也能刺激并推动战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美国和德国争相设计出速度更快的轰炸机、研究出更为精确的投弹方式，双方在战场上的对抗导致了以技术作支撑的军备竞赛。随之出现的技术创新推动了速度更快的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制，并为现代计算机技术奠定了基础，在其刺激下，战后经济增速再创新高，波音公司如今日入亿万美元便是这些早期技术革新引发后期经济效应的一个例证。

投资、政治、技术，战后重建的长期结果是这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为了解释清楚这种因果关系，我们需要数据，而这恰恰是遭战争摧残的经济体通常无法拿出的东西。然而，尽管美军无法彻底消灭越南共产党，他们至少对自己所进行的尝试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录，

这为我们提供了揭开越南从对美战争中迅速恢复之谜所需的信息。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应当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如何帮助其他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暴力结束后迅速恢复生机和活力。

战争之王

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任务日志中记录了每次轰炸任务的细节，这些信息被即刻传达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结果，位于国家档案馆的防务安全协作机构将1965年到1975年由美国及其盟国的飞机和直升机投放的所有爆炸物上的信息收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份有关美军对越南轰炸的完整数据。为何我们有这场战争令人震惊的数据，而其他大部分冲突在数据方面却都是“黑洞”？也许这就是当你安排一位经济学家负责一场战争的整个运转过程时会出现的情况。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和后来的世界银行行长，制定了这一详细的数据系统以便记录下其麾下军队的绩效表现。

战后，美国将相关数据转交给了越南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该国政府清理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美军曾埋设了数百万颗地雷，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数据库标有几乎每颗地雷的具体位置。确实，该名单包括战争中投放的所有爆炸物的位置和类型——普通航空炸弹、集束炸弹、化学武器、火箭弹、导弹、射弹、军火、地雷及照明弹，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藏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军火设备。

在10年战争期间，在越南全国范围内每平方英里投放的炸弹、导弹和火箭弹平均为83.7枚。这相当于炸毁整个曼哈顿岛所需的弹药量——仅22.7平方英里，有近2000枚炸弹，每枚炸弹携带上百磅炸药。设想一下，纽约中央公园被无数20英尺的弹坑“装扮”得像坑洼不平的月球表面，到处都是金属炸弹碎片，你就能想象得到战后越南的大致情形。

但这种大致情况也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某些区域遭受的打击力度强于其他地区。约70%的爆炸物被投放到全国584个政府行政区中10%的区域。最猛烈的轰炸出现在广治省，该省位于北纬17度的国家中部，以北纬17度为界，当时的越南南北分裂。广治省的一些地区遭到了强度超过每平方英里1200枚炸弹的连续打击（相当于在曼哈顿投下了超过27000枚炸弹），数以万吨计的炸药被投放到这些地区。轰炸行动过后，与日本广岛市相比，越南广治省残存的建筑物更少，而到战争快要结束时，3500座村庄中仅有11座未遭高能炸弹袭击。由于分界线附近炮火纷飞，广治省从北到南的广阔区域遭到了严重破坏。

越南北部沿海城市以及河内某些地区也遭遇猛烈空袭，南部西贡市附近与柬埔寨接壤处同样如此。后一区域是越南北部的人和越共游击队员从穿越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重返越南南部发起攻击的路径。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越南北部主要城市人口聚集地免遭轰炸，而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及其将领则将攻击目标进一步扩大，包括越南在1972年“圣诞节轰炸”中遭袭击的平民居住区。

正如所体会到的那般恐惧，找出遭到沉重打击的特定区域，对于

弄清楚不同轰炸强度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将遭密集轰炸地区与遭到相对较轻袭击地区的战后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每个地区都遭遇像广治省那样的破坏就无法进行比较了。

轰炸如何影响了越南经济？1975 年对美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越南政府并未收集任何系统的经济数据，因此很难确切地指出广治省和越南其他地区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但规范的人口普查和家庭数据统计工作（测量家庭收入和支出等指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才开始，因此与同事杰勒德·罗兰（Gerard Roland）一道，我们能够勾画出经历了 20 多年的战后重建，越南取得了何种经济成就。

被炮火夷平的地区得以重建。战争的破坏程度几乎与 1999 年生活在贫困中的越南人毫无干系。因此，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广岛和长崎，在战争中遭轰炸摧毁的越南城市在战后仅用 25 年的时间就赶上了他们的邻居。这一经济赶超现象既是遭猛烈轰炸的地区人口密度恢复的原因，也可视为其影响的结果。重返家园的难民在重建中发挥了作用，而且随着经济复苏，甚至更多的人被当地的经济扩张所吸引而来到这里。然而，除通过个人自愿选择移居外，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后人口流动也是由越南执政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激励机制或其他手段实现的。

总体上，越南实现了战后经济繁荣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状况进展的指标展示了其获得的巨大收益。战前（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越南的学校相对较少，而且除该国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家中有电力供应的家庭也并不多见。但到 1999 年，71% 的家庭已经用上电，88% 的成年人接

受了文化教育。上述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年代对国家的破坏程度无关。战后，正如基本经济增长理论预测到的一样，越南人加大在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源两方面的投资力度。如今曾承受美国袭击之苦的地区经济条件几乎与其他地区毫无差别，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北纬 17 度

“从天而降”的美军炸弹与第五章中描述的非洲降雨的意义不一样。美军依据设计方案对这些炸弹进行投掷，而方案又由专家级的军事策划人（如麦克纳马拉）按照显然是非随机的战略思路进行规划的。例如，为何美国人划出特定地区进行极猛烈轰炸？历史学家蒂尔福德伯爵（Earl Tilford）认为，美国将军们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突袭来设置他们的空袭行动方案，目标旨在摧毁敌人的工业目标（如日本的工业城市广岛和长崎），从而“破坏越南北部的各项产业并毁灭其运输系统，从而防止越南北部支持南部发生叛乱”。

长崎已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因为它拥有一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的天然海港，而这里曾是商业中心，后来又发展成制造业中心，这使它成为美军战机的轰炸目标。如果未遭到美军轰炸，实际上长崎如今可能比日本其他城市更为繁荣。与之相似，假设美国将军们在越南选定的战略轰炸目标同样是有可能将越南经济带入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也许如果没有对美战争，它们也本应比周边城市更为富裕，而且仅仅是由于它们遭受了美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如今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

发展并不比越南其他地方好多少。

然而从美军轰炸的某些方面来看，这种空袭几乎是随机的，或者说至少与未来的工业发展潜力没有联系。特别是广治省的工业发展根本没有遭受损失，因为它根本没有工业。这一地区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幸，仅仅是因为它恰恰坐落在北纬 17 度，这一坐标成了分割越南南北两部分的人为分界线。除了“冷战”时期秘密谈判促成的 1954 年的越南分裂，这一界限的设置并没有特别的逻辑。美国希望将这一分界线进一步向北推进，以扩张其资本主义同盟越南南部的地盘，而苏联则竭力将分界线向南推进，以扩大其社会主义同盟越南北部的控制范围。在其为强化北纬 17 度分界线而付出的努力中，美军对越南的空中打击集中在一些看似“倒霉”的区域，例如广治省，它们偏偏离这条分界线非常近。

因此，北纬 17 度附近的地区招致了更多的轰炸，但这与遭轰炸地区的工业发展潜力无关。如果我们认为更多的轰炸阻碍了未来经济发展，那么如今越南“冷战”分界线附近的地区应当比该国其他地区更贫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越南其他地区一样，邻近战时分界线的地区正迅速发展，尽管这些地区面临着双重困境——曾遭战争重创，且远离该国的河内与胡志明市这两大城市市场。

对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很快就消失了，这一事实当然也算是“好消息”，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像广治这样的地方如何能在遭遇如此广泛的破坏之后还能恢复原貌。政府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将重建被摧毁的基础设施作为头等大事。根据越南政府统计的数据，

1976~1985年，遭轰炸较为严重的省份获得的公共投资数额是其他省份的两倍。随着1980年越南与柬埔寨等国的武装冲突结束，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因为和平使得国家能够最终将资源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中去。除了在公共基金投资方面，越南领导人还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越南的人口状况也使遭受沉重打击的地区更容易从战争的创伤中迅速恢复。他们运用颇为巧妙的方式确保密集轰炸中伤亡人数最少，这就是在长达数千英里的装备完善的地下通道中藏匿较长时间，而这些地下通道在战争期间就已建成。离开交战区的大多数人后来返回家乡参与了战后重建。

普及教育是越南北部政权的核心目标，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尽管当时国家仍受困于战争引发的乱局，他们还是成功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和扫盲运动。由于学校建筑易遭受轰炸，老师和学生们常常分散为各个小组以躲避空袭。越南的学生们无法像其他地方的孩子那样课间休息时在校园里玩球，也没有时间传播小伙伴间的“绯闻”，相反，他们将业余时间用在修建掩体上。当美军轰炸机在头顶耀武扬威时，他们总是不得不准备好头盔以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在某些地方人们每周或每天都要这么做。一接到警报（也许正在上课），学生们就必须抓起头盔跑向教室外的防轰炸避难所。

越南经济的迅速恢复也永远无法抹掉遭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的人们对战争期间和战后遭遇与创伤的记忆。对人的生命而言，还有比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的东西。在战争中遭猛烈轰炸的省内残疾人比

例更高，这些伤残也许由轰炸、落叶化学物质橙剂的大面积应用以及后来的地雷的伤害所致。上百万人死于非命，还有无数人为失去孩子、朋友、亲戚、邻居和爱人而悲痛欲绝。但至少在经济方面，国家重建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越南本可能是……

我们评估战争对经济的影响的方法，使我们明白越南各地区间的差异，但它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轰炸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尽管遭到猛烈轰炸的地区战后逐渐恢复发展，但仍有可能存在触及全国各地的负面影响。而且，无论恢复的速度多么快，除冲突带来的所有切身痛苦和遭遇外，确切地说，战争是一次短期经济灾难，因为如此多的时间和能量被投入到战争中而不是投入到创造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中。越南东南部的亚洲近邻，如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的“猛虎经济”，并未受到对美战争的影响。如今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为 4 970 美元，而泰国人均收入为 2 720 美元，但越南仅为 620 美元。

然而，战争除了引发的所有悲惨遭遇外，它也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一线希望。冲突使越南人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意识是在共同的战斗和同胞的牺牲中形成的。从长远来看，这种怀有共同目标的民族认同感有助于促进和平、达成共识以及实现政治稳定，甚至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但不要关心那些或积极或消极的本可以发生或不发生的事情。越

南已经享受到了战后重建带来的经济繁荣，而且经济复苏的益处已经延伸到大部分遭战争蹂躏的地区。因为自 1993 年开始实行自由市场改革以来，越南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 6%，这一速度几乎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快。因此战争对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造成的任何损害都不可能过于严重。如今，越南人均收入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两倍，而且这一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尽管历史上遭遇过最为密集的轰炸，越南并未因此陷入贫困陷阱之中。即使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也有可能从战争中恢复经济发展，前提是经济黑帮没有对此横加阻拦。

比炸弹更响

即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日本和越南在战后重建中拥有一项重要的优势：它们都经历了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自伯利克里时代以来，政客们已经明白，没有什么能像对付共同的敌人一样可以振作士气。抗击外侮激发了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实现了人民的团结，而这将给社会和政府机构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国内战争的影响可能与之相反，内战只能破坏团结并加深社会分裂的程度。而且，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斗争发生在内战的背景下，而非抵御外敌的战斗中。在卢旺达，邻居杀害邻居，而在塞拉利昂，童子军被迫袭击自己的家乡，有时还要屠杀自己的父母。战争结束时，这些因内战而分裂的社会注定要重新走向融合。仇恨逐渐蔓延开来，而

且在很多情况下，战后政治生活是围绕着消除夙怨而非建设共同家园而展开的。

内战造成的创伤需要数十年或者上百年才能愈合，富裕国家亦是如此——只消问一下来自美国南部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对谢尔曼将军及他为摧毁南方战斗意志而采取的“焦土政策”作何感想就知道了。看一眼 2004 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果的地区分布图就知道，美国内战远未成为历史——曾经属于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各州披上了统一的象征共和党的红色，从而“保送”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尽管党派标签可能有所改变，但在过去 140 多年里，跨越美国各地区的某些基本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仍根深蒂固。

此外，我们有能力对越南经济恢复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将越南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典型——根据“成功”一词的定义基本如此。收集研究像越南和日本这样的国家遭轰炸的可靠的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这简直是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几乎无法实现的奢侈想法。拥有这方面完备统计数据的国家几乎从来没有遭受过战火蹂躏。这也可能导致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偏见”：战后经济和机构瘫痪的国家（如乍得、阿富汗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缺乏合理数据，因此我们并没有着手研究战争持续存在的负面影响，尽管我们能够更为细致地研究成功案例。日本和越南的战后恢复表明：国家从战争中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这两个国家的战后恢复更多地属于例外而非规律。

非洲的失败和成功

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了解到的，非洲是世界上最易发生冲突的大洲，而且大多数国家，乍得、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等，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受困于冲突和经济衰退。不幸的是，非洲的暴力传统根植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内战争，它极有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停滞。

但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传出的消息并非全是坏消息。尽管内战仍会对社会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还是有许多国家已经逐渐走上经济复兴之路。也许正如非洲国家遭遇的种种失败一样，在这片历经灾难的土地上也出现了许多实现战后复兴的成功案例。内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均实现了越南式的经济繁荣。2002 年内战结束后，塞拉利昂和安哥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大量钻石和石油财富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救济穷困百姓。即便在卢旺达，经历了 1994 年种族灭绝惨案及之前武装暴力冲突频发的影响后，在过去 6 年里已经实现了 5% 的经济增长，这使人们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是什么令这些国家和它们最近的历史发展不同于仍深陷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之中不能自拔的乍得？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种选项中进行取舍——存在许多“候选”解释，但仍缺乏切实的证据来帮助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迄今为止，在研究战争如何爆发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超过研究和平何以维持方面取得的成就。尽管如此，近来一些国家的经历表明，某些对于战后维持和平秩序至

关重要的显而易见的原则仍旧是存在的。

首先，收缴枪支。如果拥有武器和部队的在逃叛军领袖隐藏在丛林中，战斗的终止更有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欺骗而非暴力活动的彻底终结。解除武装是确保和平的关键。

塞拉利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 2002 年内战结束时，美国和英国军队迅速进入该国并毫不留情地解除了革命联合阵线这支反叛力量的武装。后来某些革命联合阵线的领导人遭监禁并在特别法庭中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自 2003 年叛军最高领导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死去后（似乎因自然原因死亡），和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正如暴力滋生更为严重的暴力，和平也缔造和平。过去的每一年里，塞拉利昂变得越来越稳定，因为战争结束时束之高阁的各类枪支已经开始生锈，而且当年的战士逐渐长大、恋爱、结婚、工作，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最终，他们曾经历的战斗岁月似乎变成了模糊而遥远的噩梦。

除收缴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和平与社会安宁的机制。一个维持和平、执行法律并将反叛运动消灭于萌芽之中的强势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维持稳定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了解到的，并非所有政权都是“善意的”，许多政权是腐败的，是具有攻击性的，但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在一个并不完美却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比遭受对内战的恐惧强得多，这些民众承受着暴力、混乱和灾难折磨的重重痛苦。

塞拉利昂再次证明这些原则仍然有效。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该国由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掌权，当此君于 1985 年

卸任时留下了严重的腐败、猖獗的钻石走私以及经济下滑等一系列问题。如同填满非洲“后独立时代”万神殿的经济黑帮（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乍得的伊德里斯·代比）一样，史蒂文斯着手降低国家管理机构的等级，他将此视为对其绝对统治和窃取国家财富的能力的一种威胁。如果史蒂文斯基本完整地保留塞拉利昂的政府组织，战争本可以终止。在20世纪90年代内战达到顶峰时，该国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为现代非洲民族国家的失败提供了例证。

战后联合国认识到了塞拉利昂存在的种种失败，进而推动加强该国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管理的升级。在占领军的帮助下，2001年流亡海外的塞拉利昂当选总统回到国内，开始国家重建，以确保像以史蒂文斯为首的这样的经济黑帮不会再次掌权。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民主选举，成立新议会，而且众议院议员地方理事会得以恢复（在史蒂文斯统治时期曾遭废除），这使得民众在地方事务中有了发言权，增强了政府为地方开展公共服务的能力。重整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为这些人涨薪4倍。在2007年总统大选前，各党派开展了激烈的内部初选，甚至进行了副总统辩论，这在塞拉利昂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政治权力的诱惑和积极的驱使下，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反对党赢得了全面胜利，执政党则和平退位。

塞拉利昂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与其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年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左右，尽管该国是从战后跌至谷底的生活水平起步的。虽然面临再次爆发叛乱的威胁，但外国投资还是大量涌入，特别是对采矿业的投资。但并不仅仅是外资驱动了其经济的迅速增长，

政府也为失业在家的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公共建设方面的工作机会：重新粉刷建筑物和道路上的指示线，看管公共停车场。也许借鉴了博茨瓦纳“干旱救济项目”的成功之处（第六章中对其进行了介绍），尽管战争造成的创伤仍清晰可见，如今的塞拉利昂却已经开始走上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复兴之路。

塞拉利昂已经从非洲典型的“失败国家”迅速走向了成功，但进步之路仍然步履维艰。战争留下的伤痕仍未痊愈，该国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远离灾难后可能只遭遇一季干旱，社会就会再次陷入混乱状态。但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国际社会援助者为维持塞拉利昂国内和平并支持政府改革而与其建立的伙伴关系有望继续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即便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贫困且暴力程度最高的国家，也能凭借一点运气和一些进步的改革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转变。塞拉利昂的经济扩张并未使其与日本或越南形成竞争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未出现竞争迹象，但此刻，对饱经战乱折磨的塞拉利昂国民而言，免遭战争和饥饿的生活也许已经足够了。

重建巴格达

随着 2003 年 3 月 20 日“战斧式巡航导弹”的爆炸声响彻巴格达寂静的清晨，伊拉克对美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几周的时间里，在成千上万吨炸药的猛烈轰炸下，常规战争很快就宣告结束。由于伊拉克大部分基础设施已遭破坏，美国各机构计划开展大规模的战后重建。

美军强行驻扎伊拉克，承诺帮助重建并对付仍然存在的零星抵抗。专家们认为，日本为伊拉克如何实现战后经济复苏提供了参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原子弹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我们所知，在经济繁荣的带动下，日本很快就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很多人由此认为，假以时日伊拉克也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显然这并未在伊拉克成为现实。哪里出错了？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日本与伊拉克的类比就站不住脚了。尽管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物质损失较日本更轻——与广岛相比，美军对巴格达的轰炸只相当于戳破了手指头，但战争带来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创伤较日本的情况严重得多。在与之前发生的冲突进行对比时，伊拉克的遭遇实际上与非洲国家的内战（如乍得内战）更为相似，而不像社会和谐的日本遭遇的物质损失。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日本不同，伊拉克的现代史是一部充斥着种族和宗教团体间暴力冲突的历史——北方的库尔德人、中部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南部各省的什叶派，另外还有其它一些规模更小的组织。与越南和日本相比，伊拉克人缺乏能够实现战后民族团结的国家认同感。要弥合种族和宗教鸿沟，就必须进行社会关系、文化和政府机构方面的改革，而且实现上述改革比修补遭炸毁的道路更为困难。

因此，在战后的伊拉克实现和平，意味着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也许情况并不会比塞拉利昂 2002 年内战结束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更糟。但毕竟伊拉克不是塞拉利昂。

在伊拉克重建中存在着与塞拉利昂不同的重要之处。一方面，伊拉克发生的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在日本经历两次极为恐怖的核攻击后，

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并号召民众与美军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士兵恭敬顺从地交出武器，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尽管塞拉利昂叛军也被迫将武器交给英国盟军）。随后，美国将裕仁天皇（此前是遭盟军鄙视的敌国首脑）以及大部分战时将军吸纳进占领体制中。通过新宪法对原有日本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而不是将其彻底铲除。事实证明，较之简单地从根基处摧毁整个政府体系，上述做法更为有效，因为从零开始重建国家政治机器异常艰难。

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犯外，战胜国在德国和意大利实施的战后政策，与在日本实施的各项政策并无根本性差别。在上述三国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美国占领军基本上保留了之前用于维系可怕的轴心国战争机器的现有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并使其开展和平建设方面的工作，如制造汽车而不是生产坦克和大炮。大规模政治清洗并非向和平转变的一部分。明确的和解也被列入战后塞拉利昂的政治议程中。作为和平解决的组成部分，革命联合阵线成为一个登记在册的合法政党，尽管在战后民主选举中他们并未赢得过议会席位。对平民百姓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在选举中并不管用。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两大关键性治理机构是他掌管的军队和由他领导的复兴党，该党共有 150 万名党员。与苏联的情况相同，成为复兴党党员一直是在社会生活的若干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先决条件，包括大学教授，甚至是医院的医生，但 2003 年 5 月之后，复兴党党员被明令禁止把持公共建设方面的就业岗位。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被解散，而且许多政府要员被捕入狱。该国的知识分子

阶层和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加入复兴党，只为求得更高的薪水）被剥夺了参与国家重建的资格。

然而，更为危险的是伊拉克军队的解散。这使得成千上万名全副武装的人无事可做，而且没有任何生计来源，他们唯一拥有的职业资格便是训练狙击手和制造爆炸。对于美军和平民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伊拉克最新出现的经济黑帮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职业”。

美国为腐败和暴力的滋生创造了空间，而且原有的种族和宗教对抗重新出现，这彻底葬送了经济加速恢复的任何希望。在缺少强势政府机构以实现国家团结的情况下，似乎伊拉克也要像乍得那样分崩离析。即便美国现在准备吸取某些前车之鉴，要轻易将四分五裂的伊拉克恢复原样是不是为时已晚？

钻石是游击队的最佳伙伴

2002年，大多数安哥拉人过着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钻石资源。经历数十年国内战争后，他们比解放后的27年里更加贫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叛乱武装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与政府军战斗中遇害，这使叛军陷入混乱之中。随着市民纷纷涌入首都罗安达（Luanda）街头庆祝，叛军的失败预示着新的繁荣与和平即将降临这个国家。

然而，对于那些借战争造成的混乱来掠夺安哥拉宝石的生意人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当萨文比之死在新闻界引起轰动时，投资客们纷纷抛售他们在安哥拉有大量业务的矿业公司的股份。用与我们研究苏哈托健康问题引发的恐慌所使用的方法相似的研究方法（见第二章），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马西莫·奎多利尼（Massimo Guidolin）和博科尼大学的伊莲娜·费拉拉（Elianna La Ferrara）发现在大约数天的时间里，上述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12%。为什么和平对钻石生意产生的影响显得如此糟糕？而且这一发现能否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战争（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战争，如安哥拉、乍得、塞拉利昂或苏丹）一直持续不断？

奎多利尼与费拉拉认为，矿业公司遭到了投资商撤股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们从安哥拉钻石中赚取的财富依赖于内战造成的国内乱局。萨文比死后，尽管有安哥拉资金投入的矿业公司股价大跌，那些没有本国投资的矿业公司的股票却升值了。换句话说，由于摧毁了阻止竞争机制进入市场的障碍，冲突的终结打击了占主导地位的钻石公司。大多数人，包括雷执教的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班中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商业成功的关键是廉价而高效地生产人们想要购买的某些东西。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战争的终结应当使安哥拉矿业公司及其股东更加富有，因为钻石的开采成本已大幅下降。但和平对安哥拉钻石开采的影响表明，比生产优质产品更重要的是生

产比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

对于要运营矿业公司的钻石开采者而言，战时的安哥拉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地方，因为道路被炸毁，绑架时有发生，而且还要冒着有可能误入冲突区的危险。运营一家采矿企业意味着要进行某些违法操作。据称，各大公司均雇用了像万能公司（Executive Outcomes，一支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退役的特种兵中招募人员的私人武装力量）这样的公司来保护公司运营免遭袭击。安哥拉和平监测组织 2001 年的报告显示，守卫一处矿井的成本就高达每月 50 万美金，而且为了使矿井不受政府干预，行贿成为常态。

并不是每一位总裁或股东都愿意招募一支私人部队，或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丹尼·阿彻”（Danny Archer）合作，他是一位由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在有关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Blood Diamond*）中扮演的雇佣兵。但有些人就知道如何将战争引发的灾难转变为他们的优势。多年来，像马诺河资源有限公司（Mano River Resource）、钻石工厂（Diamond Works）和雷克斯金刚石公司（Rex Diamond）等矿业公司在非洲战乱不断的地区开展采矿业务，而高昂的成本和各种困难迫使其他公司另谋他处。这就是说，战争扮演了“进入壁垒”的角色，将其他公司挡在市场之外，而使已进入该市场领域的公司获得高额利润。2002 年后，安哥拉的和平为许多希望获得营利性采矿许可证的新的矿业公司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奎多利尼和费拉拉发现，大多数战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保住了它们的采矿特许权，某些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时拓展了自身在安哥拉的业务。然而，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帮助政府从发现市场力量的角度重新审查其签发的开采合同。随着和平的到来，据称6家钻石公司参与了矿业开采合同的角逐，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钻石商戴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该公司曾在安哥拉发生战争期间撤离了安哥拉。

和平时期的安哥拉政府在谈判中也重新找回了耐心。此前，政府一直面临财政压力，而且在疯狂地获取硬通货以购买武器的过程中，政府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合同条款。和平意味着钻石公司无法再轻易达成与此前一样的“甜蜜交易”。支付给政府的矿业特许经营税从2002年的375万美元暴涨至一年后的11 000万美元，尽管所开采的钻石仅有小幅升值。总体而言，自战争结束以来，安哥拉经济已实现腾飞，2003~2005年间，人均收入增幅超过了20%，这再次证明，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迅速在战后实现复苏。如果说老牌钻石公司深受战争结束后和平到来之“害”，那么对国家其他部门而言，和平则实为幸事。

在近年来非洲大部分国家出现的石油开采热潮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经济繁荣与商业利润间的另一种分离。某些西方石油公司，无论其为伦理道德所禁止，还是遭到法律的制约，都回避与最令人厌恶的非洲独裁者共事。

ECONOMIC GANGSTERS

第八章

向经济黑帮开战！

“一点一点，水罐终将被装满。”

——传统斯瓦西里谚语

只要有路，而且路足够长，那么，就一直会存在腐败官员和承包商私吞道路修筑工程款的问题。道路修筑需要各种原材料，如沙子和石头，而且需要付出大量体力劳动，而这又都是由承包商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和雇用劳动者实现的。现实生活中的黑道人物托尼·索布拉诺（Tony Sopranos）指出，通过为这些合同开具高价发票就大有可赚：将建筑提供商的预算增加1倍，购买一些便宜的混凝土，与你在路政部门的亲信瓜分未用完的建筑款。

肯尼亚人将首都内罗毕坑洼不平、拥挤不堪的路况归咎于此。2004年，只有14%的肯尼亚道路铺砌完成，与1990年13%的道路被铺砌相比，路况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数百万美元遭贪污挪用，而外国援助者已经不愿意将更多的援助资金注入肯尼亚路政部门的财政

“黑洞”，这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由于肯尼亚交通基础设施的破败，本可以在1小时内完成的旅程能延长为大汗淋漓的一整天远行。对于企业和卡车司机而言，这意味着利润的降低和面临失业。肯尼亚的交通事故发生率也属全球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该国高速公路上的坑洼和沟道形成的难行路段造成的。

这确实是一个事关发展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并促使政府部门对其采取某些措施。但肯尼亚高速公路承包商是比中国走私犯更为油滑的研究目标。研究经济黑帮的过程有欢乐也有困惑，搜寻意料之外答案的兴奋与无法在研究经济发展中某些最宏大但又看似最简单的问题（像如何修建更好的公路）方面取得进展时遭遇重重挫折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仅运用投资者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购买的股票，我们就已经证实了指向苏哈托的朋友及亲属的裙带关系；通过揭露中国走私犯隐藏起来的走私路径，了解了政府如何运用根植于关税规则中的经济动机打击走私；透过联合国外交官们的违章停车记录，我们发现腐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认识到绝望之人悲惨的生活条件能把他们变成精于算计的经济黑帮后，我们还发现了理解并防止暴力的新办法；明白了经济因素驱动的暴力行为背后的各种动机，我们通过援助在暴力活动开始前阻止暴力进而创立打破暴力循环的新机制。

在理解贫困国家腐败和暴力的努力中，我们获得了新的深刻的认识，但这些只是我们的立足点。本书提到的我们所开展的工作是发展经济学家这个更为广泛的群体付出的更巨大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只是

刚刚开始理解能对肯尼亚坑坑洼洼的公路和世界上的经济黑帮做些什么。看似有效的政策确实不在少数，但我们如何弄明白哪种政策能真正起作用呢？

基本经济原则，与某种常识相结合，能引导我们推荐可行的政策。我们知道经济刺激非常重要，因此研究腐败问题的有利切入点是思索刺激潜在的腐败官员的“胡萝卜”和“大棒”。更高的政府财政透明度——如在网站发布公路合同招标公告以及有关中标的更详细情况——有助于减少肯尼亚公路建设中出现的回扣吗？

增加政府官员薪水，以减少受贿行为，是否可行？考虑到在肯尼亚一位初级警官的月薪仅为 65 美元。就凭如此低的薪水，他也必然会拦路搜查过往的汽车司机以收取贿赂。而且无论如何，如果因受贿被抓，那么将要失去的只是一份所获报酬仅比在田中劳作稍高一点的无趣工作。

但是倘若将其工资增加 1 倍，那么这位警察就有可能三思而后行。尽管月薪 130 美元无法使其变得富有，但这足以养活他的家人，而且比肯尼亚工人平均收入高出 1 倍还多。这就是“等式”的其中一边——“胡萝卜”。然而，即便他对种族关切无动于衷，他也会因为害怕丢掉现在这样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而被说服。这将我们引向这位警官成本与收益权衡的另一端——“大棒”：如果官员完全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而道德良知不起作用，那么，如果伴有遭到惩罚的切实的威胁，更高的政府薪酬就只有在阻止腐败时发挥效用。但是，如果他能够使自己的工资翻番并继续对不该受惩罚的司机和企业主搜刮盘剥，那么，更高的薪水只会起到进一步拉紧政府预算的效果。

事实上，2004年肯尼亚政府确实将警察薪水提高了1倍。近期其他许多国家，通常在听取西方援助者意见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与肯尼亚政府相同的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务员工资以遏制腐败的发生。上述改革的成效何在？某些人认为，这已经在减少贿赂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也有人指出，如今肯尼亚腐败依旧，而警察却更加富有。如果工资上涨取得了成效，那么政府廉洁情况的改善是得益于良知逐渐发挥作用，还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遗憾的是，对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富有洞察力的问题研究方式。

聚焦于经济刺激因素也能帮助我们设计出切合实际的政策，从而在混乱的社会组织中促进和平。既然我们已经表明艰苦的经济条件能够引发非洲的暴力活动，我们也希望找到在更为持久的和平环境中有所回报的定向投资。必须使贫困的年轻人，他们通常是最先拿起武器的一批人，掌握抵御干旱和经济衰退的本领而不是转向从事暴力活动。职业培训项目能帮助这些年轻人学到有市场前景的手艺，像木匠、裁缝和汽车修理工，而且他们较高的收入能够确保他们自身及家人安然度过困难光景。通过提高遵循正确法则而获得的经济回报，这一“胡萝卜”将明显地改变面临潜在犯罪活动甚至是叛乱时的成本与收益的结果。

经济逻辑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为很多国家内战后安排和平建设项目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尚没有研究项目令人信服地对其影响进行衡量，这些再整合培训项目在建设更为和平的社会中发挥的效力（能够使贫困国家在频繁的经济打击之下有更好的承受力）仍是人道主义援

助团体中备受争议的话题。

在腐败、暴力和经济发展领域，我们的研究还有许多仍未解答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腐败并不只是一个有关“胡萝卜”和“大棒”的问题，文化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们仍不知道如何最合理地改变文化和社会规范。难道要借助拉美的反腐败肥皂剧或在非洲各个村庄布道的牧师们所做的反腐败训诫演说？与之相似，如果文化因素驱动了某些社会中的武装暴力活动，那么像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是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吗？

我们希望找到破解这一难题的线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学研究者们就能弄清楚全部事实的真相。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必须在研究中保持机会主义立场，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一直在尝试回答哪些问题。我们之所以研究印度尼西亚政治关系的价值，因为我们可以衡量这些关系，而且我们有幸以这样一位强势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政治强人做研究对象；我们利用降雨研究非洲内战，因为完善的卫星数据使我们能够顺利穿过贫困和暴力纠缠在一起组成的混沌网络。

有关腐败、暴力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仍然是永远无法组成连贯画面的各种事实和结果的拼凑？或者说，在我们的经济调查中，是否有某种方法更具系统性？

应对病痛

我们医学领域的同行在其调查中并未感到如此无能为力。医学研

究者正不断地研发新疗法以延长人类寿命，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他们遵循一套业已建立起来的规程来确定是否这些创意确实有效。根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规定，医学领域的创意在获准进入广泛临床应用前，首先要用随机诊疗试验对其进行评估。

假设你想测试治疗艾滋病的一种新疗法。可以尝试一下“随机临床试验指南”，这种方法简单易懂：

(1) 收集感染病毒的抽样人群的健康状况信息，诸如他们的体重、白细胞数量以及其他可能受到治疗影响的指标。

(2) 之后，随机指派抽样人群中的两位病人分别接受新疗法（治疗组）和传统艾滋病疗法（控制组）。可通过掷硬币这种简单方法来随机选择让病人进入上述两个组中的哪一组。

(3) 追踪治疗组和控制组病人健康状况出现的任何后续变化。

仅此而已。为了弄清楚你所使用的新型艾滋病疗法是否比传统疗法更为有效，只需看一下经过几个月（或几年）治疗后反映这两组病人的健康状况的数据。如果治疗组病人的艾滋病并发症发病率低于控制组病人的艾滋病并发症发病率，白细胞数量仍相对较高，而且治疗组病人总体上健康状况更好，那么我们就知道新疗法是有效的。

治疗组和控制组病人间存在的某些其他方面的差别是造成两种疗法效果不同的原因吗？不，这就是随机选择的好处。只要有足够数量

的分析主体来确保统计结果，这么做是有意义的，那么根据定义，两个不同研究组间的任何其他差别都是随机的（将某位病人安排进一个组或另一个组是通过抛硬币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治疗组的病人健康状况更佳，那么这就得益于新型艾滋病疗法的效果。

在过去的 50 年里，随机临床试验的进行已促使新的医疗技术激增。但是如果医学的发展仍然因循守旧——医生根据其掌握的个别经验、他们对病人的“感觉”或者古老的药方确立治疗方案（例如用水蛭为病人抽血），那么医疗技术的进步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地受益于科学疗法的人的寿命更长且健康状况更好。

207

经济学家的对策

目前尚无法从概念上解释为何经济学家无法利用随机选择的“魔力”，如通过选择村民或者整个村庄，使其接受某项经济措施，并将发生的变化与参与试验的村民或村庄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在上述观点的指引下，我们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在应对全球贫困的挑战中实现类似的突破。

事实上，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真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在随机试验方面取得的经验，在随机项目评估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我们的同行在医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相似。在经济研究中去验证并采用了这一新方法的地点就是肯尼亚西部的布西亚地区。布西亚是与非洲其他许多农村非常相似的一个地区，那儿的大多数人靠种植谷物（玉

米)和大豆维持生计,而且梦想着迁居内罗毕寻找工作和发展机遇。在布西亚地区开展研究的经济学家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带队,特德也参与其中,他们处于生产活动研究的前沿,很有希望获取何种因素能推动发展的更有力的证据。

通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杰米尔消除贫困行动实验室的合作,在布西亚开展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已经通过进行随机评估证明了,提供预防蛔虫的抗寄生虫药(蛔虫病是布西亚地区90%的儿童都曾患过的一种主要疫病)能提高孩子们的入学率,而且可能会对学生们的健康状况产生长期影响。正如医学研究人员相信他们研究出的新疗法能够改善他们安排在治疗组的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我们可以肯定,提供预防蛔虫的抗寄生虫药可以提高学生入学率。由于学生们获得抗寄生虫药的学校是随机选择的,除了学生们在学校里获得抗寄生虫药以外,总体上看治疗组的患者所在的学校与控制组的患者所在的学校并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关注点集中在像抗寄生虫药对孩子入学率的影响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上,在项目的影响力上,随机评估并不是总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就是随机评估做法“不近人情的魅力”所在:当某项抗击贫困项目不起作用时,随机评估也会出现惨淡的、不受欢迎的结果。而且有关失败的信息正像报告成功的信息一样有用,因为它可以使政策制定者将资金从无法发挥作用的项目中移走,转而扩展有助于改善当地贫困状况的项目。

在布西亚,抗击贫困领域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伴随着两到三个没

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发展规划。例如，考虑到布西亚各学校缺少教科书，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会预计到提供更多的教科书将有助于提高学生们的考试成绩。然而，事实证明，从总体上看，随机指定接收额外书籍捐赠的班级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比控制组所在学校的同龄人的成绩更好。也许其他教育开支，例如更高的教师薪水将更为有效，或者说，也许肯尼亚学校的教科书并不见得有多好。保罗·格列卫（Paul Glewwe）与合著者发现，对于肯尼亚大多数农村学生而言，标准教科书的难度太高，也许这些教科书的编写只是为了迎合首都内罗毕精英们家中的“高才生”的需要。无论原因何在，我们已经认识到，需要将资源从这些尽管意图很好但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的项目中移走。

在布西亚和其他地区经济学家辛勤工作的推动下，贫困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逐渐能够依赖确凿的证据来决定如何使用它们非常稀缺的资源。现在我们明白了抗寄生虫药在改善布西亚儿童入学率方面具有的益处，而且肯尼亚政府由此已经将大规模学校除虫活动纳入了官方的全国学校卫生规划中。消息传开，其他非洲国家也纷纷扩充本国的学校除虫计划，包括加纳，2007年该国超过400万名学龄儿童收到了抗寄生虫药以纪念国家独立50周年。

腐败大乐透

正如布西亚的经济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如何最好地教育肯尼亚

的孩子们一样，在弄清楚何种现实政策最有助于打击经济犯罪这一问题时，我们可以采取与之相似的系统性的方法。我们已经掌握了经济发展的“铁律”，即很多理论上可行的观点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有效。为了弄明白在打击腐败和贫困的过程中何种“工具”最有用，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随机评估的方法，该方法已经证实了除虫措施的效力以及肯尼亚教科书在改变现状方面的无能为力。

针对腐败问题的项目评估“指南”，与任何其他的项目评估指南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首先，全面收集背景数据，之后在随机选择的村庄（或港口，或警察局）中安排的若干组中执行新项目，到最后，衡量一下随机选择的开展反腐败宣传教育的地点的腐败现象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或者何处警察的工资上涨了（他们一旦因收受贿赂被抓，损失可能会更大），或者这一新项目包含其他哪些方面。

然而，尽管从概念上看，应用随机评估的方法来研究腐败简单明了，但每一次调整研究方向时总会遇到困难。例如，我们何以能够收集到有关腐败等级的数据？我们也许能够应用本书中提到的某些观点以及下文中我们将会谈到的其他观点达到上述目标。

此外，在乡村学校分发教科书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开始调整警员工资水平或一国税率等级，或者政府高速公路合同的分配，起码可以说具有微妙的政治意义。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许这么做未尝不可。发展中国家政府一向开展反腐败活动，有些凭借自身力量开展，有些是在国际援助者的鼓励下开展的，因此我们也许能够等待上述活动的出现并尽量对其效果进行记录。然而，我们遇到的更为深层的问题是，

在打击腐败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推动投资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常常对政策作出多处调整。这就使弄清单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变得很困难。因此，决定为官员支付更高工资的一国政府也许会将这一改革同时与更为缜密的对高速公路合同的法律调查结合起来。

要弄明白单项改革措施也是较为困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在缺少变化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控制组。也许改革前腐败程度已经有所下降，也许改革后腐败程度有所加深。也许腐败程度之所以降低正是由于改革的作用，也许无论如何腐败等级都会下降。或者，也许反腐败项目恰好开展得非常顺利，因为政府改革者已察觉到不断加剧的腐败所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变化趋势能够引发改革而非其他的。

这些正是我们重新审视随机试验重要性时遇到的观念上的困难。各国到底想不想弄清楚本国在反腐败方面付出的努力是否能见到成效，而且作为一个全球共同体，是否所有国家都想要逐步建立对打击腐败颇有成效的制度体系，某些系统性实验必然是我们所付出努力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这势必将包括精于随机评估之道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正如对布西亚教育和医疗状况进行评估而开展的各项工作中所涉及的各方协作）。

这并非“空中楼阁”式的空想：世界银行前总裁保罗·沃尔福威茨曾将打击腐败列为其短暂（而情势多变）任期内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他的继任者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上任后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世界银行可以非常高效地扮演世界各地“随机评估协

调员”的角色，并开展需要具备我们所描述的政府与研究人员间具有更为紧密合作关系的其他研究工作。事实上，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上文中提到的布西亚地区所有评估项目均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财政支持和政治支持，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反腐败评估中，世界银行也发挥了此类作用。

流氓与会计师

212

随机试验能提供哪些有关根除道路建设过程中腐败现象的真知灼见？这曾是经济学家本·奥尔肯（Ben Olken）在决心为完成博士论文而雇用印度尼西亚公路建设承包商时为自己设定的更具雄心的目标。利用世界银行的资金，在超过 600 个村庄中，为每个村庄分配接近 9 000 美元以修建一条村路。为了使当地建筑商保持诚信，某些村庄被告之随后将对道路修筑项目进行财务审计以确保资金没有被挪用；在另外一些村庄，则将权力下放给村民，召开“市政厅”式会议，允许村民讨论并监督当地政治家们的建筑规划。近年来，此类社区参与的形式被视为解决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特别是针对类似腐败这样的政府治理方面的难题。如果村民们能监督他们的资金流向，那么遭挪用或贪污的资金就会减少，从理论上讲，这非常有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印度尼西亚农村地区，“知道某种情况”也许与“发现它确实存在”之间有着巨大差别。

至关重要的是，在奥尔肯的研究中还有第三组印度尼西亚的村庄，

在这组村庄中，没有设置针对腐败问题的任何特殊安排。这些村庄是为评估外部审计员和村民会议效力的控制组而服务的。

由于对三个组进行了随机安排，所以我们了解了流失资金方面存在的任何差别实际上都是由审计工作或村民会议导致的。但我们如何衡量究竟有多少资金消失了？我们确实知道为每个项目划拨的资金数额，因此我们只需知道这些道路的实际建设成本，上述两笔资金总额的差别就会告诉我们有多少钱已经流失了，大部分流失资金可能落进了不知廉耻的承包商和政府官员的腰包里。

为了评估村路的修筑成本，奥尔肯选派了颇具经验的工程师团队进驻这 600 个村庄，评估建好的每条村路的质量。例如，通过挖取道路核心样本，工程师能够发现村路建设中是否存在“掺水”问题，即用廉价沙子代替价格昂贵的沙砾。例如，将 9 000 美元划拨到乡村公路修建项目，如果奥尔肯的工程师经评估认为，公路造价实际仅为 6 000 美元，那么我们就能够据此得出结论：1/3 的工程款，约 3 000 美元，遭滥用或盗用了。

审计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预防道路施工“掺水”和工程款被盗用？村民会议在此方面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奥尔肯发现，工程审计工作预防了许多工程款被盗用的问题：在控制组中，接近 30% 的道路修筑资金遭盗用，而在那些承包商被预先警告将进行审计的村庄中，这一数字下降到 20% 以下。因此，审计工作减少了超过 1/3 的资金被盗用现象。

然而，村民会议的影响并未充分说明当地参与式民主的有效性：那些举行村民会议的村庄与未进行特别安排的村庄几乎全都出现了资

金被盗用的现象。在确定工程资金被盗用数额时，印度尼西亚地方长官和他们的承包商伙伴更惧怕来自雅加达的专业审计师而不怕他们村子里的邻居。

拯救非洲

农业歉收会引发暴力，无论是以全国内战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猎巫行动”式的犯罪形式出现，或者以武装抢劫的形式出现。从理论上讲，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很简单：为大部分易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村庄提供旱灾和洪涝预防措施。

博茨瓦纳“干旱救济项目”的成功为如何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也启发了我们的“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建议（第六章中曾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博茨瓦纳的情况并非典型，至少在非洲不能算典型，因为这个稳定且繁荣的民主国家位于一个拥有众多经济瘫痪的国家的大陆。随机试验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在这块大陆的其他地方为农作物投保是否有效。

这是世界银行的泽维尔·金（Xavier Gine）和密歇根大学的迪安·杨（Dean Yang）的研究目标，他们正在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研究为庄稼投保项目，这个与博茨瓦纳同处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在经济或政治成就方面却远不及博茨瓦纳。在当地政府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他们向随机选择的部分村庄的农民提供低降雨量保险。和奥尔肯在道路建设项目中采用的方法一样，其他随机选择的村庄作为控制组，可

借助此类控制组衡量取得的所有收益。

在此保险项目的帮助下，可预见的当地村民每年生活标准提高的幅度将有多大？既然保险使他们心里有了底儿，农户们就更有能力种植高产但产量并不稳定的经济作物？该保险项目也会降低不可避免的干旱年景里的犯罪率？希望几年后他们有所收获时我们能够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当我们“为农作物投保”的理论遇到非洲干旱的现实情况时，对给农作物投保效果进行的可靠分析有助于决策者确定新项目（如“预防冲突的快速支持行动”）是否能够发挥效用以及如何使其发挥效用。

希望从马拉维得到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设计更为完善的保险项目，并在暴力活动出现前对其进行预防性打击。但在经济发展问题领域，仍存在其他许多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随机评估方法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评估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某些问题。例如，要说服财政部长们随机增加某些政府部门雇员而非其他部门雇员的薪水并非易事（尽管雷已经尝试过）。即便部长先生们同意使用这些评估方法，研究人员也必须认真考虑这么做所产生的价值是否可以抵消任何有可能对人们生活构成的威胁。在任何研究试验中，如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试验中，都需要进行认真的道德考量。

某些试验显然是不可能进行的。我们无法随机增加国会议员们的工资，以观察这一做法是否能预防贪污。因此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仍需要继续寻找对付“自然”经济环境中经济黑帮的方法，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各章中所做的。

对于许多经济发展问题，从腐败和暴力到农业、教育、健康以及其他领域的问题，随机评估方法仍有助于我们找到前进的路，使我们在每一步缜密的研究过程中都有所收获。幸运的话，未来数十年里随机评估方法在削减全球贫困方面也将见到成效，就像其过去半个世纪里在治理各种社会弊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样。

走投无路？

216

为了弄明白为何随机项目评估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如此重要，从布西亚出发，沿公路（一条颠簸不平的双车道公路，这还要拜肯尼亚流失了的道路建设资金所赐）下行 40 英里来到位于绍里的农庄。从路边看这个村庄与布西亚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特德 2007 年拜访此地时所见），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这位经济发展“贫困陷阱理论”的大力拥护者，在这儿进行了一项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试验。

萨克斯教授并非兼职学术评论员或者事后诸葛。除理论建树外，他还亲自证明，借助其“千年村庄项目”，各个村庄都能脱离贫困陷阱。通过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共同努力，“千年村庄项目”旨在创建“模范村庄”，在其中应用经济发展思想的最新成就，从而表明即便情况最为糟糕的非洲村庄也能摆脱极端贫困。“千年村庄项目”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解决贫困问题的项目之一，而且只要有新闻记者和决策者组成的国际代表团到访这些村庄，该项目采取的诸项措施就都会被报道。

绍里正是参加“千年村庄项目”的第一个村庄。像布西亚的村民和大多数肯尼亚人一样，绍里的村民靠种粮维持生计、供养孩子们上学，此外还要在绝望中遭受疟疾和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折磨。“千年村庄项目”可以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以帮助当地村民彻底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2004年，在村庄领导人的帮助下，一流的保健医生、教师和农业专家开始为绍里设计全面的农村发展规划。这种方式让我们想起20世纪70~80年代世界银行曾提出的若干“农村综合发展项目”。

得益于“千年村庄项目”，如今绍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医疗站，产科病房也在筹建。而且村子里的18口饮用水水井也得到清理，从而降低了儿童痢疾发病率。此外，“千年村庄项目”还为“小学午餐项目”提供了部分资金，并将大量化肥分发到当地农民手中以帮助他们提高粮食产量。

截至2007年底，整个非洲大陆已有79个像绍里一样参加“千年村庄项目”的村庄，它们都得到了西方财团和基金会的大规模募捐资助，资助总额超过1亿美元。在过去的5年里，每个加入“千年村庄项目”的村庄接受的外部援助资金额年均约30万美元。这相当于绍里的5000名村民每人每年得到约600美元的援助，或者接近他们在加入“千年村庄项目”前人均收入的两倍。让绍里加入“千年村庄项目”的发起人声称，事实将证明他们的方法具有革命性意义。绍里是个“正在创造历史的村庄”，萨克斯教授在其“千年村庄项目”的纪录片中对此大加称颂，“它是个将要终结极端贫困的村庄”。

那是在 2004 年。自此以后发生了什么？该项目在第一年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誉为项非常了不起的创举：项目报告指出，由于学校午餐资助计划的实施，小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大幅提高，而且在农业援助项目的支持下，2004~2005 年谷物产量增加了 3 倍。确实，无论何处粮食产量提高 3 倍都将大幅降低贫困，这会令人们感到振奋。也许经过若干年募集农业、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援助资金，在绍里已经开始实施的“千年村庄项目”足以帮助身居农村的非洲人脱离长期以来的贫困陷阱，而且能够在我们搜寻全球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支持。

然而，在该项目初见规模并被其他地区采用之前，我们希望确信“千年村庄项目”的开展所产生的成效实际上远不只是绍里有可能出现的惊人变化。设想一下，当几年后再回到这个村庄时，我们发现绍里的收入水平是如今的 5 倍，而这时所有援助人员已经结束了在这里开展的援助项目，转而奔赴下一批加入“千年村庄项目”的村庄。那么，我们就无须进行仔细的可控式的随机评估来确认他们已脱离贫困陷阱并已经着手实施其他措施发展经济了，正如如果没有 HIV 呈阳性患者发病，我们就无须进行随机试验以证明一种新型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有效一样。

但是，如果假设一种更切合实际的情况，即从长远来看，绍里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适中，比如，收入增幅为 30% 而非增长 5 倍。30% 的增长仍能使绍里成为肯尼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要弄清楚“千年村庄项目”在提高收入方面发挥的作用就较为复杂了。

这是因为绍里与周边村庄相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而且也正因如此，绍里才首先被选定为“千年村庄项目”的“模范村庄”？我们可能会想，是否30%的收入增长幅度足以证明该项目前期支出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是否相对于其他发展项目，该项目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千年村庄项目”的具体构成，例如免费农作物肥料对于绍里项目的成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其他组成部分根本没用？在不进行一系列项目评估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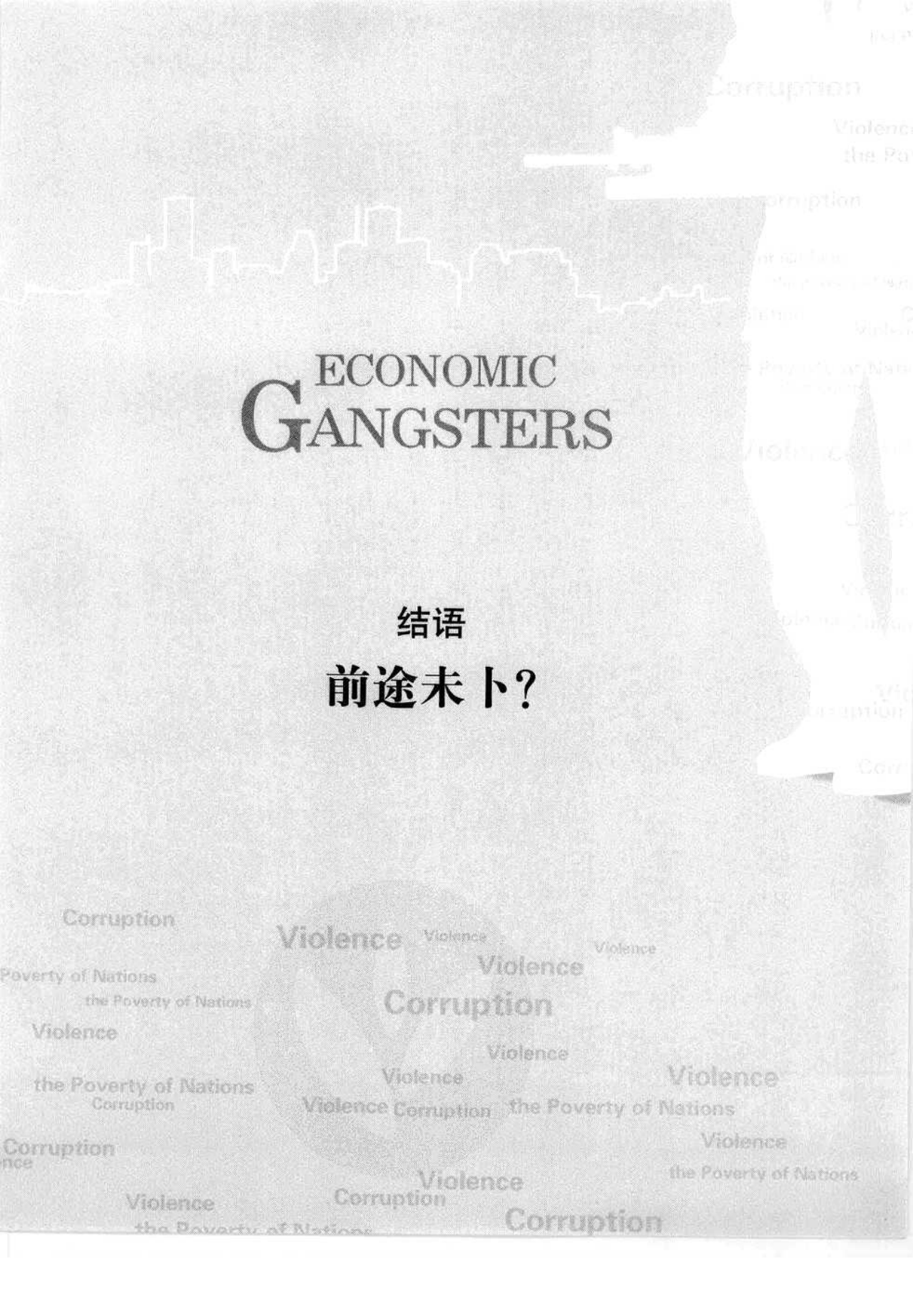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在绍里进行随机评估，因此我们实际上无从知道绍里粮食产量增加3倍或者任何其他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千年村庄项目”的实施。“千年村庄项目”在绍里实施的早期阶段正逢肯尼亚国家经济复兴之时。尽管与近几年中国几近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速相比仍相对缓慢，但肯尼亚2004~2007年年均5%~6%的增长速度仍使其居于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同等的位置，而这也是我们希望非洲各国能最终实现的目标。

你可以看到，肯尼亚新发现的财富成果在内罗毕和其他城镇到处可见：兜售手机的推销员就像混凝土里冒出的杂草，高峰时段市区街道上挤满了进口的日本轿车，还有为满足这个近来刚刚走向复兴的国家的巨大需求而竞相建立起来的一座座高档公寓。最近几年，肯尼亚国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程度不断下降。在没有完备的村庄控制组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肯定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将绍里的经济进步归因于“千年村庄项目”的实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其归因于全国经济状况的普遍改善。

从直觉上判断，似乎将绍里的所有经济发展成就都只是归因于“千年村庄项目”的实施并不妥当，因为其时肯尼亚总体经济环境出现了更为显著的改善。与之相似，如果肯尼亚已经历过2004~2007年的经济衰退，那么因绍里生活水平出现任何程度的下降而问责于“千年村庄项目”也并不公正。事实上，当我们写作本书时，肯尼亚已经遭到饱受争议的国内总统选举引发种族冲突的负面影响，而且需要数年才能使肯尼亚经济增长和投资从国内政局不稳的态势中恢复过来。如果由于这次国家动荡而导致绍里的国内收入下降，那么这显然不是“千年村庄项目”的错。

绍里粮食产量增长3倍有何特殊意义？正如我们通过本书前几章的讨论所认识到的，非洲农民实际上还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当天公不作美时，庄稼歉收和贫困就会伺机作孽——正如2004年出现的情况一样，那一年的降雨量为253毫米，低于1998~2003年的平均水平。随着2005年雨量增加，农业产量自然有所恢复。这就是说，由于2004~2005年当地粮食产量增加，绍里的农民也许应当在感谢“千年村庄项目”专家的同时感谢天气。

我们衷心希望“绍里模式”被证明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不仅能解决全球贫困问题，还能一劳永逸地平息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有关外国援助的争论（见第一章）。但需要开展一系列项目评估，以便弄明白该项目如何以及为何取得（或未取得）成功。否则，我们就没有什么收获，而且绍里和其他“千年村庄项目”的参与村庄将有可能再次成为出发点好但最终却没有说服力（且很快被人们遗忘）的消除贫困的尝试。



ECONOMIC GANGSTERS

结语
前途未卜？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传道书》第9章第18条

我们再次回到本书开篇时讨论的问题。40年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怀着希望和期待思考他们的未来。自那时起，就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例如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接下来可能将是印度。但是我们发现在当今世界太多地方，生活在乡村以及日渐涌入城市的人们生活得并不比半个世纪前他们的祖辈更好。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的贫困似乎比以往更加根深蒂固。我们一直在努力弄清楚腐败和暴力以及他们的“盟友”——这个世界上的经济流氓们——如何阻碍了经济发展，以及我们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尽管上述负面因素延缓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抱负的实现，但希望之火已经重新点燃，而且，不仅尼日利亚这样的商品出口国正逐渐走

向复兴（该国已经从当前世界油价上升中获益），其他经济体亦是如此。近几年，非洲各新兴经济体，像加纳、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已经成功地将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6%，这预示着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更加光明。即便是坦桑尼亚这样的之前被失望笼罩的国家也逐渐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这些国家不缺具有奉献精神和敢于创新的社会精英，他们努力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仍然会遭遇暴力和腐败的强力阻挠。

两三年前，雷就曾在牛津大学有幸遇到这样一位“贵人”——肯尼亚记者约翰·吉森格（John Githongo），他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位学者，身着便装、颇有风度地与圣安东尼学院的教授们聚餐。但他并不只是一位社会观察员（如我们），吉森格放弃了他作为报道政治弊病的调查记者的工作，成为种族和治理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承担起了肃清政府内部腐败的职责。

但肯尼亚新总统厉行改革的承诺和吉森格的工作都是短命的。在大约一年之后，吉森格重操旧业，开始揭露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例如将公共基金转移到根本不存在的公司中、向合同投标方索要高价。尽管吉森格态度温和，但并不因公开揭露改革重新进入“死胡同”而感到胆怯，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刚刚占领反腐败阵地的政府出现此种问题的情况下。当他仅仅是行使自己的职权准备展开深入调查时，老资格的部长们就奉劝他不要多管闲事。由于面临针对他个人及家人的不明暴力的威胁，吉森格被迫流亡英格兰，而此时距其上任不足两年时间。

雷将自己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与吉森格分享，这位肯尼亚著名的反腐败斗士身处异国他乡仍坚持开展斗争。为继续推进反腐败进程，吉森格将他的“战斗武器”带到了牛津，一个记录着为肯尼亚内阁大臣们所承认的、他们在伪造假合同捞取数百万国家基金这种犯罪行为中所扮演角色的详细卷宗。

令人深感惊讶甚至有些震惊的是，吉森格既没有对过去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也没有对未来感到绝望。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肯尼亚高层的腐败问题在国内外曝光，而且他本人也无意在某个不为外界打扰的象牙塔内度过自己的流亡生涯。吉森格已计划重回肯尼亚，并利用在牛津的这段时间思考回国后亟须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吉森格以及无数像他这样的英勇斗士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致力于消除国家的贫困与落后，而且，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肯尼亚和其他极端贫困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我们自愧只是理论研究者，而不是约翰·吉森格这样的政治家或无畏的社会活动家。但在反对经济黑帮的全球斗争中，我们同样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是各方面信息、新观点、有力证据以及某些智慧之举的提供者。倘若手中没有掌握“知识”这柄利器，“约翰·吉森格们”就更难弄清楚如何有力地开展反对本国腐败、暴力和贫困现象的斗争。我们这些发展经济学家正步步前行，希望所开展的研究能够为这个世界上坚持斗争的贫困之士们带来某种启迪和帮助。

谨向为帮助我们完成本书而辛勤工作的同事们，以及为本书创作奠定基础的研究人员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首先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优秀的编辑——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和赛思·迪奇克（Seth Ditchik）。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二位编辑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建议、指导和支持，并不知疲倦地反复审阅原稿。他们富有智慧的校对和修改工作散见于本书定稿之中。戴尔·科顿（Dale Cotton）所做的审阅工作极为出色，此外，整个出版社为本书顺利出版提供了极大支持。

我们尤其要感谢我们在加州大学的同事皮埃尔·奥利维尔·古兰沙（Pierre Olivier Gourinchas）、查德·琼斯（Chad Jones）、沙哈尔·卡利夫（Shachar Kariv）、皮特·克雷诺（Pete Klenow）、戴维·莱文（David Levine）、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和丹·波斯纳（Dan Posner），他们仔细阅读了全书，并参加了我们于2007年12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本书的“小型研讨会”，通过这次研讨

会，我们对原稿的结构安排进行了重大调整和完善。阿皮季德·巴纳吉 (Abhijit Banerjee)、斯蒂凡诺·德拉维尼亚 (Stefano Della Vigna)、约翰·戴克马 (John Dykema)、托德·菲奇 (Todd Fitch)、雷切尔·格莱娜斯特 (Rachel Glennerster)、埃利·格罗斯曼 (Ellie Grossman)、迪安·卡兰 (Dean Karlan)、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 (Ulrike Malmendier)、杰米·麦卡斯兰 (Jamie McCasland)、乔纳森·默多克 (Jonathan Morduch)、丹·阮晋 (Dan Nguyen-Tan)、艾莉森·雷德 (Alison Reed)、杰勒德·罗兰 (Gerard Roland)、亚当·萨卡尼 (Adam Sacarny)、劳拉·萨福迪 (Laura Safdie)、萨拉斯·桑加 (Sarath Sanga)、尚卡尔·萨蒂亚纳斯 (Shanker Satyanath)、梅拉妮·沃瑟曼 (Melanie Wasserman)、洛朗·韦伯 (Lauren Weber) 和斯蒂凡妮·伊 (Stephanie Yee) 也仔细阅读了其中数章内容，而我们从他们的反馈、观点和建议中受益匪浅。彼得·帕塞尔 (Peter Passell) 的细致审阅对第四章和第七章的写作颇有助益。

在构建本书框架的写作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很多人在研究方面给予的极大帮助，他们是珍妮·阿克 (Jenny Aker)、艾丽西亚·班农 (Alicia Bannon)、伊丽莎白·比斯利 (Elizabeth Beasley)、洛伦佐·卡萨布里 (Lorenzo Casaburi)、巴布勃·卡思卡特 (Bub Cathcart)、梅利莎·冈萨雷斯·布雷内斯 (Melissa Gonzalez Brenes)、琼·哈莫里 (Joan Hamory)、丹·哈特利 (Dan Hartley)、安德烈·亨格 (Andre Heng)、乔纳斯·约尔特 (Jonas Hjort)、常红 (Chang Hong)、帕姆·扎克喇 (Pam Jakiela)、斯特凡妮·杰思 (Stephanie Jayne)、梅

利莎·诺克斯 (Melissa Knox)、乔瓦尼·马斯特罗博尼 (Giovanni Mastrobuoni)、卡罗尔·奈克撒 (Carol Neksea)、埃弗里·奥莱特 (Avery Ouellette)、卡米尔·潘努 (Camille Pannu)、雷切尔·波利梅尼 (Rachel Polimeni)、耶·鲁然斯基 (Jerzy T Rozanski)、亚当·萨卡尼 (Adam Sacarny)、萨拉特·桑加、莫妮卡·沙阿 (Monika Shah)、福洛拉·希林基 (Flora Shillingi)、瓦伦丁·希普拉 (Valentine Shipula)、彼得·瓦富拉 (Peter Wafula)、王芝 (Zhi Wang)、波利卡普·瓦苏瓦 (Polycarp Waswa) 和武易 (Yi Wu)。

如没有下述机构在财政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我们的这项研究无法顺利完成，这些机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世界银行、斯隆基金会 (Sloan Foundation)、古根海姆基金会 (Harry F. Guggenheim Foundation)、国际儿童支持组织 (International Child Support)、美图坦桑尼亚地区自治会 (Meatu Tanzania District Council)、哥伦比亚商学院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委员会和医疗研究中心。

雷要对他为本书写作奠定基础的多篇论文合著者们表示感谢，特别感谢魏尚进与其进行的长期合作，感谢雷·霍顿 (Ray Horton) 教授的悉心指教，以及塔伦·康纳 (Tarun Khanna) 教授孜孜不倦地帮助他这样一位困惑而迷茫的研究生找到前进的方向。雷还要对他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部门以及社会关系项目组的同事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与他就为何世界上存在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展开的长期讨论。雷感谢自己的父母——迈克尔和桑德拉，感谢他们无条

件的爱、支持和在学业方面给予的指导。最后要感谢埃利，感谢她对一位总是健忘的教授丈夫的无限耐心和爱。

特德感谢他的合著者尚卡尔·萨蒂亚纳斯、埃内斯特·塞尔真蒂 (Ernest Sergenti)、约翰·戴克马 (John Dykema)、杰勒德·罗兰 (Gerard Roland)、约翰·贝洛斯 (John Bellows)、雷切尔·格莱娜斯特，并且特别要感谢迈克尔·克雷默，感谢他的启发和指导。特德感谢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部门的同事，感谢他们对本项研究的信任；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健康和福利中心的朋友，本项研究的某些内容于 2002~2003 年在此写成；以及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本书 2007 年在此完成终稿。最后，倘若没有妻子阿里的爱（特德将本书献给她），倘若没有父母克雷斯蒂娜 (Krystyna) 和爱德华多 (Eduardo) 的支持，倘若没有叔叔阿道夫·库奇内拉在蒙得维的亚的研究案例（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为各国人民提供清洁水源的事业中），特德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